文汇原创丛书

鲁迅与我七十年

新版

Lu Xun yu Wo Qishinian

周海婴◎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目录

第 一 章 父亲的写作习惯…………… 1
第 二 章 溧阳路藏书处……………… 5
第 三 章 “积铁成象”玩具………… 9
第 四 章 怀炉……………………… 13
第 五 章 火炉……………………… 17
第 六 章 斗鱼……………………… 21
第 七 章 一枚生病图章……………… 25
第 八 章 父亲为我治病……………… 29
第 九 章 电影和马戏………………… 33
第 十 章 父亲对我的教育…………… 36
第 十一 章 信与信笺………………… 39
第 十二 章 大陆新村居所的天井……… 43
第 十三 章 客厅…………………… 47
第 十四 章 留声机的故事…………… 50
第 十五 章 阳台、厨房、浴室……… 53
第 十六 章 保姆阿花………………… 56
第 十七 章 记忆中的许妈…………… 59

第 十八 章　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 63
第 十九 章　诀别.................................. 66
第 二十 章　面膜.................................. 70
第二十一章　须藤医生........................... 74
第二十二章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78
第二十三章　丧事和棺木...................... 81
第二十四章　兄弟失和........................... 84
第二十五章　八道湾房产...................... 88
第二十六章　祖母对周作人的看法......... 92
第二十七章　羽太信子姊妹................... 96
第二十八章　建人叔叔的婚姻............... 99
第二十九章　叔叔的南下.....................103
第 三十 章　叔叔与王蕴如婶婶...........107
第三十一章　周作人与周建人...............110
第三十二章　叔叔的儿女.....................114
第三十三章　朱安女士.........................119
第三十四章　朱女士与我们母子...........123
第三十五章　内山书店.........................127
第三十六章　两个不解之谜..................131
第三十七章　内山的晚年.....................135
第三十八章　内山的未亡人..................139

第三十九章　霞飞坊............................143
第　四十　章　为父亲墓碑写碑文............147
第四十一章　与叔叔一家合住...............151
第四十二章　我的过错........................154
第四十三章　《鲁迅全集》的出版.........158
第四十四章　霞飞坊邻居.....................162
第四十五章　顾均正先生.....................166
第四十六章　索非先生........................171
第四十七章　巴金先生........................175
第四十八章　霞飞坊的小朋友...............179
第四十九章　烧书..............................183
第　五十　章　母亲被捕........................187
第五十一章　住在叔叔家.....................191
第五十二章　艰难生活........................194
第五十三章　母亲被释放回家...............197
第五十四章　我家的房客.....................201
第五十五章　报人李先生.....................205
第五十六章　一次火警........................209
第五十七章　杨霁云先生.....................213
第五十八章　常姨..............................217
第五十九章　蔡咏裳阿姨.....................221

第　六十　章　袁雪芬与《祥林嫂》......... 224
第六十一章　母亲娘家的亲戚............... 228
第六十二章　许月平姨妈..................... 231
第六十三章　母亲写给郁达夫的信......... 235
第六十四章　一个账本....................... 239
第六十五章　痛心之事....................... 243
第六十六章　轻信........................... 247
第六十七章　聚餐会......................... 251
第六十八章　记忆深处....................... 254
第六十九章　母亲与中华女中............... 258
第　七十　章　我眼中的关露................. 262
第七十一章　董秋斯凌山夫妇............... 266
第七十二章　被逼迫而死..................... 270
第七十三章　胜利的欢欣..................... 274
第七十四章　我家被监视..................... 278
第七十五章　秘密离沪....................... 282
第七十六章　抵达香港....................... 285
第七十七章　解放区的“鲁迅版税”...... 289
第七十八章　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 294
第七十九章　到北平......................... 297
第　八十　章　父亲遗物的处置............... 301

第一章　父亲的写作习惯

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每每这个时候，女佣许妈就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了。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谈很长时间。我听到大人们的朗朗

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母亲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糖食倒是经常有的，有时父亲从小铁筒里取出请客。因此我嘴里讲“陪客人”，实际上是为分得几粒糖食。待我纠缠一阵后，母亲便来解围，抓几颗食物打发我走开。我在外边玩耍一会儿回来，另一场交涉便开始了。这就是我为了要“热闹”，以解除“独生子”的寂寞，要留客人吃饭。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这母亲是清楚的，可我哪里懂得？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虽也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如果留下便饭，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如叉烧肉、白鸡之类。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急忙烹调。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

讲到睡觉，我想起在我四五岁时，床头旁的五斗柜上，总点着一支蜡烛。它是普通的白色洋烛，每逢我不愿睡觉的时候，许妈便哄着点燃烛火，说“阿弥陀佛，拜拜！”这才骗取了熄灯的效果。可惜我虽经过幼小时的“培训”，至今仍没信

佛。任何宗教也没有影响我。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的，尽量不打扰他。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也从来不大声呼唤，总是走近讲。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

晚间规定我必须８点上楼睡觉，分秒必争也无效。因此夜里有什么活动，我均一概不知。偶然在睡意迷蒙之中，听到“当啷啷”跌落铁皮罐声，这时许妈正在楼下做个人卫生，不在床边，我就蹑足下楼，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随即又是一阵“当啷啷……”，还相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待父亲手边的５０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我下到天井寻找，捡到两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原来大陆新村的房子每户人家二楼都有一个平台，那是前门进口处的遮雨篷。而雄猫就公然在这平台上呼唤异性，且不断变换调门，长号不已，雌猫也大声应答，声音极其烦人。父亲想必文章写不下去了，文思屡被打断，

忍无可忍，才予以打击的。

第二章　溧阳路藏书处

以前有一些文章讲到，父亲在大陆新村附近租了个房间存放书籍，称为“秘密读书室”。我尚可根据自己的印象，补述一些情况。

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战争之后，父亲即打算从北川公寓迁居。他的日记里曾有和母亲“同往大陆新村看屋”的记载。后因父亲有北平之行，就拖了下来。直到１９３２年3月３１日，才“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之后，即有“移书至狄思威路”的记载。

父亲的习惯是，平时只将日常要用的，或新近买的书存放在家里。二楼卧室里有个书柜，总是塞得满满的，连顶上也堆着一包包的书。狄思威路才是他主要的藏书处。

狄思威路今称溧阳路，我曾随父亲去过几回。是二楼一间普通的房间，面积约有几十平方米，沿壁四周，都是木制书箱。箱子本色无漆，有活门，内分两格，装满各种书籍，可以加锁。一只只书箱从下而上，几乎叠到屋顶。这种书箱由父亲设计，木板制成，体积并不过大，迁移搬运，书籍连箱运走，不致混乱散失。有如当今的小“集装箱”。

记得头一次去是某天的下午。我们来到这幢楼下，从大门进去，一转弯走上木制楼梯，来到二楼，父亲用钥匙开门以后，我也随之而入。刚一进门，虽是白天，室内光线很不够，几乎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父亲随手开灯，我环顾四周，粗粗一瞥，只见电灯吊在屋子中央，普通白色的灯泡，顶多２５瓦，有个圆伞形灯罩。室内没有可供长时间阅读的桌椅，没有烟缸、茶具和热水瓶之类的用品，灯罩也未见裹上纸筒。由于久已不住人吧，只感到房间里有点潮湿阴冷，且因久不开窗，还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待不多久，便感到有点寒气袭人，冷飕飕的。父亲以极快的动

作，从几个书箱中分别取出几册书籍，用随身带来的布包袱包好，锁上房门，即带我来到了街上。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叔父周建人。这一天，他兴致很高，谈到这间藏书室，他说，他曾在鲁迅博物馆讲过一次，内容是，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鲁迅托内山先生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藏书之用。因为这屋里存书较多，光线较暗，长时间看书是不可能的，他到那里去，主要是拿要看的书，或者存放已经看过的书，因此还是称为藏书室比较合适。

后来，叔叔又一次回忆起藏书屋，把我叫去，说因上次的谈话而引起进一步的回忆。他说，鲁迅和创造社的成仿吾笔战时，曾跟去过一次溧阳路藏书室。是用钥匙打开进去的。那时代租房子，只要按时付房租，至于住什么人、姓什么，房东一概不问不管。门开进去，一房间都是马列主义方面书籍，也有苏联的文艺理论之类和国内外左翼杂志，总之，满屋子都是这一类书籍。叔叔还讲：在回家的路上，你父亲问我家里

是不是有马列主义书籍？我说有。他说怎么能放在家里！我说："书店里不是公开放在柜台上卖的吗？"他说："唉！书店里卖和家里有，是完全两回事，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在家里呢！"由此可见，鲁迅在笔战时，还要随时警惕敌人到家里搜查。我从他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写给曹靖华的信中也读到这样的话："此地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家里的。"

第三章　“积铁成象”玩具

瞿秋白和杨之华两位革命前辈，曾几次来我家避难小住。那时，我因只有３岁多一点儿，许多事情记忆不深。只记得我对他们两位，一称何先生，一称何家姆妈。尽管他们当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但在来往中间，还不时地对我家有所馈赠。如赠送母亲面镜等等。就连我这个年幼的孩子，也特意赠送过东西。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９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玩具有积木，似乎众所周知，这里说赠的是“积铁成象”，好像不易理解。其实就是铁材制成的可搭成各种形象的玩具。父亲对它这样命名，是非常贴切的。

这一盒珍贵玩具，我在幼小时很少玩。等我稍稍长大以后，母亲才从衣柜中郑重地取出，说

这是何先生送的，过去因你太小，一直由我替你保管，现在才可以玩了。但是立有一条规矩，就是每次玩过以后，要把拆开的零件，按原来的位置，有条不紊地重新装进纸盒。还翻开盒盖，告诉我说，这上面有全部零件的清单，可以按件核对，以防丢失。我仔细一看，匣盖面呈黄色，里面为白色，何先生还亲自以清晰秀丽的笔迹，按顺序写明零件的名称，如各有多少种，多少件，连有多少颗螺丝、螺母都写得一清二楚，毫无遗漏。现在回想，这字里行间，凝集着一位革命家对待事物非常缜密细心、一丝不苟的精神，真令我感动。

这种“积铁”玩具，在４０多年前非常稀罕，只有舶来品。盒分大中小三种，零件多少繁简不一。何先生送给我的是一个中盒。记得其中大小轮子各有四个，长方形底座一个，长方形铁片两块，梯形铁片一块，还有许多不同形态的条、轴若干，摇把一只，还附有螺丝和卡子一小盒。零件全都漆以红绿两色，满布均匀的圆孔，以备搭积时穿固螺丝之用。所有零件都做得非常精致。

匣内还附有厚厚的说明书一册，载有搭成的各种器物图像若干幅，从简至繁、一一备载。简者如天平、椅子、跷跷板；繁者如火车、飞机、起重机等等。我最喜爱搭的是起重机，搭成以后，还挂上一件物品，然后用摇把慢慢摇起，逐渐升高，十分有趣。这种玩具，不仅益智，而且因为它用铁材制成，经久耐用，所以我对它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这种玩具，后来国内已有类似产品出售。规模与此大同小异。名称有的叫做“建筑模型”，价格４元至１０元不等。但何先生送我的一套，据说售价之贵令人咋舌。他们两位革命前辈，自己生活极其艰苦，却用昂贵的价格买下这套玩具送我，用心可谓深矣！据母亲介绍说，当时何先生预料，将来革命成功，必有一番大规模的建设，而这些建设工作，没有人才是不行的，因此他认为对下一代必须及早给以科学技术教育，以备将来深造之用。言谈之间，何先生还隐约透露，像他们那一代的革命家，难免有不测之虞，“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这就

是他们仅有的一点愿望。是的，何先生的身影，虽然想不起来了，但是他留下来的这一盒礼物。却成了我缅怀革命前辈的最好依凭。我上学以后，开始爱好理工专业，后来又投身于科技工作，细想起来，也许和他们两位当初对我的启迪不无关系吧？只因自己不够努力，一生毫无建树，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实在有负于前辈的厚望，内心悔愧不已。

第四章　怀炉

父亲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士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难得见他生病。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考。考场距家颇远，有钱人家的考生雇了乌篷船去，而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上面放着笔墨砚台和食物、小板凳之类。而同伴中大都２０多岁，有的已是他的叔叔辈，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

根。

到他１８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８块盘缠，辞别故乡，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衣服单薄，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使胃部不断受到刺激，加以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因此胃病常犯，困苦不堪。每当这个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好像一块硬团，坚硬如石，疼痛异常，良久不得稍缓。那时我已稍稍懂事，每见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有时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

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以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１６日为例，从这一周的《日记》来看，差不多每天都有“胃痛”的记载。但是，在此期间，他照常接待客人，购置图书，撰写稿件，答复来信，修订旧书，参观美术展览，以致“得西谛所寄《北平笺谱》尾页一百枚，至夜署名讫，即寄还”。真是事务纷繁，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胃病一旦发作，如

果只是一般地服药和按摩，已不能奏效，所以在１２日有“用怀炉温之”，次日又有“仍用怀炉温之”的记载。

这怀炉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我稍作介绍。

上海的冬天，室内往往比较寒冷。用暖水袋，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一小时就会变凉。经常灌装热水，又比较麻烦。当时虹口一带的日本药店，除销售药品外，往往有这种怀炉出售。我在家里见过两种：一种有眼镜盒那么大小，但稍许厚实一点，用镀锌铁皮压成，外贴黑色绒布。所用燃料，是把优质炭末紧压成圆棒形，直径约为２厘米，外裹薄纸。打开匣盖，中有容纳炭棒的圆槽，并有小齿条可卡紧，以免移动。据说，每根炭棒可燃三小时。可是母亲用火柴点燃以后，不消多时即熄灭。屡点屡灭，只好弃置不用。我也偷偷试点过几次，结果一样，也不成功，所以未见父亲用过。这大概是由于产品没有“过关”的缘故。

另外一种，炉体呈扁平长方形。厚仅１．５厘米，电镀克罗米（镍）。匣盖竖开，下半段可以灌注酒精。有一根石棉制的炉芯，用火柴点燃后，芯子就发出萤萤绿光，盖上匣盖，让其在内部徐徐燃烧。匣盖刻有图案洞孔，借以流通空气，散发热量。这时炉体逐渐灼热，外边套上黑色天鹅绒的紧套，放进怀中，可以维持数小时之久。现在市场上有时也有这种怀炉出售。见到这种东西，使我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９、１０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第五章　火炉

虽然有了怀炉，但江南的冬天实在太寒冷，尤其到了“三九”天，室内常常砚台结冰，室外水龙头冻得放不出水来，因此父亲仍难以坚持久坐不动地写作。

为了保证父亲工作，后来在他的写作室兼卧室的西侧装了火炉。火炉并非昼夜不灭，只是每天傍晚，收集废纸，找寻木柴把它点着。每天晚饭后，父亲习惯总要放松休息一下，这时全家围着熊熊炉火，随意闲谈，倒也甚是有趣。这时我经常提些幼稚的问题，让父亲记在日记里，成为笑谈，如“爸爸能吃（掉）吗？”之类的忤逆话。火炉燃料需用“烟煤”，北方称“红煤”，但因为江南煤价较贵，每年总是熬到１２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生火。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父亲在

《日记》中记道："始装火炉焚火"，２１日又记："下午买煤一吨，泉廿四。"当时，一石大米大约平均８元上下，这样，一吨煤炭所需费用，相当三石大米，实在是很昂贵了。

取暖的火炉，记得换过几种。先头用过一种洋式铁炉，有复杂的外形，曲折的烟道。炉身上下，有好几个门，还有储煤的特殊装置，能够自动下落添煤。炉身还有摩托车汽缸外翼形状的散热片，看起来样子很科学，但它却要吃"细粮"——红煤（烟煤），还要每颗如核桃大小，如果不是"细粮"，煤块大小又不合适，往往就要卡壳。如果煤块稍碎，炉膛又被堵死，只要稍不留意，往往就烟消火灭，实在难以伺候，最后还是请它休息。接替它的，是常见的直筒圆形火炉。它没有那么娇贵，上边添煤，底下出灰，只要添足硬煤，往往可以维持到次日早晨。

安装火炉，固然解决了父亲取暖这件大事，但洗浴仍比较烦难。我没有父亲带我到外边公共浴室沐浴过（当时上海公共浴室比较普遍）的印象。因此每逢洗浴，家里就要有一番大的动作。

浴室位于一楼二楼之间的拐角处，面积约有 6 平方米，长 3 米，宽 2 米多。室内东南角安有浴盆，一到预定的某天下午，母亲和许妈就开始准备。擦洗澡盆，点燃炭炉，打点替换衣服。晚饭以后，洗澡的热水由路边的一家南通人开的“老虎灶”送上门，由小伙计挑两只有盖的木桶，帮你倒入浴缸；也可先倒进一半，另一桶暂摆缸边，这只木桶便滋滋冒着热气，致使室内更加雾气弥漫。浴室里先端进炭盆，木炭火发出萤萤绿光，劈劈啪啪地响着，散发出阵阵暖气，但也有一股令人不快的烟气。待洗澡水倒进浴盆，我总受优待，第一个入浴。待我浴后，才是父亲、母亲。有一次我在满是水蒸气的浴盆里洗好之后，裹着一条大毛巾，站在马桶盖上准备穿衣服。忽然感到一阵昏晕，眼前什么也看不清了。原来是木炭发出的一氧化碳把我熏倒了。不知隔了多久，我才隐隐约约地听到耳旁许妈的呼唤声音：“弟弟，弟弟。”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被抱上三楼，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这时只是感到两腿酥软，起不了床。这事着实让父母紧张了一阵。

不过等到第二天一早，我照样去幼稚园上课了。

第六章　斗鱼

父亲的房间里有两只鱼缸。一只矮而圆胖，紫红色的边沿，短短的三条腿。它虽然晶莹透明，我却并不喜欢，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缸里养着的几条金鱼，呆头呆脑的，却又非常娇气。上海的自来水氯气很重，再加上我们不会侍弄，所以养不了几天，有的金鱼就肚子朝天，翻起白眼夭折了，这使我非常扫兴。

但是，另有一只鱼缸，情况却不一样。这只鱼缸，高约１５厘米，宽约３０厘米，看上去玻璃不怎么光洁，并不怎么值钱，也许原本就是为家庭养鱼而制作的吧。

这只鱼缸，放在父亲写字台的右侧，紧贴南窗。冬天，太阳从窗口射入，把水缸晒得很暖；夏天来了，顺手一挪，将它移到西墙边，又比较

阴凉。但这只鱼缸里养着的１０尾斗鱼，却非常惹人喜爱。父亲伏案写作感到劳累时，就停下笔，唤我一起来观赏鱼的遨游姿态。这种斗鱼，身体扁平，色显暗褐，呈流线型，约有１０厘米长，几条带纹横贯全身。外表极其平凡，但却活泼善游，忽而上升，忽而下降，追逐咬斗，灵活异常，从不见因为失去控制而冲撞在狭窄的缸壁上。完全不像金鱼那样慢条斯理，懒懒散散，即使外界有什么震动，也只是摇摇尾巴，沉入缸底完事。

　　当时，我不知那些斗鱼的来历。后来读到母亲所写的《我怕》一文，看到有关这缸鱼的一段记述，只不过母亲称之为“苏州鱼”：“右方，靠在藤躺椅可以鉴赏着一缸‘苏州鱼’，是夏天病重的晨光，内山先生特地送来的，共１０尾。看看那鱼的活泼姿态，给与他不少的欢喜……”

　　内山完造先生为什么在１９３６年的夏天，“特地”送这么几条斗鱼给父亲呢？想来也许寓有一番深意吧。大概一方面是为了使父亲得以赏心娱目，清除疲劳，一方面也是为了希望父亲能以

自己的坚强毅力，斗败病魔的袭击，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也许是“天随人愿”吧，经过一场严重的折磨以后，父亲的疾病显然有所减轻，能够起床活动了。这不但使我们全家和他的朋友们庆幸，而且使他自己的心情也感到愉快。每在空闲的时候，他便和母亲一起往鱼缸里换水，铺沙，布置水草，再把鱼缸轻轻地放回原处。有时看到水草过密，怕妨碍鱼的呼吸，又去掉一些，再撒下鱼虫，然后静静地观看鱼在水中争夺吞食的情景。我有时乘大人不备，伸手入水，想捞一两条鱼来玩玩，然而斗鱼极其敏捷，往往从指缝里溜掉。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放弃这种念头。

但我这个“好事之徒”，并未就此罢休。逮不住斗鱼，就想出一个新招：在这鱼缸里养了一群蝌蚪。这是纠缠着许妈，从郊区小溪里捞来的，约有３０多只。一直养到它们脱去尾巴，长出４只小脚来。小青蛙是两栖动物，不能光让它们在水里扑通。于是我们便小心地从鱼缸里倒出一些水，加些清沙，让它们在浅堆旁边跳跃。有时跳

得很高，差点跳出缸外，我便用一块玻璃盖住缸面。对于我的这些举动，父亲似乎也并不认为是多事之举而加以制止。但后来，不知哪一天，这些青蛙被谁全部倒掉了。今天回想起来，这些都已成了梦境。

第七章　一枚生病图章

父亲的印章，现存有４９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的“完”、“伪”、“善”、“翻”等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团章。以石质居多，还有水晶石、牙质和玉质的。外形有圆有方；有经过加工者，也有不加磨制保持自然形态者。有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质，没有边款，我至今不知何人所赠。这些印章，现分别保存于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遗憾的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母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章，都被当做“罪证”抄没。待到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图章”，其中有母亲自己的印章，有“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图章，也有父亲的几枚印章。这十几枚图章，连同１９２２年父亲的

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当面追寻，但均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问者名叫奥谷，如尚在世，能够提供线索，使这些东西得以发现，是我的一线希望，也是广大鲁迅研究者和一切维护中日友好者的愿望。

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着一枚白色木质图章。式样极其普通，呈长方形，印面为３７×１０厘米，刻有阳文“生病”二字，字体正方，质地一般，刀力平平，显见刻工并非名家。没有边款标记，不明作何用途。母亲生前，纪念馆的同志似乎也未问及，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其实，我倒是一个“知情人”。

当年大陆新村一楼会客室的里间，有一张我们平日吃饭的八仙桌，桌上有４只小抽屉。这枚图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门方位的那只抽屉中。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个小圆匣印泥。我小时候，曾经拿这只图章往纸上盖着玩，弄得手指油腻腻的尽是猩红色，这枚图章也被我弄得遍体印泥，满是朱砂色。据我所知，这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当

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１９３６年６月５日——６月３０日，就“艰于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在回执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焦急催促。这也是父亲对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那时我已经６岁多了，有时在楼下玩耍，遇到来信要盖此章时，往往不许旁人插手，抢着完成自以为非常荣耀的任务。后来，很多熟人知道父亲病重，除了问候以外，一般都不忍再以事务相烦了。但有些人并不了解，所以偶然也仍有送稿件前来请教的，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估计短期来不及阅读，便婉言谢绝，如有持介绍信件送稿者，便在来信后面盖以这“生病”二字图章，以让送信人有个回复。父亲去世后，这枚图章，连同其他什物，一并搬到霞飞坊现淮海坊６４号，再也没有使用过。想不到如今倒成了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文物了。

第八章　父亲为我治病

父亲青年时代虽然学过医，但他很谨慎，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也不随便向人介绍成药。他自己有病，往往满不在乎，可是看到亲友生病，就显得非常焦急，尤其是上海弟弟家中孩子有谁生病，更是念念不忘，关怀备至。因此，我们家里经常备有一些日用药品，种类虽不多，但往往能够奏效。

除了药品以外，家里还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器具。比如温度计（华氏标准）、蒸气吸入器、通便用的玻璃注射器等等，以备急用。纱布、绷带、镊子、剪刀等等，也都放在二楼五斗柜的抽屉里面，随用随取，用后放回，井井有条，从不紊乱。各种药品，也都有一定的存放位置，为的是取用方便。附带一提的是，这里虽说

是"家庭日用药品"，但它的服务对象，有时并不只限于家庭以内。例如大姐周晔有过记述：父亲和叔叔曾在某天入夜，为一位受伤的洋车工人包扎伤口，这已众所周知，就无庸赘述了。我小时候种下了气喘病的根子，每到疾病发作期间，不但自己痛苦不堪，也使父母担心劳神，不胜其苦。

我得的这种哮喘病，每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发作。一犯起来，呼吸困难，彻夜不眠。父亲为我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且称之为蒸气吸入法。架好一套吸入器皿，即在盛水小锅中卡上一支细管，加橡皮圈密封，将细管一端通入另一小杯，杯中装有调好的"重碳酸曹达"和食盐稀溶液，用酒精灯加热烧开，蒸气将药液喷射带出，再经一玻璃喇叭口集中成为一束。这时母亲给我带上围兜，并且蒙上眼睛（怕盐水刺痛眼睛），叫我张口吸气。湿润的水汽进入气管，药味咸且略苦。如果还不痊愈，父亲就改用一种药膏热敷。先将"安福消炎膏"隔水泡热，母亲按我背部大小准备一块布料，父亲用钝刀将白色的粘稠药膏刮在布

上，贴在我的背部或前胸。２０分种以后揭去。这种药膏不知都有哪些成分，仅感到有一种薄荷味，十分清凉，对于我剧烈的哮喘，也能起到缓解作用。

但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如芥末糊的功能来得神速。这似乎成了父亲对付我哮喘病的一张王牌。说起来也很简单，用一个脸盆，放进二两芥末粉，冲入滚烫的开水，浸入一块毛巾，待芥末汁浸透以后，父亲便用两双筷子插入毛巾，以相反的方向绞去水分，以我能够忍耐的温度为准，热敷背部，上面再用一块干毛巾盖住，十几分钟后撤去，此时背部通红如桃，稍一触及颇感疼痛。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而且又困又乏，缓缓睡去，往往可睡个通宵。这种方法不知由谁介绍，其疗效大好，屡试不爽，但有时哮喘剧烈，此法仍不奏效，父亲就直接用二三两芥末，加凉水和匀，如“安福膏”一样涂在布上，贴在背部。此糊虽凉，但越敷越热，刺痒灼热，颇不可忍。时间也以１０分钟为度，若时间稍过，则背部灼出水泡，如开水烫伤一般。这样

气喘虽缓，但却要吃另一种苦头了，因此父亲一般不轻易采用。

父亲因对我疾病十分重视，费去他不少精力。平时有点小毛病，即趁早为我治疗，如不奏效，就请医生或到医院就诊。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我没有详细统计，至少也有百次左右吧！

第九章　电影和马戏

　　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惟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观看。有时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记得和父母一同看过的电影，有《人猿泰山》、《泰山之子》、《仲夏夜之梦》以及世界风光之类的纪录片。

　　看电影一般不预先买票，碰到喜欢的片子，往往在晚餐以后即兴而去。或者邀请叔叔婶母，

或者邀请在身边的其他朋友，共同乘坐出租汽车去，当时汽车行就在施高塔路（现山阴路）路角，去人招呼一声，就能来车。车资往往一元，外加“酒钱”二角。因为看的多是9点晚场，因此对我来说，出去的时候兴高采烈，非常清醒，等到回家，已经迷迷糊糊，不记得是怎样脱衣，怎样上床的了。

由看电影进而观马戏。

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名闻世界、誉驰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演出。

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在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前，怕我受到惊恐，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自己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迷迷糊糊地睡去。

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上述考虑的意见，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０日《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这"兽苑"里面，只是关着的动物，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的滑稽节目。不过这对于我，已经是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噘嘴嘟囔不休了。

后来听说，这个马戏团去美洲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浪（一说船上失火），连人带兽，全部沉入海底，无一幸免。

第十章　父亲对我的教育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的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

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勾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住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我在一楼的玩具柜里，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的。但父母从不阻止我这样做。对我"拆卸技术"帮助最大的就是前述瞿秋白夫妇送的那套"积铁成象"玩具。它不但使我学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几百种积象玩法，还可以脱离图形，自我发挥想像力，拼搭种种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我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母亲见了，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斥责，只让我复原。我办到了。从此我越发胆大自信。一楼里有一架缝纫机，是父亲买给母亲的，日本ＪＡＮＯＭＥ厂牌。我凭着拆卸留声机的技术积累，拿它拆开装拢，装拢又拆开。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确不是懒学，是因气喘病发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的，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的尴尬局面，友好如初。我虽也偶然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父亲自己给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这是１９３６年１月，父亲去世前半年，我已将７岁。

第十一章　信与信笺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生物方面的丛书，每种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父亲给祖母的信里常常提到我生病、痊愈、顽皮、纠缠、读书和考试成绩等情况，有时还让我写上几句。从存留的书信墨迹里，在信尾尚有我歪歪扭扭的个把句子。我当时是想长长地写一大段的，表达很多心里话，可惜一握笔便呆住了。在１９３５年1月１６日的信里，父亲写道："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

父亲写信经常是用中式信笺，印有浅淡的花卉、人物和风景，按不同亲疏的朋友亲属选用。如遇到父亲写信，我往往快速地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里挑选信笺，以童子的爱好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亲有时默许使用，也有感到不妥的，希望我另选一枚，遇到我僵持不肯，相互得不到一致时，他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的。偶然父亲坚决以为不妥的，那当然只有我妥协了。据悉有一位日本仙台的研究者阿部兼也先生，他最近专门分析父亲信笺选用与收件者的内在关系。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内中有我的"干扰"，使研究里掺进了"杂质"。

我小时候十分顽皮贪玩。但是我们小朋友之间并不常在弄堂玩耍，因为在那里玩耍受日本孩子欺负。母亲就让我们在家里玩，这样她做家务时就不用牵挂着时不时探头察看。有一回，开头我们还安静地看书、玩耍，不久便打闹开了，在客厅和饭厅之间追逐打闹，转着转着眼看小朋友被我追到，他顺手关闭了内外间的玻璃门，我叫不开、推不开，便发力猛推，推了几下手一滑，从竖格上一下子脱滑，敲击到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裂，右手腕和掌心割了两个裂口，血汩汩而下。小朋友吓得悄悄溜走了，而我也只顾从伤口处挖出碎玻璃，至少有三四小片。许是刚刚割破，倒未有痛感。父亲听到我手腕受了伤，便从二楼走下来，我也迎上去，觉得是自己闯的祸，也没有哭的理由。父亲很镇定，也不责骂，只从楼梯边的柜里取出外伤药，用纱布替我包扎，裹好之后，仍什么也没说，就上楼了。

后来他在给祖母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这是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２３天。有一张

母亲和我在万国殡仪馆站在一起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右手腕包扎着纱布，可见当时伤得不轻。

第十二章　大陆新村居所的天井

父母到上海定居，住过景云里、阿莫斯北川公寓以及临时避难的几处。这些我丝毫没有记忆，而大陆新村的印象倒不少。

这大陆新村，现在知道是当时大陆银行所建筑的，共有两条弄堂，我们住的是第一条。南边的先造，称“青云小筑”。我家住的是９号。

大陆新村９号是新式里弄，进前门是方形的小天井，约有１２平方米，人一多就挤得转不开身。

内山夫人（内山美喜）经常给我家送些花卉。对此，父亲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但也有未记载的。我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送一盆牵牛花（上海通称喇叭花）。清晨，大家还没有起床，它已迎风带露，徐徐展开圆锥形的花朵，呈现它的风

采；到中午，则因经不起烈日的毒晒，花朵就收拢萎蔫，显得十分委屈。但一到次日清晨，另一批花朵又灿烂挺拔地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欢愉和希望。

父亲很少下楼，也没有工夫为那些花卉整理枝叶浇水施肥，但这盆牵牛花却格外吸引他，他非常赞赏内山夫人的种花手艺。

为了使这盆牵牛花能够年年开放，母亲总是仔细地收拾花籽，挑选颗粒粗壮者保存起来，以备明年再种。而我对于这种事情往往不甚尽心，顶多用双手捧着收集起的花籽，倒进一个小罐就算完成任务。我最关心的是一棵南瓜秧。这是乡下农民挑进城来出售的，我买来一棵栽下以后，就早早地央求母亲给它拉上绳子，期望它早日蹿藤、开花、结瓜。南瓜秧种在小天井的西侧，每天清晨，只要没有忘记，我总要给南瓜浇水施肥。终于，见到它开了花。黄黄的，也呈喇叭形。也许是南方本来雨水勤，而我又多浇水的缘故，结果发现花开的倒不少，瓜却不多。秋天来临，瓜藤逐渐萎黄。

有一天下午，父亲兴致很高，和母亲一同来到天井。大门门楣上有一块水泥雨遮，离地面高约 3 米，这时架起了凳子，不记得是谁爬上去的，只记得令人吃惊地摘下两只沉甸甸的南瓜。一只较大，扁圆蜡黄满身皱折，老结得很；另一只很小，还有点青，呈长圆形。我顾不上收藤拉秧这些活，第一次收获的喜悦冲上了心头，当时那高兴的劲头恐怕远远超过了淘金者看到金矿。把它们捧到客厅的桌子上以后，还独自端详了很长时间。恰巧晚间内山完造先生来访，告别时，父亲从二楼送到楼下，在南瓜前面停住步，用日语向内山先生介绍，说这是孩子种的南瓜，今天上午刚刚摘下来的。内山先生连连夸奖我，称赞瓜长得很大。父亲接着说："海婴是大方的，既然先生喜欢，就送你一只吧！"说罢，就提起那只大的南瓜送给内山先生。我一时没有准备，感到出乎意料，心想：只受了几句夸奖，却失了一个大南瓜，心里怪不是味儿，但也只得装作爽快地答应了，心里却感到怅然若失。

第二天中午饭前，内山夫人亲自端来一只盖碗，里边热腾腾地盛着异国香味的煮南瓜，颜色微暗，是用酱油和糖两味调料焖烧的，不加盐和其他作料。一尝，果然香甜酥软可口，连瓜皮都可以食下。至此我才心里舒畅不少，感到这只大南瓜送给内山先生实在不可惜了。

第十三章　客厅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中央一张大桌，可会客也可用餐。它可坐８人，父亲坐南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８把椅子，均一色薄黑漆。在１９４６年或１９４７年由邵维昌用调和漆重新油过，变为棕黄色。我曾建议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法复原，似乎说过几次都没有动作，不知是否认为证据不足。其实检查椅子的油漆便是最可靠的证明。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叔叔婶婶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如叔父不带孩子来，那我就可坐在桌子边上了。父亲是绍兴人，又在家乡

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记忆中没有见他醉倒过。其实他量不大，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继续，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我不记得父亲喝过白酒之类。叔叔曾送来五加皮由于是黑瓶大肚收口，印象很深。

　　萧军１９３５年到上海，东北大汉酒量难以估计，但在我家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他喝醉的印象。母亲也不曾有过限制的语气。也许青年们在老师面前加意克制吧。

　　关于醉酒，父亲曾给我讲过，祖父他老人家"好酒"。绍兴上层人喜欢以白斩鸡下酒，且以胸脯肉为上乘。某次宴席上的冷盆里鸡脯肉不多，也许别人手快夹走了，祖父一怒之下竟把台面掀掉，不欢而散。父亲讲了他父亲的失控，也许亦引以为戒，所以，除了《两地书》起首有提到喝"醉"以外，没有什么文章讲述过这种情节。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留声机的故事。

　　在父亲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很讨厌上海３０年代留声机的声响，每当他仰卧藤椅、

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尤感不适。这时，如果我跑去纠缠，无尽无休地问这问那，母亲就会把我赶快带开，打发我下楼去玩。但１９３５年５月９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项记载："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

既然他很讨厌当时那种甚嚣尘上的世俗之声，为什么又花钱来买这架留声机呢原来这又是为了我的缘故。

第十四章　留声机的故事

大概是１９３５年４月，或者更早一些时间吧，许妈带我到隔壁邻居家去串门。那是一户日本侨民。他家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１．５米。听到他们在播放唱片，十分新鲜。可是仍感到不过瘾，因为主人不许我用手摸动它，内心深处隐存羡慕之情。回家以后，婉转向母亲提出要求，母亲又向父亲表达了我的这个愿望。经过商量，表示只要不打扰父亲，可以考虑，但规定不许在父亲工作时播唱，只在饭后稍许放一会儿。我自然只有答应。过了几天，有一个晚上，看见内山先生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来到我家，拎来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父亲下楼接待。内山先生用日语向父亲介绍这架留声机的性能，并且当场试放。放完以后，让我再来看

看，问我喜欢不喜欢。当时，我觉得它与邻家的那台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差得太远，连连摇头，表示不要。父亲见此情景，就告诉内山先生，说孩子不大喜欢，请麻烦给另换一台。内山先生痛快地答应了，让店员拎走了这台留声机。过了几天，换了一台，仍然不大，我还是嫌小不要；又过了几天，通知说另换了一台，比较大，搬不来，母亲就带我到内山书店去观看。去了以后，见留声机放在里面房间，是一种中等大小的。这时我意识到大人们已经很不耐烦了，不能再提过高的要求，就表示接受了。

留声机送到家里以后，我发现它还附有两匣金属钢制唱针，每盒２００支，还有近１０张黑色虫胶唱片，都是日本产品，是儿童歌曲，如有声似火车行驶的："呜卡卡……呜、卡、卡"的音乐片。后来，内山书店店员镰田诚一也送了两张唱片。还有一张京剧《捉放曹》，记不起是谁的赠品。总之，大都是儿童唱片，而且只有那么几张，听来听去，都熟透能背，非常腻了，再加后来父亲健康欠佳，所以，除非来了客人，或在饭

后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

这架留声机有共鸣箱，发声比小型便携式洪亮。发条有两盘，上紧以后，可以连续播放正反面达六七分钟之久。但它的缺点是不如小型便携式方便。唱机的其他部件，如齿轮发条，转速平衡器等等经常被我拆开又装拢，装拢又拆开。不过这已经是我十二三岁以后的事了。

现在大陆新村旧居一楼，可以看到这一台棕黑色中型手摇留声机，它高约２９．３厘米，宽约４０厘米，厚约３６厘米。这台展出的留声机是ＭａｇｎａＰｈｏｎｉｃ牌的７８转钢针的日本产品，已经陈旧了，覆盖的布料也已破旧。这是当时购置的原件，但如打开它的上盖，就会发现它的面板添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洞孔。这是我十五六岁时的“杰作”。那时不知爱惜，忽然心血来潮，想把它改成一台“准电唱机”，所以才弄成这个样子。

第十五章　阳台、厨房、浴室

从里间北进，迎面是水泥楼梯。上去十几级是父亲的卧室。边上亭子间。三楼卧室边上也有一间亭子间，可留住客人。三楼的卧室由我一直住到迁出大陆新村。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 1 米长约 2 米的阳台。

有过一次，父亲为了什么事气愤不平，独自躺在这阳台上，母亲束手无策，也不知他愤懑的缘由，而我以为这样躺着颇有趣，也挤进去躺在他身边，父亲哼了一声“小狗屁”，起身了，他的气愤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下楼吃饭去了。

三层楼上还有一个晒台，供平日晒晾衣被用。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它又是好去处。楼下的天井太窄，能蹿天的烟花施展不开，而阳台的视野开阔，“穿天老鼠”在空中可摇弋多

时，那是孩童最兴奋的时刻。当时我们都不敢点，父亲也不插手，因为有建人叔叔在。那时叔叔才４０上下，正在壮年时期。他燃放烟花时，我们３个小孩都躲在大人身后张望，两个姐姐用手指堵住耳朵，小妹妹周蕖才３岁，连看也没有她的份儿。焰火压轴戏是一个“花筒”，小碗直径，１５厘米高。点燃时喷出一蓬２米高的银花，一分钟便熄灭了。我们带着余兴未尽的依恋，在父母“明年再买好玩”的许诺中下楼。

大陆新村每幢楼的三层组成一个“井”字形，后墙都有一个小窗可开，它通风，冬暖夏凉，采光明亮。一楼厨房间有一个带烤箱的煤气灶，铁铸的，是洋货，我没有见到使用过。还有一具烧洗澡水的小锅炉，热水直接通到浴缸的龙头，可放洗澡水。但是此锅炉的热效率太低，燃料极不经济。厨房的位置在后门的第一间。厨房后窗下是洗菜池，淘米、接水等日常家庭事务都在这里操持。厨房间也配备煤气灶，不知是因为燃气价格贵还是用不惯“洋玩意儿”，每家都弃之不用，大多仍是烧煤球炉，每天早晨拎到弄堂生火，用

柴火引燃。因此每当早晨七八点钟，弄堂里便烟雾弥漫。后窗也往往是邮件报纸杂志的投递口，邮件向里一抛，常抛入盆里打湿，母亲便默默地晾干交给父亲。有时候还得用熨斗熨干。投递员投掷时，每每口里喊一声“信”，听到喊声，便赶快抢出来接，即使打湿了也便于抹干。若有挂号信来，就从里间柜子抽屉里取出图章盖在收据上。邮递员一般是有章便可并不在意是否“张冠李戴”。厨房的门装有“司必灵”锁，也即是弹子锁，可用钥匙开启，不必叫门。前门装有挂锁，平时不作进出用，每逢生客来访才开启，以示隆重。前、后门都装有电门铃，因此有时厨房内响铃，却分不清是哪边叫门，总得两边奔波一阵。

第十六章　保姆阿花

幼时看护过我的保姆有两位，她们是阿花和许妈。

对于阿花，我当时太小，全然没有印象。我是从一张陈旧而尚未褪色的6英寸照片中认识她的。从照片上看来，她约莫二十五六岁，清秀的面孔，明亮的眼睛，瓜子脸，端正的鼻梁，乌黑而又匀整的“刘海”覆额齐眉，衣着整洁合身，神态端庄文静，双手扶抱着我坐在她的膝上。其时，我仅1岁。如果不是留下这张照片，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位阿姨曾经扶我学步，带领我迈开了走进生活的第一步。

听母亲说，父亲初到上海，家里并不起火，只和叔叔一家搭伙开饭。到我出世以后，因为家庭事务繁重，母亲照顾不过来，所以才聘阿花来

帮忙。她是绍兴人，娘家不知还有什么人，丈夫是章家埠的农民，患有“大脚疯”（俗称象皮腿，许是寄生虫病吧），失去了劳动能力，生计无法维持，经常虐待和毒打阿花，还想把她卖出去，阿花得知才设法逃脱，来上海独自谋生。先在景云里某家帮工，后经人介绍来我家帮忙。她工作十分得力，做起活来干净利落，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干活，心情似乎比较愉快。但是过不多久，发现她却有点异常，有人敲门，常常被吓得丧魂落魄。上海弄堂房屋，前门正对着别人的后门。有一天对面人家厨房里人影绰绰，阿花一见，面色发白，惊恐之情莫可名状。仔细一问，她才对我母亲说，是她丈夫带人从乡下赶来，准备要劫她回去。严重的局面，一直僵持了几天，空气相当紧张，眼看祥林嫂被人绑架的一幕又要重演。父亲花钱请来一位律师，向他们传话去，有事大家商量，不要动手。不知是谁，找来了一位绅士从中调停。这位绅士来到景云里，一见父亲大吃一惊，连忙说：“原来阿花在先生葛里（这里），好说好说。”原来这位绅士名叫魏福绵，

曾请父亲做过他的保证人，并且汇划学费，可以说是非常熟稔。父亲请叔叔出面与他协商，结果说定由父亲拿出１５０元代阿花“赎身”，准其自由，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而这件事情，在父亲１９３０年1月１０日的《日记》中，却只有寥寥２１个字：“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

之后，阿花在我们家有一段时间。她毕竟比较年轻，带幼儿缺少经验，每在清晨抱我在北窗下与人谈天，或去汽车修理间与人说话，以致使我受到风寒，由气管炎转成支气管炎，长期治疗，反复不愈，父母为此也劳累不堪。最后，还是和叔叔商量，不如改请年老的保姆妥当，阿花才离我而去。阿花走后，未见来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搬家，她寻不到地方。有人曾经在横浜桥附近见她乘坐在人力车上，衣着尚可，匆匆而去。大概生活暂时尚过得去（当时乘坐人力车出行很平常），但此后再没有音讯。

第十七章　记忆中的许妈

继阿花之后，我家又请来一位许妈。她在我家呆得时间较长，而我也不再是意识混沌的婴儿，因此对于她，我留有自己的记忆。她是江苏南通人，５０多岁，大概由于在家务农，平素练就了一副好身骨，体格健壮，背起我走毫不费力。她与同乡对话，都用方言，十句中有九句我听不懂。但平时却讲上海话，可见她在上海帮工，时间不短了。

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那时总由她带我出去玩耍消磨时间。大陆新村弄堂口往东迤南，有一爿“老虎灶”。一口硕大的铁锅，煮着沸水。附近居民谁要冲茶或灌暖瓶，往往花一两个铜板立即可得，需要沐浴的住户只要去说一声，就会有人挑一担滚烫的热水送上门来，并且倒入浴盆，服

务周到。开办“老虎灶”行业以南通人居多。许妈常领我到那里去玩。这里是劳苦人民集聚的地方，百工杂艺，七十二行，为求谋生，各有其能。有时玩到傍晚，估计我有点饿了，许妈便摸出一两个铜板，临时买个扬州小贩的提篮点心（如“老虎脚爪”、“麻油馓子”、“脆麻花”等等）让我充饥。这在无意之中使我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的一角，模模糊糊地知道上海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这么一些去处。

从大陆新村弄口直接往北，约走百米以外，便呈现着另一番风光。竹篱茅室，前后错落，瓜棚豆架，相映成画。到了秋天，有时候眼前是一片青纱遮目的玉米田野。这时候往往是许妈带我捕捉螳螂和蚂蚱的大好时机，也许在这里她能够呼吸到一些类似家乡农村的气息吧。

随着年岁增长，我被送进幼儿园“关”了起来，这些如画一般的生活，也就永远告别了。

由于小时候留下了支气管哮喘的病根，这不但使我痛苦不堪，而且也给许妈带来了很多负担。病一发作，我便不能平卧，她只能扶持着

我，坐在胸前，一夜不能合眼。直到东方发白，喘息稍停，她才轻轻放我入睡，自己又须起身干别的事去了。

父亲去世，我家搬到法租界霞飞坊以后，她就辞别要回故乡。她对母亲说："大先生已不在世，许先生也很艰难，我回家养老去吧！"临走时答应以后每年都来看我，但实际上并没有常来。大概由于年纪较大，出门不便了吧！直到１９４６年春天，我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她确实践约来看我了。但见她头已花白，行动也颇蹒跚。见到我似乎很高兴，但不由地露出一丝悲意，颇为伤感地说："弟弟，这次看你长这么大了，回去也放心了，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了。"母亲和我都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请她以后再来上海住住。

临别时她默默无语，黯然神伤，眼眶里饱含着泪水，还给我塞了一些零用钱。我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忍着悲伤，默默地送她上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那慈祥而饱受生活磨难的面庞，只能对她留下的照片，沉入深深的

思念之中。

第十八章　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

　　１９３６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的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进入这一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

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么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饭食，一眨眼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

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以至于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自6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6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5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第十九章　诀别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有一天，父亲的呼吸比较费力。内山完造先生得知，就亲自带来一只长方形的匣子，上面连

有一根电线可以接上电源。打开开关以后，只见匣子微微发出一种“吱吱嘤嘤”的声音，匣内闪出绿色的微光。过了一阵，便可闻到大雷雨之后空气中特有的一股气息——臭氧。１９３６年9月１２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夜内山君来，并持来阿纯发生机一具。”说的便是这件事。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呼吸舒畅一点，但试用了几次，似乎没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内山先生也就派人取回去了。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一个7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１０月１９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

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你不要上学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

不一会儿，来了个日本女护士，她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心脏是否跳动，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用振动方法，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也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然

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连衣襟都湿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那一向无所忧虑的幼小心灵突然变了，感到应该和母亲共同分担些什么，生活、悲哀，一切一切。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你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的怀抱，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第二十章　面膜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开始杂乱起来，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上粘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

胎具很满意，转头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引发气胸，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粘有父亲７根胡子，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之故，以致腮部下陷的吧。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５０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副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１９９９年，上海鲁迅纪念馆重建。在新馆落成典礼上，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同志和我一起商量，认为胡子里有父亲的ＤＮＡ，或许若干年以后会有科学研究价值，应该以特殊的手段专门保存。这当然是好事，作为鲁迅后人，我十分感激和欣慰。

第二十一章　须藤医生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１９４９年７月，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

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作者注）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敬祝

健康

弟建人启

七月十四日

到了同年１０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ＤＵＮＮ）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１０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

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有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１０月份你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你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

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日本访问，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来传个话，问候几句。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

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第二十二章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建人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

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急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像得出的。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

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站在父亲床前，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仅是“尽人事”而已，毫无效果的。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６０多年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

第二十三章　丧事和棺木

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现在看起来那里离市区不远，而那个年代，被视为冷僻的远郊，所以有一大块地方可供土葬。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

我没有跟随母亲去看过墓地的印象，只有和母亲、孙夫人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和婶婶王蕴如这几个人一起去挑选棺木的记忆。那是在万国殡仪馆职工来移走父亲遗体后的次日。我们是早晨乘汽车去的，先看了几家中国人开设的棺木店，店铺陈列的棺木，有些档次很高，也有平民化的。它们清一色是中国式的棺木，板材有些很厚，显得很笨重。油漆上等，光泽鉴人，闪闪发光。也有本色的，未曾油漆过。走了几家都不中

意。听到大家议论，倾向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父亲的身份。因此，后来转回到万国公墓附设的售棺展示室，从西洋式里挑选合适的。我看见母亲反复巡视，打算选定一个中等价位，经济上能承受的棺木。她们边看边议，最后大家让母亲买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也就是人们在葬礼照片里所看到的那一具。我感到母亲的犹豫。但时间过午，不再寻找另一家，便这样确定了。

有文章说，这具西式棺木是宋庆龄出资购买赠予的。胡愈之先生也有这样的回忆。对于宋先生，我始终心存感激，因为无论她与父亲的友谊，对父亲生病和丧事的关怀帮助，以及后来对我们孤寡母子的照料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或许她有过这个动议和表示吧。但是，我从母亲挑选棺木时和婶婶王蕴如商量的判断，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

除了棺木，连葬礼费用、殡仪馆等等的开支，据说也有文章说是出于“救国会”的全力资助。对此我仍是这个态度，不论是与否，一样的

万分感激。因为，“救国会”确实也对父亲的后事给予过极大的帮助。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一点。

　　但是，从虹口搬迁到法租界稍稍安定之后，母亲就结算丧葬的开支，全部的支出按当时物价，令人惊骇。母亲还取出一份银行活期存折，指着告诉我：“原先爸爸生前，考虑到如果自己有生命的意外，你年龄小又多病，恐怕我一时离不开家里去寻工作。你还要去读书、看病吃药，积蓄了这笔款子，粗茶淡饭可以将就几年。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了。为了节省开销，请叔叔婶婶全家搬进来同住，也好有个照应。我寻到一家学校去教书，可放心离开半日，你在三叔家里共饭。要乖，听话，妈妈喜欢你。”我以为母亲没有必要向稚龄 7 岁的儿童讲不实之言。也许“救国会”确实有这个愿望，或者有过决定，但是经费拮据，最终难以兑现。

第二十四章　兄弟失和

１９１９年２月，父亲卖掉绍兴祖居老宅，将全家迁往北平。这之前，周作人见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父亲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９个月。

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鲁迅原配。编者注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

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

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１０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也不知道她在枕边向周作人吹了什么耳边风，在父亲身上泼了什么污水毒涎，——对此别人永远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这一天，１９２２年7月１９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函，外书“鲁迅先生”，信里边咬牙切齿地写着：“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父亲感到诧异，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可见羽太信子这一口咬得多么毒！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

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长子的新家。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

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们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至于情况究竟如何，我这个小辈当

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不过，我以现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

第二十五章　八道湾房产

父亲被逐出了八道湾，但八道湾房产的名头仍是他。前面说过，八道湾的房子是卖掉绍兴老屋的钱所买的。这院子里外三进，父亲将之安置母亲和三兄弟的家眷。父亲为此请了几位乡亲朋友为见证人，订了一份契约，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 4 份：三兄弟各占一份，母亲（我的祖母）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产主是周树人（鲁迅）。对此，周作人很清楚。但父亲去世仅几个月，尸骨未寒，他竟私自换写了一份契约，将户主姓名变成他自己，还找了几个“中人”签了字。而这一切，在上海的建人叔叔和我们母子都毫无所知。直到朱安女士去世，许多朋友赶到西三条去保护鲁迅遗物，这份契约的照片才被母亲的好友常瑞麟发现收存。

周作人侵吞了八道湾房产后，将空余的房屋出租收钱。而祖母和朱安女士的生活费仍要远在上海的母亲承担。当时我们孤儿寡母生活本已十分拮据，但母亲总是及时向北平寄钱，我从她给祖母的信中多处读到因供奉不丰而深感愧疚的语句。母亲还给周作人写信，“恳求”二先生能“负担一半”祖母的生活。但几次去信都不得回复。

当年与祖母相熟的俞芳也曾告诉我：从太师母和许广平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自鲁迅逝世至１９３７年底共１４个月，太师母和朱安的生活费全部由许广平承担的。直到１９３８年1月开始，周作人才承担太师母的生活费５０元。但是物价在飞涨，而生活费却一直没有增加，太师母过的日子自然很拮据了。尤其在日寇侵占期间，周作人生活很富裕，出入汽车，家里开销很大，可是对老母寡嫂的困难仍然不予理睬。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附逆被判刑，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八道湾的房产，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周作人的那部分，也就是三分之一。并且分割得很客气，不是竖“切”而是横“切”。这样，前院

由国民党的部队占有了，部分后院仍让周作人的家属使用（应当说是很照顾的）。也就是说，从此，他们住的是产权属于父亲和叔叔的那两部分房屋。但是看来周作人并不作如是想，至少羽太信子并不这样认为。

那是１９４８年，北平解放。我随母亲从东北南下到北京，住在旅馆里。某个冬日的下午，章川岛先生陪我到北城购物，因时间尚早，章先生便问我："要勿要到你们的房子去看看？此地靠近八道湾，侬爸爸买格房子就在葛（这）里。"我当然高兴，催促快去。我出生在上海，远在北平的祖母极其盼望能够看看我这个大房孙子，可以说是魂牵梦萦。但她老人家由于健康原因，始终未能南下。我也几次失去北上省亲的机会。南北相隔，只有寄照片以解老人的思念，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朱安女士也同样无缘得见。但随着我年龄的渐渐长大，便不时听到有关八道湾的事，知道那里也是自己的家，心里就有一种亲切和向往。

走进八道湾１１号，但觉院子里空空荡荡的，很寂静，来到里院，看到一个老妇坐在小凳上晒太阳。老妇把章川岛招呼过去，大概是询问来者是谁。章执礼甚恭，谁知仅简单地问答了几句，忽见老妇站起，对着我破口咒骂起来。手又指又画，气势凶猛，像是我侵入了她的领地。章先生连忙拉我退到外院，告诉我，她就是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照理说，我是她亲侄子，我们又是初会，上一辈哪怕有多大怨仇，也该与我不搭界，而她一听说是我，竟立即做出这种反应。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踏进八道湾一步。到人民政府成立后，叔叔和我母亲将属于我们的这两份房产共同捐献给了国家。

第二十六章　祖母对周作人的看法

这里，我还想说一说祖母对这个二儿子周作人的议论。当然，那时我还小，又远在上海，不可能亲耳聆听她老人家的谈话。但有一个人却是不时地听到过的。她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俞芳。

关于俞芳，我想有必要做些介绍。她也是绍兴人，如今已９０高龄，退休前是杭州市学军中学的校长。她是十二三岁时认识我父亲的，那时她们三姐妹由大姊俞芬带领着从哈尔滨去北平求学，住在砖塔胡同６１号她们家好友钮伯伯家里。由于她们的父亲俞英崖和我父亲也认识，就与我祖母互有来往。砖塔胡同６１号有3间空房，正好那时周作人和父亲闹翻，父亲要寻房子搬出八道湾，祖母也不愿住在周作人身边，便想到俞芳那个院子里这3间现成的空房，这样他们

就成了同院而居的近邻，由此愈加熟悉。俞芳入北平培根小学读书时，就是父亲为她作保的，后来她毕业于北师大的数学系。

在此期间，每逢节假日和过年，俞芳姊妹经常去陪伴祖母喝茶聊天，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５年夏，直到俞芳毕业工作为止。这5个年头里，祖母写给我父母的家信算来足有１００多封，平均每月两封，其中绝大部分是俞芳代笔的。俞芳总是先拟了草稿念给老人家听，让她提意见修改内容和口吻，誊清之后，老人家还要亲自过目，从不含糊。所以，俞芳对北平鲁迅的家事十分清楚，她是一位绝好的见证人。

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

“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祖母为此叹道：“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又说，老二如此昏聩！羽太家庭经济困难，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七·七事变前，祖母对俞芳的姐姐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教育界开会的消息，报纸上很少有老二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说这话时心情很沉重。

父亲逝世的电报到八道湾，周作人找了宋紫佩先生同往西三条告诉祖母。事后，祖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来，我心里已猜想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过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

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祖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这些都是俞芳告诉我的。

第二十七章　羽太信子姊妹

建人叔叔的婚姻坎坷而辛酸，我曾听母亲讲过。但翻看有关资料和回忆文字，这方面都有所回避。现就母亲告诉我的，加上俞芳提供的材料，一并记述下来。以免湮没。

一切都要从羽太信子说起。周作人讨了这个日本老婆竟“乐不思蜀”，不想回来了。还是父亲费了许多口舌，还亲自到日本“接驾”，他们才全家回到绍兴定居。从此父亲一个人在北平挣钱，每月寄回所得，以供养绍兴一家人的生活，包括周作人和他的老婆。为了让信子在家中有稳定感，便把经济大权交到她手里，让其主持家务。也许她自知出身平民，起初还有自卑感（她原是父亲和周作人东京留学时寄宿房东的女仆，专事打扫一类杂务。这是父亲同学告诉我母亲的）。

但随着看到家中老太太（祖母）和朱安都放权，又不以尊长的身份约束她，那种要完全主宰周家的野心就此逐渐膨胀起来。

那么，周作人在家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这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家里有一个男管家齐坤，他采购家庭日用品，往往报虚账，连买双周作人穿的布鞋都加了不少码，从中“揩油”。日长时久此事泄露出来了，要向周作人讨个主意是否该辞退他。周作人沉思了一会儿，竟答复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家里是百事不管的，他只要自己过得舒适安逸和书斋的宁静。为此他对羽太信子听之任之，处处姑息迁就。

不过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要有自己贴心的人。待她怀了孕，便提出要让她的妹妹芳子来华照料。芳子小她姐姐 9 岁，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

据熟悉内情的俞芳告诉我，其实芳子起初并不愿意到中国来。因为她知道自己姐姐的脾气，任性、自私、跋扈，还有“歇斯底里”症，常常无端发作，难以服侍。可是考虑到家境困难，姐姐又连连去信催促，还汇去了旅费，这样，才在犹豫拖延了两年之后，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来到绍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起居大大优裕于日本的家，这自然使她乐于在中国生活了。

从此，羽太信子得到妹妹无微不至的照顾，芳子对她的任性和跋扈也总是逆来顺受。与此同时，芳子的性格也渐渐起了变化。她本是无知软弱的人，但在信子日长时久的熏陶之下，思想行为渐渐有了姐姐的影子，这也许就是她后来那样无情对待叔叔的根由吧。

第二十八章　建人叔叔的婚姻

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离不开这个妹妹了。为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家里恰好有个尚未成家的小叔。虽然在她看来这个小叔子性格软弱又没学历，不能挣大钱，但总比嫁给陌生人进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开头，信子的谋划未能实现。那时建人叔叔正与小表妹（舅舅的女儿）感情颇笃。可悲的是这个小表妹后来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亲自为她料理丧事。这就给了信子实现计划的机会。终于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对母亲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的。这事对于周作人，若说他没有参与，从事理推想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哪怕他对此有过些许异议，原是很容易被阻止的。但最终老实的叔叔还是被引入了信子的圈套，并从后来周作人对自己亲弟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实事求是地说，建人叔叔与芳子不能说丝毫没有感情基础，结合以后生活上相互慢慢磨合，又互教汉语日语，并且很快有了孩子，应该说婚姻还是美满的。但信子并不把妹妹成家放在眼里，仍要她像使女那样守待在身边。直到晚上，仍不让她回房去照料自己的孩子，而要建人叔叔去抱去哄。信子甚至把建人叔叔也当佣人看待，支使他去烧茶水，动作稍慢就信口训斥：“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叔叔老实，看在夫妻情分上，总是忍耐着。不料到后来，由于信子的不断挑唆，连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缝。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婶婶王蕴如，很多是俞芳告诉我的。如前面介绍的，俞芳长时间陪

伴我祖母，又是邻居，所见所闻，应当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再说祖母是一位和蔼、宽容、大度的老人，她的看法应该被认为是客观可信的。俞芳和我通过多封信，时间在１９８７年，那年月还比较有顾虑，不晓得披露的时间是否成熟，就此搁置下来。现在我就将它公诸于众吧。

那是全家从绍兴迁到北平八道湾后的事，已属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于没有相当的学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他一边到大学去旁听社会哲学方面的课，一边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但他在八道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个吃闲饭的“�作头”，整天指桑骂槐，她还大声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指父亲和建人叔叔），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连建人叔叔去北大听课也冷言冷语，说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当面侮辱叔叔。这是俞芳亲眼目睹的。她这样告诉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出去郊游，三先生（指建人叔叔）要同行，当他刚要迈

入车子，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吗？钱呢？"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词。对此建人叔叔实在忍无可忍。

第二十九章　叔叔的南下

　　父亲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了求职信。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在杭州教了几年书。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１９６９年，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因患肝炎去杭州休养，住在建人叔叔家里。有时叔叔去上班，婶婶王蕴如得空，陪我聊天，谈起叔叔离京后的艰辛生活和她沉积于心头的委屈，这样，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情况。

　　婶婶告诉我，叔叔离京前，父亲嘱咐他，你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么容易再进这个

家门，你在外谋生，自己存些钱，不必寄钱回来（那时全家的生活开支都由父亲和周作人两人承担着）。

叔叔进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向以严厉管辖下属著称，他用国外进口的打卡机考勤，这在当时的出版界还是首例。上班不准迟到，违者以累进法罚扣薪金，直至开除。叔叔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敢稍有懈怠，还经常带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侍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

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祖母对此深为不满，不止一次在亲友面前说：“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道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却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这些话是俞芳亲耳听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绝去上海与丈夫团聚，反而又策动向叔叔要钱。当时叔叔在商务印书馆资历尚浅，工薪菲薄，每月只有８０元的收入，他就按月寄回３０元。芳子尚嫌不够，仍不断地催逼。叔叔无奈，只得汇去月收入的大部分——５０元。他总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带领子女来与自己一起生活，因此他在信中一次次提出这个要求，而芳子始终不予理会。后来，叔叔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但他还得硬撑着每天去上班。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芳子的态度还是那样冷酷，坚决不肯去上海照料丈夫，甚至也不让丈夫回北平休养，哪怕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５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

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 5 年。

第三十章　叔叔与王蕴如婶婶

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叔叔与王蕴如结合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没有“名分”，婶婶却心甘情愿，并且勇敢地与叔叔一起承担起生活的艰辛。由于叔叔每月还要向北平寄钱，两口子的生活甚为拮据。当婶婶怀的第一个孩子将要临产时，为了省钱，她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去坐月子。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是祖母８０岁大寿。那年父亲刚去世，她老人家与八道湾的次子又形同陌路人。因此，极盼望母亲和我、还有叔叔婶婶能够北上相聚。祖母更希望能见到我这个孙子，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心愿。不料正在母亲替我准备北上的冬衣时，我突然出水痘了，不能见风受凉，旅行只得取消，由叔叔婶婶做代表了。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的事实婚姻

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

　　不料，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平息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叔，给以“法办”。幸亏正遇过新年，领事馆的值班人员喝醉酒了，答复说不能前往，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提早返沪。

　　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婶婶说：“一旦我不在了，或许他（丰二）还会来杀你的。”

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下狠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只有长女马理没有参与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给她２０元，通过祖母转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本为止。

到了日伪时期，叔叔与王蕴如婶婶已有３个孩子，是个５口之家了。但当时市面上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而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来维持，其艰难可知。不想，就在此时，作为同胞兄长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凶辣的一手：他依仗日寇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下令，由会计科从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付汇给周作人。这无异是釜底抽薪，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叔叔的性格和所从事的专业，想要另找职业是不容易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惟有忍气吞声保住“商务”这只饭碗。

第三十一章　周作人与周建人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发现叔叔房间里书柜顶上那台玻璃罩的显微镜突然不在其位了。这台显微镜是父母买了送给叔叔的。他专研生物，没有这工具真如砍削他的手臂、挖掉他的眼睛。若非无奈到了借贷无门，我想他是绝不愿捧出去变卖的，我不禁想起他平时谈论生物学，话题总离不开显微镜，讲得眉飞色舞，连苍白的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自从卖了显微镜，他再也不提这个话题了。

　　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笔名的老友，更

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仅“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势。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之外，他认定稳操胜算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必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许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院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又向妇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

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一切，除了我，婶婶从未向她的女儿、女婿提起过。也许往事太过悲

苦，她不愿以此刺儿女的心吧。这样，我成了惟一的“孤证”。婶婶当时是含着眼泪跟我说的，如今我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我有责任将之公诸于众，供史家去研究。

关于周作人和周建人，这两位兄弟的恩怨纠葛，我已将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

近期看到一部电视剧，有一场戏表现他们兄弟俩在一个礼堂门口相遇，互相交谈，似乎不存

介蒂。我不知道该剧的根据是什么。

至于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建人叔叔倒与他有过两次晤面。丰一曾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去世。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

第三十二章　叔叔的儿女

这里，我还得说说建人叔叔几个子女的情况。

叔叔与婶婶所生的三个女儿，其中大姐周晔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她在父亲九三高龄视力衰退不能执笔时，毅然请了长假，听父母慢慢回忆，做成卡片，再比照核对别人的资料、回忆，形成文稿，又经过叔叔的补充纠正，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此书经我的推荐，于１９８４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惜大姐未及看到，已经患肺癌去世。

二姐周瑾也垂垂老矣，因患红斑狼疮至今卧病在床。她是长期搞药检的，也许因此而染病的吧。

周蕖年龄最小，如今也是望七老妇了。

叔叔与前妻羽太芳子所生的二子一女，我最早接触的是他的长女马理（即周鞠子）。她于１９３６年夏天曾由建人叔叔送到上海大陆新村我的家中，住在三楼的亭子间里。她大我１０岁。我当时已经上学，正逢暑假，很感寂寞。因此她的到来，使我极其兴奋，总是纠缠她陪我玩、讲故事。马理姐姐文静而又耐心，面貌圆胖，肤色浅白，讲话细声低语的。母亲常常劝我让她有些个人时间，看看书籍之类。住了几天后，她由父亲陪着去了医院，经过检查，患的是扁桃腺炎，几天后动了手术，手术后回到家中脸色苍白，我守在旁边看她极为不安，讲不出话，似乎在强行抑制胸腹的不适，一会儿见她冲到墙角，呕出许多血液，十分恐怖。父亲见到这种情况，再雇车到医院。后来血止了，休养了许多天才好转。不久，她迁往别处，据说报考学校并不顺利，又返回北平去了。父亲的日记里有关于马理到上海的记录，也有多次同去看电影的记载，可是割扁桃腺之事却未能找到，不知为何。我是

向周瑾姐姐电话证实这次割扁桃腺手术的。

父亲在给北平祖母的信中，曾提到马理到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报考音乐学校。还说到我和马理姐姐：“他同玛利（即马理）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姐妹，只生他一个，冷清得很。见了玛利，他很高兴，但被他黏缠起来的时候，我看实在也讨厌之至。”

但我与这位姐姐相聚仅此一次。以后天南地北，再也不曾见过面，连一封信都没有通过。听婶婶王蕴如说，当年叔叔按月给她寄钱，她总是不敢张扬，偷偷到祖母那里去取的。又听说她学的音乐，婚后晚年定居唐山，不幸死于１９７６年那场大地震。

建人叔叔在北平的幼子叫周丰三，和母亲芳子一道寄居在八道湾。他平时学习很好，虽还是个中学生，却关心国家安危，有正义感。由于生活在周作人的家庭环境内，使他能日常耳听目睹这位二伯的所作所为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心里很不赞成，因此他与这个家的气氛总是格格不

入。在周作人附逆越来越明显时，丰三多次劝说，请他悬崖勒马，不能投向日本侵略者，不要去当“华北行署”的大官。周作人丝毫听不进去。那时丰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眼看劝说无效，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又孤立无援，为此而郁郁不乐。这是周作人儿子周丰一对人说的。丰三最后竟想到以死相谏，白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至于前面说到的那位曾要持刀弑父的周丰二，我后来倒是见过一面。那是北京解放两三年后，我们住在西城区大石作胡同１０号。春节时他来拜访。他那时在中学当数学老师。对我这个弟弟显出很有好感，也许他本人没有亲兄弟了吧。

他告诉我说喜爱打猎，愿意带我一起去打野鸡野兔，郊外有很多野味可打，这项活动很有趣的。我一方面对此没有兴趣，也和他不熟，此后便没有再来往。当然，其中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那时建人叔叔已和这个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我自然也就不便与之往来了。

第三十三章　朱安女士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并有了我这个儿子，对此周作人夫妇不予承认，并视之为仇敌，这是人所共知的。既如此，他应当把其视作“正宗”的嫂子朱安女士好好供养起来，这才顺乎其理。再说，他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偏要将朱女士的生活推给远在上海的母亲来承担，而母亲虽然拖着我这个病孩，生计极其艰难，有时还得靠朋友的资助，但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这副担子接过来了，直到她病故。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在前文已经叙及。这里，我要补述一些朱安女士与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又得声明：因当时我年纪尚小，关于这方面的事，所知有限，而且直到朱安女士去世，我都未曾见过她。但我从朱女士的书信中看到，她对我们母子的态度与周作人截然不同。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父亲去世，朱女士当月就给建人叔叔写信，要他转告母亲：欢迎我们母子搬去北平与祖母和她同住，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祖母——海婴注所钟爱，倘肯莅平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安逝者。"并且表示，若母亲接受她的建议，她"当扫径相迎，决不能使你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连我们母子的居处都做了规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

我那年才７岁，当然不可能晓得母亲是如何回复的。而事实是我们没有去。这事母亲后来也不曾谈起过，但我理解，因为这是个不现实的建议。别的不讲，单父亲的遗物主要都在上海这一点，母亲能忍心离开它吗不过，我现在重读这封信，深切地体会到，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没有文化，却能承认现实，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为"妹"，视我如己出，这与号称新派大学者的周作人对比何等强烈！

在此后的年月里，她常有书信致母亲，写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因为母亲总是把她的生活放在心上，除了自己直接寄钱，还不时寄到北平朋友那里，托他她分期送去，同时也代母亲去看望朱安。对此，她在信中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生难忘”并体谅地讲：“您一个人要负担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钱后怎么开支，她常常讲得很具体。有一回，母亲寄了钱，她又得到一笔馈赠，就主动来信提出手头的钱“数目已多，贵处要用我还可以给兑回一部分去”，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坦荡和对母亲的体谅。

１９４６年冬，母亲曾去北京清理父亲遗物，也看望了她。母亲回沪后，她来信说：“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更表现出朱女士对母亲有着一种依恋情怀。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关照，她能有这种感情吗？

第三十四章　朱女士与我们母子

对于我，朱女士表现了慈母般的关爱。有一次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

当她得知我入迷无线电时，就在信中说：“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表露了她的欣慰之情。当我长到十五六岁时，她就开始直接给我写信，除了让我向母亲转告她要说的话，还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我们母子俩。我体会到，她是把我当做自己的香火承继人一般看待的。

由于当时物价飞涨，以致母亲寄去的钱，到她手里就要遭受贬值之苦，为此总感生活拮据。但她宁愿受苦，不肯轻率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一次她给我写信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只要交给他父亲的作品，她“逊谢不收”，当然也拒绝给他父亲的任何文章。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只有一次她破了例，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她来信告诉母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她开头仍“辞不敢收”，但是这位秘书长说出一番道理，可把她懵住了。秘书长这样告诉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送钱还有这种命令硬送的，难怪将这位妇道人家降服了，不得不接受。也算是笑话奇谈一例吧。只是委员长此举至今仍令我费解：一方面在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那

么“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什么名堂呢？

朱女士给我们母子的信，主要是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７年她病故前的那段时间，而以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为最多，其中给母亲的１６封，给我的有９封。从信中看，朱女士主要死于老年性心力衰竭等疾病。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朱安女士过世。由于当时母亲正受到国民党监视，不能亲自去料理她的丧事，只得请常瑞麟阿姨、宁琳先生及一家阮姓远亲代为办理。

我这里还要说一件事。１９８６年，根据鲁迅研究的发展，北京鲁迅博物馆计划恢复“老虎尾巴”这排房子的陈设原貌。这就势必要恢复原朱安女士的卧室，并且她睡那张床亦已证实，就是那架竹床（而此前一直被误认为是祖母生前所睡。现已查明，祖母生前睡的是从绍兴乡下带出来的旧式床，有床头、床栏、尾挡板，四周有支杆可悬挂蚊帐。祖母１９４３年过世后，这架床连同祖母日用品都被周作人搬去，这架床也成了他儿子周丰一保姆关大妈的卧床，后来干脆送给

她了。由此可见周作人之为人。现此床已回归“鲁博”，是拿一架新床去换回来的）。

为什么原先没有呢？因为自从１９４３年祖母去世，朱安女士就睡到她的房间去了。而把自己的卧房改成父亲藏书的存放之处，为的是可以腾出空房租借出去。１９４６年母亲去北平所见的就是这个格局。故在“鲁博”筹备时，根据母亲的记忆，在此室挂了“鲁迅藏书室”的铭牌。现在要改过来，这就涉及到朱安女士该不该在“鲁博”出现的问题。为此馆里叶淑穗同志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同意。因为谁也否认不了朱安女士曾是父亲妻子这个事实，何况这许多年里，她与我们母子还有这么一份情。

第三十五章　内山书店

“不卖血”，这是父亲对内山先生的评价。即是说，他不出卖朋友。作为一个日本人，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这里就我所知，对这位可尊敬的前辈的生平和身后情况做些补充。

内山先生开设的内山书店，我幼年时去得较多，可说是相当熟悉。单开间的门面，左右有两个橱窗。店里经常出售最新书籍，橱窗中的玻璃上不时更换着招贴广告。读者进店内仿佛来到了书籍的海洋之中，书架一直顶上房顶，每排每架，满满当当，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售书实行开架制，高的可达顶层，低的可取中层书籍，读者可以自己上梯取阅选购，店员毫不干涉。书店中间，特设新书台，陈列新到书籍，集中醒目，方便读者，使之容易寻觅近期书

刊，便于浏览选购。这些书籍大都是洋装的外文版本，我因年龄太小，全看不懂，所以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现在一无印象。不过每次来到书店以后，总要爬上高梯，居高临下，俯视一切。俨然成了一个“盖世英雄”。这似乎也没有遭到过父亲的呵止，有时到他起身回家时，才招呼我下来一同回去，这个印象总是历久不忘。

在内山书店逗留，除了可以任意攀登的木梯，还有两样东西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存在，不能淡忘。这就是夏天放在门口的茶桶和冬天摆在屋内的火盆。

３０年代的上海，有些店铺夏天备有茶桶。有的用大缸，有的用木桶，也有用铁皮焊成的洋铁桶，外装两三个水龙头，并备有简易的竹质或搪瓷水杯几只，供劳动者临时休息解渴饮用。内山书店也不例外，门口也有这样一个茶桶，在夏天为劳动者施茶。父亲与内山书店的“施茶”措施不知有何关系，也不知这种关系始于何时，后来我看他的《日记》，在１９３５年５月９日项下，记有“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看来至少是赞助的。

看了这条日记，使我模模糊糊地想起，有时父亲远从绍兴嵊县购置茶叶５至１０公斤（大概即所谓“一囊”吧），或者即为此用也说不定。大概这类山茶叶特别禁泡，投入桶内，茶味能保持到一定时间，足能帮助劳动人民解渴之用。当时因为自己年幼，不懂这些事情，也没有向父亲当面问过，所以只能是一个猜测罢了。

上海夏天酷热，冬天则又变得很冷，但一般店铺，店堂内并不生火。内山书店却不是这样，因为那里经常有人选购图书，有时还有“漫谈”活动，所以生有炭火照顾来客。冬天我随父亲到内山书店时，就见他和完造先生在低矮的圆形瓷炭盆边围坐，盆内架一只三腿圆架，上坐茶壶，冲饮日本宇治特产清茗。我无事可做，对拨弄炭火发生兴趣。用铁筷（尾带金属链条）拨夹火炭，大放阵阵暖气，驱赶室内的寒冷，使大家的脸颊热得通红。

父亲单独带我去书店的机会不多。往往是父母两人携我同去。要说购书，我在这里没有买过

书。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次，从这里又转到另一家中国人开的旧书店，看到的书籍不再是厚厚的日文书和其他外文书，而是可以识得一些字的中文读物，不禁兴高采烈，赶快挑了几本，想买回家去阅读。谁知尚未开口，却看到父亲现出一副从未见过的极不高兴的脸色，便放下手中的书籍。母亲领了我跟他一起很快离开了这个书店。甚至连他已经挑选好的书籍也放弃了。当时我心里纳闷，不知出了什么事。事后，母亲向我解释，说是旧书太脏，有些是病人出售的，放在书店里又是什么人都来翻阅，小孩子抵抗力较弱，容易传染上疾病，所以父亲才那么着急。

第三十六章　两个不解之谜

父亲去世后，我们搬离虹口区，便极少和内山完造先生接触。信件、书刊不再从书店转递，店员也没什么来往。日军进租界，没收英美等对日宣战国的财产，内山分配到南京路一家三四个门面的书店，此处原是中美图书公司。书店规模不小，但生意清淡。据说内山完造对此店并未下力经营。内山的《花甲录》里讲：上面来“一道让内山书店接管中美图书公司的命令。所以使我十分为难。由我管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战胜而扩大书店）。所以，让长谷川和中村二人去经营了。”

母亲在日本宪兵队遭受７６天磨难，日寇严刑未能得到什么口供之后，迫于社会舆论要释放母亲。为了掩盖其罪行，不直接从宪兵队放出，

而是转移到沪西７６号“调查统计局”，由那里取保释放，并要由中国人开的店铺做担保。母亲回答没有相识的中国店铺，只认识内山书店。７６号开始不允许，后来觉得人不是他们抓的，扣留下去不好向舆论界交待，只得让母亲打电话请内山先生来保。内山请示了宪兵队，出面作了保，母亲才于次日离开那时人们视为魔窟的７６号。

过了两个月，７６号发信要母亲去“谈话”，要出去的人照“我们这里的规矩，把朋友介绍进来”。母亲的回答是：“我一直呆在家里，不敢和任何人来往，别人也不来看我了，哪能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又过了不久，大约正是春夏之交的时候，母亲接到内山完造的通知，邀她某日下午到虹口“六三花园”喝茶。母亲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和我商量，既然保人让去看来是躲不了的。她让我陪她同去，也好有个回旋余地和托辞。

到了那天，我们乘了有轨电车到达虹口，走到“六三花园”已经比约定钟点迟了少许。见内山先生正在张罗，还要出席者签名，他见到我们母

子俩，目光似乎一怔，迟疑了一下，像是想不到你们竟然会来。他从入口处的桌上，拿一条红色名签，替母亲佩在胸前，又看到我，找不到空白无名字的条签，寻了一条上面写着“陶晶荪”的，翻过来填上我的名字。

我随意向里望去，熙熙攘攘半屋子人，都在高谈阔论。我们只呆了一会儿便离开了。估计内山也是遵照上面什么意图，通知母亲去，母亲也到了，证明没有离开上海，算是给了担保人的面子。内山完造没有提出什么希望或者任何暗示，因此，这个哑谜只能由知悉内情者来解释。我当时一步都没有离开母亲，是可以这么讲的。也许这真是一件“××××之谜”吧。

第二个与内山先生有关的不解之谜，也是发生在抗战期间。虹桥路万国公墓父亲的墓碑，上面镶嵌着烧瓷头像。不知何时，这像被人破坏，且敲得很技巧，沿脸孔周围细槌击凿，正好是当中面容那部分失去了，四周却没有大的裂痕，不像有人因泄恨而猛力打击，或者被顽童以石块敲砸所致。是行家里手小心翼翼地把整个瓷像面部

取走了。问题是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从善意分析，也许是为鲁迅墓的安全着想，以此掩人耳目，才费了这番苦心。母亲在一篇文章里，依据那时的世道人心，有过上述的猜想。

后来，市面比较平静了，万国公墓的管理虽仍不如前，倒也收拾了破烂的门墙，对整个墓园也稍做了修整。这时有朋友告诉母亲，父亲墓碑上那块被敲掉的瓷质画像，又完整地按原样复制烧了一块，重镶在碑面上。这位无名仁人是谁？真令人诧异。有一次在某场合，问了内山完造先生，他一口否认。又过了一段时期，母亲又向内山书店的老店员，惟一的一位中国雇员王宝良打听，问他这件事是不是内山先生所为，王没有正面承认，也没有强烈地否认。我想，这谜底已经不难解开了吧。

第三十七章　内山的晚年

日本投降后，内山完造先生在上海的财产被没收。这时他的夫人内山美喜已经去世。因此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被遣返回国时，他是赤手空拳孤零零一个人走的。

内山先生回国后，在反思的基础上感到和鲁迅认识交往的几十年间认识了中国。他热爱中国，希望日中两国恢复友好，决心向有头脑的日本人传播鲁迅思想。这样，他为自己的后半生选择了“点燃鲁迅精神的火种”（日本学者吉田旷二语）这样一条生活道路。

那是１９４８年1月，内山来到东京岩波书店见到小林勇，岩波老板岩波雄估计也在，他们建议内山先生“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到日本各地去做有关中国的报告”。他接受了这

一建议。

就这样，他第一次在日本长野县高远的一个小学向教师做了“漫谈中国”的演讲。从这第一步起，他的整个后半生从北方的北海道到南边的九州，足迹遍布全日本，巡回演讲超过８００场！他的讲演不计报酬，只要对方邀请，总是欣然前往。空隙间还笔耕不辍，写了《流着同样血的朋友》等书。这期间还帮助岩波书店做编辑《鲁迅全集》的工作。

内山先生以开设书店起家，经营书店几乎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但自从回国以后，他没有时间再经营书店了，哪怕战后东京百废待兴，正是重操旧业的好时机。可是内山先生却一心只宣传日中友好，因为他认为恢复日中邦交这件事远比个人经商赚钱更有意义。但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变得拮据起来，虽然偶有稿费收入和朋友的帮助，总是难解长久的困难。母亲得知此事，便和我商议，决定把岩波书店的日文版《鲁迅全集》版税全部交由内山先生领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封委托书。我想，这对内

山先生不无小补吧。

　　这期间，母亲曾有机会几次访日，每回都去拜访他。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到他７４岁那年，终因东奔西走巡回演讲过度劳累而病倒，在糖尿病、胆结石、高血压多种病痛的折磨下不得不休养了。过了不久，我国对外友协，诚恳地邀请他和他的后夫人内山真野到我国来疗养。

　　１９５９年9月１９日，内山先生不停歇地经香港、广州，乘飞机抵达北京，显然，旅途十分劳顿。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应该让内山先生抵京后先行休息、检查身体。而在下飞机的当晚，借一家北方风味的老店丰泽园举行接风宴会。内山先生心情也很兴奋，当然不会拒绝老朋友的宴请。出席宴会的有阳翰笙、西园寺公一等多位友协的朋友。气氛甚为热烈。席间，阳翰笙代表有关方面邀请他们夫妇参加建国１０周年庆典，然后去外地休养。内山先生回答说："那太好了"刚说完这句话，右手就颤抖起来，腿也软了，随即倒了下去。这时正是晚上８点左右。立刻送到协和医院，经过各种医疗措施，终

于抢救无效，于次日晚上９点４０分离开了人世。

　　内山先生的骨灰，一半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第一位夫人内山美喜墓旁，长眠在中国老朋友鲁迅的同一个公墓里，直至迁到专为外国友人安葬的墓地。

第三十八章　内山的未亡人

内山先生过世后，未亡人是内山真野。她是在日本与先生结合的。我们见到她时，估计６０开外，身高１．６０米左右，结实健壮，像劳动妇女。她单身独居在距东京市区几十公里叫板桥的地方，去那里要换三次公交车，花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尚未走到她的寓所门口，她老人家穿着木屐已经从街上迎了上来。

街道很洁静，行人很少。路两侧是门面不大的店铺，似乎都是老店，没有繁华都市那种甚嚣尘上的气氛。真野女士住的临街平房，入门便是居室，右侧卧室，内置一个１００立升小冰箱。环顾四周陈设，可以用“清贫”两字概括。家中饲养两三只小动物，是些普通的杂色猫，那是她收养的无主猫。说着话儿小猫依偎上来，不怕生

人。

老人家正在为一位留学生代管伙食，以此贴补生活，聊胜于无。我国驻东京使馆每逢国庆招待活动，都邀请她去参加。我还从侧面了解到，内山真野女士靠老人救济金和侄子的补贴过日子，平均每天的生活费只有１０００多日元，生计极难维持。因为按日本那时的生活标准，每日这么点钱只够买三碗汤面。看到老人的困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就想：内山先生曾经帮助过许多中国文化名人，其中不仅有父亲鲁迅，还有很多人，比如郭沫若避难逃离上海时，也得到内山先生的救助，他被遣返回国后，又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这样一位可尊敬的友好人士的遗孀，我们难道不该伸出援手吗？

后来，我接到内山真野女士来信。她得知大连市有一家养老院，很多老人在那里疗养。里边也有外国孤老，她很希望自己有机会进那里养老。我把她的请求转到对外友协，等了很久，没有回复。有一次我到北京医院探望阳翰笙，讲到这件事，他很同情内山夫人的境况，应允向王炳

南反映（王这时在友协任职）。之后，得到答复是：大连的国际友人养老院是收留共产党内的遗属的，内山夫人不在此列。这件事使我愧对内山夫人。因此我觉得自己作为鲁迅的后人，有责任代表曾经受到内山完造先生帮助过的所有革命者、文化人士对他处于困厄之中的未亡人予以报答的。

恰好，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间，日本学研社与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在日本出版１８卷日文译本《鲁迅全集》的合同，我的继承权虽被剥夺（我将在另文详述此事），他们总可以用这全集版税给内山夫人一些帮助吧。我提出了这一建议，但久久未见答复。再三探询，才听到一种传闻：周海婴是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是不应当得这笔“巨大”外汇的；又说内山夫人信基督教，心肠很软，凡是有募捐者前来，不用多费口舌，她便会以基督精神，来者不拒，尽其所有去奉献。所以不能捐钱给她，但凡所得，她必保留不住。我于是又设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外汇不必经我手，免得“水过地皮湿”，而是直接付给

我国驻日使馆，由使馆方面保管，或存银行，每月支付给内山夫人若干，这样总可以吧？谁知还是不放心，怕我一旦把持不牢，弄得身败名裂，还玷污了父亲的名声。在这种“好意”的说词之下，帮助内山先生未亡人的计划就此化为云烟。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目的无他，是想告慰内山完造先生在天之灵：我已经尽了力了。我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至于内山真野女士，据闻后来住入了日本的养老院。至我执笔写回忆录时，听说她已过世了。

第三十九章　霞飞坊

前文说过，父亲去世前，曾提出要赶紧搬离虹口。并嘱咐幼弟周建人到租界去租赁新居，只要他相看中意，不必再让父亲复看，定租便可。为此叔叔专门刻了一枚名为“周松涛”的图章。但这事不及进行，父亲已经长逝了。到丧事忙过，稍事休息之后，大致是１０月底，又开始着手搬迁的事。

我们于同年１１月上旬搬到法租界霞飞坊６４号（现名淮海坊，淮海中路九二七弄）。至于为何选择霞飞坊，是否母亲亲自选定的，一直没有弄清楚。在母亲生前我也想不到向她询问这件事。这个谜底直到１９８５年和萧军同到日本参加内山书店新屋落成开幕式，闲聊时他才告诉我，是他和萧红介绍的。原来那时二萧正住在霞

飞坊沿环龙路（现南昌路）一边，是临街楼房的三楼。

霞飞坊建于１９３４年，三层红砖结构，前门是铁栅，透空可以望穿小天井。天井与大陆新村相仿而稍大，前门进入是客厅。后门是木质的。每家后门装有“司必灵”锁。进门有一个小厕所。左（或右）拐是厨房。楼梯木质。二楼、三楼开间大小相同，还有两间亭子间。三楼外有阳台，可晾晒衣被，这是当时的标准结构。据说是葡国产业，法商管理。

霞飞坊第一条弄堂叫“大弄堂”，比较开阔，月租较高。我们租的是中弄，每月租金６０元。入租时房东讲明，每年可免费粉刷油漆一次，如不需要享受这种服务，每年可免一月租金。这约定是１９３６年底的行情，因为当时整条霞飞坊才住了一半房客。第二年抗日战火燃起，租客盈满，这承诺便无形中消失了。

中弄北面是后弄，稍狭，附有几间“汽车间”让有车阶级存车用。那时只不过三五辆车停放在那里，也不知是哪家阔佬的。后来租界居房紧

俏，汽车间遂改作为住房了。

搬迁时，最多的是书籍，一箱箱要从溧阳路藏书室运来。书箱运到三楼，四周不够放，中间还加一行。也有以木箱侧放权作书柜的，记得里边放的是杂志，如《奔流》月刊、《世界文库》等等，前面挡以牛皮纸。洋装书厚重，放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一侧，剩下一半空隙做通道。这时，三楼没住人。

这里有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多年。那就是：从大陆新村搬运家具的劳务，是否请内山书店的伙计？按常理，书店里都是年轻小伙子，而且他们一直对我家给予各种援手，帮带着完成也是合乎常情的事。但当我问及内山书店的老店员儿岛享先生及其他几位时，他们都异口同声讲没有插手。因此对这段历史，多年来我一直无以寻找答案。

有一次，我抱着姑且一问的心情向梅志先生提起这件事，竟柳暗花明，疑窦顿时得到化解。她告诉我：请的是搬家公司。她说那时寻搬家公司挺方便，收费也不算贵，四个搬运工人力、加

运输的车辆，以 4 块钱一个钟头计算。并不必供应搬运工饭食。这个价目足以搬运到三楼或四楼的高度，再高的楼层另计。我倒没问要不要另付“酒钱”或“香烟钱”。以我的记忆，那个年代是有加一点小费惯例的。

第四十章　为父亲墓碑写碑文

现在再说霞飞坊新居的事。父亲的床不再使用了（据说借给许寿裳夫人，后又借给邵铭之）。母亲和我睡在二楼，用我幼时睡的那架床。从这时起，母亲便陪伴我睡，带我三年半的南通籍许妈，已经６０多岁，（她来帮佣时瞒了几岁），体力下降，家乡儿女也需要她回去，在我们搬家之前，她就流着泪走了。

刚搬到霞飞坊，电灯尚未接通，晚间要点白色蜡烛照明。我向母亲要了一册硬皮日记本，记得里边是竖格的。我雄心勃勃，表示要每天记日记，把生活经历写下来，无奈识字不多，写不成句，没几天就终止了。我很生自己的气，这样没出息！

有一天母亲拿来毛笔、砚台和一些纸，嘱咐我书写父亲墓碑上的字。我从未练过毛笔字，真是惶恐之极，面对这令人畏惧的工具，突然变得十分可怕，它们岂是我小孩子所能使的？父亲天天用毛笔写字，因此我认为这应当是大人的事，做梦也想不到会要我写毛笔字。而且写的竟是父亲坟上的碑文。但母亲坚持鼓励我写。她说："爸爸的墓碑，谁写都会受到牵连，你是儿子，又是孩子，他们抓不到把柄的。"就这样，万国公墓里这块字迹幼稚的"鲁迅先生之墓"，总算是我献的丑。这水泥碑现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每当我走近它，都会感到又伤感又惭愧。

住了没几天，有个早晨母亲醒来（我睡在她身边），发现太阳已经从南窗晒到床前，母亲很诧异，要看钟点，一摸床旁茶几上的银质怀表，发现失去了踪影。转过头去，又见大柜门敞开，柜里空荡荡的，仅有衣架悬着。检查下来，母亲的海虎绒大衣和我一件呢大衣和几件衣服都不见了。还有钱包里的钞票也不翼而飞。粗笨的东西倒没有少。走到窗前，从那张父亲写作的桌子上

可以看出，那窃贼有一个浅淡的赤足印，那5只脚趾显出是个成年人。

母亲当即向弄堂的巡捕报告。不久来了四五个人，职位最高的是穿着黄咔叽佩有肩章的法国巡捕房的捕头，另几个是中国人“包打听”。他们听了失窃经过和初步损失后，当即拍胸脯保证迅速破案，包赔损失。随后侦查窃贼进来的窗口。这里窗外有个挑出1米宽2米多长的平台，用以遮挡开井和客堂的雨淋滴水。显然盗贼是从铁门爬到沿墙，再从这平台翻进来的。正查看时，又发现窗沿上插着三只烧尽的香杆，杆紫红色，寸半长，粗细如牙签的中段，香灰洒落在窗边，呈极细腻的淡灰色。发现香杆的“包打听”轻轻惊呼一声，喊同伴来看。他们轻声交谈会儿之后，个个面部表情便显得沉重起来，不作任何交待，就匆匆离去了。从此，巡捕房、房东各方面不再提起此事，当然亦无赔偿了。可见江湖上所传的“闷香”确有其物。只不知为何连法国巡捕房的人见到这种“高档”盗窃竟也会退避三舍溜之乎也？

第四十一章　与叔叔一家合住

经过这次失窃，家里发生两个变化。小变化是找铁匠铺装铁栅窗。之后，便再也没有小偷来光顾了；大变化是经母亲的恳求，叔叔周建人一家搬来我家，住在一楼客厅。他们原先住在雷米路颖村的一幢三层楼房里。与叔叔同住这幢楼的还有冯雪峰（一楼）和胡风（三楼），叔叔住的是二楼。这房子是冯雪峰租下的，离霞飞坊不远。

母亲求叔叔一家搬来同住，一方面是害怕盗贼，同时也考虑到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父亲治病和丧事，支出了近６０００元，加上新家的押金和房租又要花去千元，以至一时变得手头很紧。叔叔搬来，就能共同开伙，大家都能省去不少日常开销。在佣工上，也可以省去一个人。当时叔

叔有个绍兴女佣阿三，阿三个头矮，有鸡胸，想必幼年患过软骨病。

自从叔叔搬来后，我们的伙食从母亲的半广东半绍兴的菜式，变成彻底的绍兴口味了。记得日常总有霉干菜烧肉、霉千张、霉豆之类。直到母亲晚年，还自己做霉豆吃。还“引申”到自制霉腐乳。

沪上的豆腐店铺，可以定制一板豆腐，但必须告诉他是做腐乳用的。这种豆腐切成小方块也不倒、不碎、不散，布于竹木托盘里，过几天，每块小豆腐上慢慢长出绒毛，闻着有一股淡香。待坯子开始变软，湿润润的，这时可装入罐子或玻璃瓶中，爱辣味的可放进辣椒面和盐末，再注入凉的花椒水过面，封紧，大约二周后可食。母亲每次做的总不够分配亲友，大家都赞不绝口：“许大姊做的广东腐乳好食”，纷纷前来索取，以至此后每次连做二板、三板也不显多。

母亲是广东人，却爱吃霉豆、霉千张、臭豆腐之类，这跟嫂叔两家合作开伙大有关系。我长久受这种生活习惯的熏陶，不仅喜爱这种风味，

还爱吃霉苋菜梗、宁波臭冬瓜，甚至连带着绿色绒毛的法国臭乳酪都能吃，而且欣赏水平不低，受到同席老饕的钦佩。

叔叔全家搬来合住对于我来说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从此，我从寂静孤独的“独生子女”摇身一变而为上有两个姊姊，下有一个妹妹的多子女家庭。大姊名周晔比我年长２岁，二姊名周瑾，我称呼她“小姊”（这个姊字用绍兴发音：“基”），妹妹周蕖小我３岁，故我也直呼她小名“蕖官”。我把自己完全融入这三姊妹的生活里，根本未意识到孩子之间尚有叔伯堂兄妹之间的男女差异和家庭之别，以至后来发生这样那样的纠葛和不愉快，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胜汗颜。

第四十二章　我的过错

那时我已从大陆新村附近的大陆小学转学到海光小学一年级，与两位姊姊同校。因此我们3个孩子妹妹才5岁尚未入学每天都由阿三一起送到校门口，中午她拎个“饭格”来给我们送饭。这在当时很普遍，只要住得稍远都这样做。饭格是搪瓷制的，分4层，末格大二分之一，用以装米饭。由于我们是3个人吃，所以另外还有个盛饭的小锅。小学生正是容易肚饥的年纪，又不能像在家里，肚子饿了总能摸得到些零食充饥。因此还没等到中午下末节课，早已个个饥肠辘辘了。看到阿三送饭，未待她安排妥帖，我们3人一拥而上，争吃得津津有味，阿三拦也拦不住，只能听由我们抢夺。几天下来，姊姊年长谦让，我总能多吃一些。阿三回到婶婶面前，说些什么可想

而知。于是下次送饭来，两个姊姊合餐，我另一份了。

再说洗浴。当时热水要用“铜铫”（即铜质水壶）烧热，两铫热水注入浴缸，这才冷暖调匀。我们 4 个孩子，开头妹妹和我先一齐洗，浴后同一盆水，再由二位姊姊用。不久，让我第一个洗了。我表示应当让妹妹也来同浴，吵个不休。母亲走来劝阻，说些什么记不清了。从此，母亲多了一个任务，另煮热水，替我单浴。现在想到，父母洗浴时，和我共浴室赤裸进出，可以不相回避，但堂兄妹之间该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可是那时我才 7 岁，根本不曾意识到这些。

第三件事，孩子总想模仿，不论女孩男孩，全有过“过家家”这种游戏。有模拟的，也有像真的。当时有盒装成套的儿童玩具小锅、小餐具。但我们几个觉得玩假的不过瘾，就把生大米放在玩具锅里，加了水放到煤球炉上煮成稀饭，可以吃，味道挺香的。我们总是下午煮。但是，煤球炉火午饭后就封了，小锅煮不开，我们就捅开火，大模大样地用大火烧稀饭了。现在回想起

来，那时煤球十分金贵，这样浪费自然是不能容忍的。阿三因此封了火，把小锅稀饭移到炉子边缘。我走来取稀饭，不小心手被小锅烫了一下，整锅粥便倾注在我左脚上。我赶紧脱下袜子，除了起两个大水泡，还拉脱一块皮。粥又不比开水，黏稠不会流动，所以伤得很重。母亲仍是用止痛药水包扎，鞋不能穿，又不能走路，只好坐黄包车去上学。这件事阿三免不了也要向婶婶禀报的。

第四件事是为一辆小自行车，它是婶婶向亲戚借来的。在此之前，附近有个小弄堂，叫做钱家塘，那里的修单车铺有各种大小脚踏车出租，以钟点计费。我们租来学习骑车颇为兴奋。由于租费不廉，婶婶才借来这辆自行车。每次在弄堂里骑，三个孩子总是有两个在旁守着，很不耐烦又不过瘾。某一天，婶婶没让她的孩子骑车，她自己又不知在为什么家务忙碌着。我想既然这自行车是让大家玩的，就没请示婶婶，把单车推出门口玩起来，还有一位“搭档”，是隔壁６３号的顾亚铨。婶婶听到自行车的响声，赶到门口来，

从我们兴高采烈的手中将车夺了回去，藏进自己的房间。次日放学回家，便不见这辆车了，必定是物归原主了吧。

　　没过几天，叔叔向母亲说，夏尊住在本弄3号，家里冷清，有空闲的屋子，让他们搬去做伴。这样，叔叔一家便搬走了。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说：“我们难道不冷清、不需要陪伴？”而我从心里明白：错都在我！

第四十三章　《鲁迅全集》的出版

叔叔一家搬走后，我正感觉冷清之时，恰好父母的朋友们感到时势越来越紧张，建议母亲尽快将父亲的著作全部汇编成集出版，以免湮没流失，再说霞飞坊又有空闲的房子，正可作编校的场所。为此专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热心的朋友陆续前来报到，这样，我们家又重新热闹起来。

编校场所设在客堂和亭子间两处。亭子间本来不宽敞，坐在里面的人却不少，我记得有林珏和他的夫人周玉兰，以及吴观周、蒯斯曛等几位，以致桌椅相接，空间很小，凡有人进出，都得相互起坐相让，为此还闹出了不愉快。这事起因于吴观周先生开了个玩笑。因大家都面对面贴近而坐，吴先生便幽了一默，说："我这个观周的周，就是观看周玉兰小姐。"不想这话传到林

珏先生那里，竟认真起来，大概以为这是在吃他老婆“豆腐”，于是兴师问罪，闹了起来。幸亏蒯斯曛先生我记得还有唐等几位出面劝解，又将座位做了调整，此事才得平息。

全集的日常编校相当忙碌。校对按流水作业，初校二校大家做，末校定稿由王任叔和母亲等人负责。印刷厂打出校样，印在一种薄质纸上，半透光，背面粗糙不能印刷的。校对错字用红墨水，也有用毛笔、蘸水钢笔的。改正后速送印刷厂修改。在校对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具体问题，比如文章有些用字，父亲有他的习惯和历史因素，而校对的朋友也有他的习惯用法，往往按自己的理解改“正”，这样，末校的负责人就比较辛苦，若不对照原稿，只顾一路顺畅地看下去，比错别字更难发现。这些校对过的旧纸，最终的贡献是置于厕所当手纸了。

每日午餐由编委会供应。那时有许多包饭作坊上海人叫“包饭作”），谈妥每月入伙人数和价钱，按日中午挑担送到，一头是菜肴，另一头是白饭、碗筷。每每“试吃”和月初几餐，菜肴质佳

量丰，我也尝过，滋味确实不错。但到了月中和月末，逐渐荤少素多，直到吃不饱只得另换一家为止。包饭几个月下来，大家都吃腻了，干脆自寻门路，到小摊贩那儿去吃面条、烙饼和馄饨。后来发现环龙路有几家“罗宋大菜”店铺，伙计山东人居多，虽然每客价钱要比摊贩贵不少，但是桌子上都放置一大盆切片罗宋面包，烤得外壳香脆，很是诱人食欲，放开肚子吃，吃完再添，店东不皱眉头。至于主菜，每客一菜一汤，菜有三五种可以任选其一，也只是炸猪排、鱼排、大肉饼而已，汤约二三种，罗宋汤上漂浮着酸奶油，还有一片煮得毫无鲜味的牛肉。但穷文人们还是乐于喝它，因为毕竟多少有些油水，赖以解馋。偶尔，有几位年轻的看我孤单可怜，也带我去那里“美餐”一顿。

　　《鲁迅全集》很快就出版了。分为木箱精装纪念本和没有木箱的普通本；再有一种，是红色布封面装帧，这是普及本，于低薪阶层购买。因为还收集了父亲的翻译作品，全集共有２０卷，堪称洋洋大观。这就是大家通常说的１９３８年

版。不久，随着抗战形势日益吃紧，连住在租界里也人心惶惶了，这时那些原先协助全集出版的朋友，除了少数坚持留下来，大都纷纷向后方撤退。这样我们家重又变得空荡荡了。但这日子并没延续多久，为了生计，母亲后来陆续将一部分房间租了出去。这套全集的纸型，更成了我们在孤岛赖以生存的依靠。这些都是后话。

第四十四章　霞飞坊邻居

初搬进霞飞坊感觉是静。住户不多，弄堂出入人员稀少。我们这批七八岁男孩童在屋里待不住，总跑到弄堂里去玩耍。

早晨弄堂里弥漫着一股酸溜溜牛膻味，洗碗的排水沟里，漂浮着很厚的黄白色油腻。这是从我家右侧隔６家的７０号、白俄住宅里流出来的。这家的俄国主妇每天总要烧一大锅汤，用的是大块牛胫骨、蕃茄、洋山芋、洋葱头。据说还要加发酵的酸奶油。这倒是真正的“罗宋汤”。

那时，白俄手头尚有从国内带出来的细软可以变卖，生活还比较富裕。弄堂口有家山东人开的杂货店，主顾大多是白俄，还有法国侨民、犹太人等。店门洞里摆放着大桶腌酸菜，里面盛着切碎的洋白菜，点些许红辣椒和香叶；冰箱里有

牛肉香肠之类，还有切开的鸡肉。橱窗上挂的是烟熏蜡黄流油的鳗鱼和骨刺很少的鱼块。店里还悬挂着各色香肠，从外表看去，粗细不一，有些肥肉粒凸起，它的表面呈紫色。这些高档西洋腊味，价格甚为昂贵，在我们这批搬迁来的文化人中没有见到去购买的。

７０号的白俄家庭有个三四岁金黄头发的女娃娃，活泼愉快，经常在门前玩儿，只听到叫她尤拉。到１９４５年秋日本投降，美军水手大量抵沪，出入于灯红酒绿的酒吧时，尤拉刚发育成少女，只见她手挽美军水手招摇过市，一天要换几个主。可叹她不经几年，已经蓬头灰发，面容憔悴，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妇，一个女人的青春光辉就这样瞬息而逝了。

住在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各种美味小吃会送到家门口来卖。晨曦初起，传来的是广东点心叫卖声：白糖菱角糕、马拉糕、咸煎饼……还有苏州赤豆粥和馄饨担的敲击声。这些在今天看来极普通的点心，对于那时文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只有听的资格。上学前的早餐，总是只有咸菜加

泡饭。稍迟，就会有叫卖水果的担子挑进来，“嗳！西路蜜桔！大格蜜桔！”这类食物也是面向弄堂里迟起床的“白领”阶层太太们的。夏日傍晚叫卖的有高邮咸蛋、沙角菱、臭豆腐干。还有两端挑着圆担子，卖的却是腌金花菜、芥腊菜、甘草梅子，是一些腌渍过的口味较清淡的小菜，可以白（空）口吃也可下泡饭。这吃食不贵，一般人买得起。你向小贩买的时候，苏州人小贩就在上面撒些甘草细粉，叫做“甘草梅子”，这些是少女们喜欢的闲食。男孩子则往往买有咬劲五香豆嚼。到了冬日夜晚，静寂的弄堂里便能听到熟悉而苍老的声音，总是不慌不忙，也不特别响亮地喊着：鸭膀鸭舌头、五香茶叶蛋、火腿粽子、檀香橄榄。这时候，我已蒙蒙进入梦乡了。

　　住在霞飞坊的文化界人士可也不少。隔壁６３号是顾均正，他曾在虹口梧州路开明书店工作。还有也从开明迁来的夏尊、叶圣陶、金仲华、索非、唐锡光。再有３５号的章锡琛和王伯祥，３３号的剧作家陈西禾。巴金住在５９号索非家的三楼。这几位都在霞飞坊住过几十年以

上。萧军、萧红也来住过短时间。日本友人鹿地亘因避难也在我家短期住过。

第四十五章　顾均正先生

我家隔壁６３号住着顾均正。他家早于我们３个月从狄思威路麦加里搬来，是索非帮助介绍的。他先预付３个月房租，自住二楼和亭子间。一楼三楼借给洪姓和金姓两位房客居住。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成孤岛，开明书店内迁，顾先生留守，每月只有３０元的生活费，无法养活一家七八口人，只有白天上班，晚上伏案拼命写作，常到深夜一二点钟。

顾是科普作者，在中学教化学课。日寇时期，每户每月限用电三度。那年代，煤油是军用物资，老百姓用电不够，只好点豆油灯。记得那时顾先生领我们几个青少年钻研提高植物油灯亮度的方法，从灯芯、上油方式的改变，到使用酒精灯烧玻璃管拉制灯罩，用各种异形进出气口

径，强制通气以增加氧气供给，通过不断的改进，灯芯的光焰，竟然因燃烧温度上升更亮了，效果居然接近小煤油灯，读书做作业，不再是灯光如豆了。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顾先生用科学方法生煤球炉。那时木柴稀缺，他切细成丝条，在炉膛里搭架成交叉状，用半张报纸，浇点酒精，竟然也把劣质煤球生着了。记得那时每户人家，每餐烧饭煤球按个数使用，一旦多耗费，就不敷应付到月底了。当然，也有黑市煤球可买，但囊中空瘪的文化人买了煤就没了买米钱，哪家不是“数着米粒”过日子的。有一日中午我到他家，听到孩子们欢欣鼓舞像过节般地在吃饭，我走近看去，桌上没有菜，只有一点猪油用以拌饭。

　　就在抗战胜利前一年，一九四四年秋天，一日吃晚餐前，顾夫人周国华来叫母亲去他家。原来顾先生要告诉母亲一个奇特的消息：沪地的旧书铺子接到北平书肆传来一份书目，说是周作人要卖鲁迅在北平的藏书，书目有一册厚。母亲一听几乎昏了过去。为了保护父亲文稿、遗物，母

亲宁愿坚守孤岛，为此而备受日寇凌辱迫害；而身为胞弟的周作人竟要毁掉鲁迅遗物中重要的一部分——藏书。母亲即托顾先生再去寻找熟朋友打听详情。

两三天后，得到证实的消息是：因沪平两地战乱汇兑难继，北京朱安女士手头拮据，生活有困难，理所当然要向小叔子周作人暂借些柴米钱。周作人竟借此怂恿朱安卖书，让北平图书馆的几个职员清理鲁迅藏书，开录中外文三册详细书目，交给书商去推销。由于商界的竞争，书目才传到上海来了。因索的价是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不然北京的书肆为何不马上一口“吃”下来？显然，这书价必是内行的周作人开的。又有消息说，大汉奸陈群表示要全部包下。这事让藏书家郑振铎得悉了，郑先生历年收藏善本旧书，和旧书商有极深交谊，所以书商把这“秘密”透露给他，由郑传给开明书店负责人王伯祥，辗转相告母亲的。

母亲表示，家里的东西，不论粗细，除了该保存的父亲遗物，可卖可当的就当尽卖光，再有

不够，哪怕四处筹借，也要把这些书籍全部抢救下来。若一旦散失，将来必如大海捞针，再也无从搜回了。当这不惜代价收购的消息传到北平之后（没有透露是谁要全部买下），不久又传来：在售书目录里，有若干善本古籍，已被周作人圈掉占为己有，而售价仍旧不变。各书商听得此种从未遇到过的不义行为，纷纷摇头表示不屑。

母亲的另一想法是托北平的老朋友去劝阻朱安女士，同时急筹一笔钱送去，解除她眼前的困难，以此釜底抽薪之法使父亲的北京藏书不被变卖，周作人的招数才会落空。于是，即托唐、刘哲民二位专程北上去向朱安女士说服安慰，保证她的生活费一定及时解决。之后，母亲筹措了一笔钱，存在北平友人处，按月送给朱安女士，这才避免了因战乱而致汇兑阻隔造成她生活的困难。

顾先生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后转入开明书店负责编写理化课本。他自学成材，没上过一年大学，却发表了百余篇科普文章，有《在北极底下》、《少年化学实验手册》等等，受到青少年

读者欢迎。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了《正言报》，想邀顾先生任儿童文艺副刊主编，待遇优厚。但顾先生得知这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报纸后毅然拒之不去。

第四十六章　索非先生

回忆顾均正先生必然要想起索非先生。因为在霞飞坊，顾、索两家不仅住得近，他俩还一起推动科普事业，这在当时十分难得。

上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在我国科普落后的情况下，他们二位已经创立“天工实业社”以推进青少年科普教育，这恐怕已经鲜为人知了。他们合作于１９３５年，研制一种“浑得消”的化工膏剂，抹涂在玻璃窗和镜面上，能有效防止雾气吸附。之后，又生产一种自制玩具橡皮气球，买回去一份套件，可以自己浸汲橡胶液在玻璃胎具上，硫化之后剥离下来，便是可以吹胀的大、小气球。并可以掺入多种颜色，使之色彩缤纷。现今孩子们都掏钱买现成气球，而在３０年代自制气球，不亚于今天搞航模，是有难度的。

索非住在５９号，从楼下厨房进去，堆得满满的都是上述待销的科普套件。各式大大小小的玻璃筒、玻璃试管，橡皮塞和橡胶管，大大小小棕色药瓶、木箱、纸匣，从地面一直堆到楼梯转角顶。这是因抗战爆发，推销不了，积压在此。

他们二位还研究设计一种“少年化学实验箱”，附加一本有原理有实验的手册，可以按手册顺序做１００多种试验。我第一次进入化学境界是索非先生送我三支试管、两瓶化学药物。配出澄清的内含药品的两支清水，倒来倾去，清水魔法般地变成樱红色，又可复回清澈，神奇有趣。我在小学同学面前变这戏法，小朋友十分惊奇。从此，我对化学实验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能不说是受索非先生影响所致。我在后面将专门讲到，在此不赘。

据我记忆，索非是学医的，大概没有行医执照，故没有挂牌开业，只为亲友治治一般小毛小病。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名叫“鞠躬”，现在是中科院院士、西安四医大神经科研专家；女儿取名“沉沦”，后改名沈沦，曾工作于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沈沦一度是我的女友，她曾以极大的秘密告诉我，她本姓周。我和她的关系因多次“失之交臂”而终止。

索非多才多艺，爱好古典音乐，家里有落地式手摇唱机，那时拥有这种高级“音响”，不亚于如今拥有３４英寸彩电。这是他从旧货店买来的，估计代价不会很贵。古典音乐唱片，他收藏不少。但对我来讲，听来如“对牛弹琴”。索非在话剧界也有一些影响，朋友有陈西禾、柯灵等，曹禺的剧本在上海公演，他曾是曹禺的全权代表。巴金著作的出版，也是他出面的。１９４９年前，索非和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合作不下去，矛盾很大，正好范寿康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邀他去开办书店。他在那里先办“台湾书店”，后开“友信书房”。

他长寿，一直活到９０高龄，于１９８８年在台北病逝。他女儿曾去探亲，儿子因是军籍未得前往，父子５０年两岸相隔，至死都不得一见，实是件悲伤的事。

第四十七章　巴金先生

索非家的三楼，曾住过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他因患肺结核，静养在房里深居简出。由于他是病人，我到５９号玩耍，从不踏进他的房间。我甚至记不得有没有与他交谈过。只感到他文弱、清瘦，脸色较差。

巴金那时还单身一人，住在霞飞坊时间虽不长，却完成了《春》和《秋》两部传世名著。记得那时常有一位年轻姑娘出入霞飞坊５９号探访巴金，我当时才十几岁，猜不出她是学生还是不定期的助手，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生性活泼，讲的是宁波口音的上海话，频率高，速度快。她每回来访，巴金总是语言不多，但很有耐心。这位姑娘就是萧珊。经过８年马拉松韧性恋爱，她终于成为巴老海枯石烂心不移的终生伴侣。

抗战胜利后，巴金夫妇回到霞飞坊，仍住５９号三楼。那时他俩已有女儿李小林。我记得她每天从后门出来，喜欢在弄堂里拉着一把小竹椅，又当车又当马，愉快地奔跑着。不多日子，椅脚磨歪几乎坐不得了。她母亲在旁监护着，不时惊呼，要她当心摔跤。夏天闷热，傍晚居家习惯在弄堂里一边纳凉一边喂小孩儿吃饭。萧珊总是很有耐心，一边看着小林吃饭，一边在旁唱儿歌。遇到卖咸鸭蛋的小贩经过，就买下几只，小林吃得越发顺当。沪上卖鸭蛋的小贩都手提一个竹篮，浮面有三四只外壳开口的淡青绿色的高邮蛋，去壳的地方漂出一汪红油，很是吊人胃口。在那个柴米油盐样样昂贵的年代，一只油汪汪的咸鸭蛋对于爬格子的文化人家庭，不啻是美味佳肴了。

巴金和我父亲的写作习惯相仿。晚上九十点开始动笔，直写到清晨。吃住很简单。踏进他房间，里面并没有各种厚重书籍和大小字典满桌子堆放着。仅仅是临窗一张桌子，边上几把椅子和床，余下的空间，是一排排书架和书柜。室内光

照不强，黑洞洞地令人有神秘感。有时听到客人的谈话声和爽朗的笑声，随着谈话声抑扬传来，门口飘逸出一种香气，那是陈西禾、黄佐临来访时专门烧煮的一种饮料，黑而且苦，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会喜欢喝它。

鞠躬（索非的长子）告诉我那是咖啡，有的客人连糖也不放呢。他还指着一只立式铝壶讲，壶里套有铝芯，上有布满小孔的盒，咖啡粉按客人人数增减纳入，小罐盒伸出一根管子到壶底，水沸之后随压力升到盒面，喷洒而入。咖啡淋出汁到壶里，3 分钟即可。有些人不懂煮咖啡的诀窍，任其沸腾，待香气满溢四邻，苦涩全部浸出，掩掉了甘纯之味，杯中的饮料只剩苦水一杯，这就外行了。于咖啡，父亲生前并不热衷，还曾经说过，他把喝咖啡的时间留下来写文章。而巴金他们这几位咖啡爱好者，文章依然喷涌而出，并未误人误己。我呢，后来也有了喝咖啡的习惯，并且深谙烧煮的诀窍，却并无出息。

巴老是四川人，多年在外，仍一口浓重的乡音。对我们这些少年，不管自己心情如何，总很

客气。他平时爱喝浓茶，喝沱茶，更爱喝香浓的佳品红茶，也有时见他买回茶砖，我们便帮他敲碎。巴老吃饭的菜肴很随便，从不挑拣。那时小饭馆价格低廉丰俭随意，来客坐到吃饭时，同赴小馆子极为平常，并不认为是一种“高消费”，客人也不会感觉是欠了人情而要改日来还。巴老和四川人一样能饮酒，却容易脸红。他会多种外文，有时远在底楼下就能听到他的朗读声，抑扬顿挫，好似在朗诵诗歌，至于是什么语种就不知道了。

第四十八章　霞飞坊的小朋友

住进霞飞坊后，除了周围邻居变了，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同学们很少来我家串门。因为他们都住得不近。而我是从来贪玩喜欢热闹的，因此隔壁邻居的孩子就成了我的玩伴。我们总是先有一个孩子在弄堂里高声一呼，大家便纷纷从各自的后门奔出来，霎时间，这条弄堂就成了我们的乐园，而在我们看来，这条弄堂又长又宽，世界很大，我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们玩得可真“疯”！先是玩溜冰鞋，那是 4 只小铁轮的，不敢穿双脚，单支撑一条腿滑，那“哗哗”的响声就响彻整条弄堂。因此每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的当口，有幢楼的二楼窗口就会伸出个男人的大脑袋来干涉，特别是那二三户不晓得什么国籍的高鼻子洋人更要大声呵斥，他们说的

是令人发噱的洋泾浜中文："去！去！哇啦、哇啦！……"还挥着手臂驱赶我们。不过我们不会气馁，禁止一种，我们又玩另一种游戏，反而吵声更大。那是利用一只空罐头匣，放置地面的中间，分攻守两方，以谁踢得最远次数最多为胜方。铁罐的优点是不像小皮球，会飞入人家院子而遭没收，它只会在地面打滚，每踢一脚，便发出"当啷啷"的巨响，这在我们听来分外刺激悦耳。不过玩这种游戏的时间，洋人已经被日本人强迫迁出租界了。

住在周围的孩子们也玩本地的土游戏。如抽陀螺（也叫打勿杀）、打玻璃弹子、刮香烟牌子、扯响铃（抖空竹）等等。而我们这一圈子的孩子玩的是骑自行车，谁有车子，大家共享。学车的时候，由于我的"授"业，都习惯从车子的右侧上车。抗战胜利后，上海的车辆统统规定改变为右侧行驶，我们这批由我带出来的十几个右侧骑士正好用上，感觉特别适应和方便。

稍微长大之后，顽皮的事更多。那个时候的气枪用的是圆球形弹子，压力小，射程短，往往

麻雀被射中后，抖搂一下羽毛，又振翅腾空飞走了，令我们颇为气馁。有一次过年玩小鞭炮，便想到一招：把小鞭炮插在气枪口，点着后远远地射进邻居的室内，“啪”地一响，一定挺吓人的。不过那时正过春节，是喜庆日子，“被害者”也不肯张口骂孩子，出来客客气气讲几句道理便算了。这事的共谋者中除了我，还有索非先生的儿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鞠躬教授。他与我同岁。可见，顽皮的孩子并不都如我这般没出息，也有人中俊杰。我们这批调皮蛋，经常要大小闯点祸，我感到这与那时家长的管教比较宽松有关，邻居也碍于大人的情面，不肯轻易骂上门来。

待我们年龄稍长之后，便文明一些了，开始玩一种宜于在弄堂里开展的运动——打羽毛球。它不会打破人家的玻璃窗，对行人也不构成威胁。我的体质又宜于这种小球，因此到了十六七岁，我的球技已经算比较好了。也就在那时开始，我迷上了无线电，成天在家里摆弄，还搞了个小“实验室”，从此才“改弦易辙”不再是弄堂里

的“皮大王”了。鞠躬教授呢，他从小喜欢听唱片，对古典音乐十分熟悉，讲起来真是如数家珍，后来一心钻在这上头。顾均正的儿子比我大一岁，虽也喜欢听音乐，但他家里没有唱片，便从短波电台上去收听。这时他和我一起学着摆弄无线电，也参加当时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总之，我们这些调皮蛋都逐渐长大了，不再干那惹人嫌的游戏了。但是，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一道出去看电影。附近是国泰电影院，它上演的是首轮片子，票价贵，我们看不起。不过稍远几百米，就有 5 家二轮片影院，巴黎、杜美、上海、金门、平安电影院，我们就成了它的常客。看电影大家以看好莱坞片子为主，国产影片很少去光顾。

多年后，我重返霞飞坊，想找回少时的感觉，不料早已荡然无存。只觉得这条弄堂又短又狭，毫无“宽广世界”的印象。倒忆起了当年种种调皮事，不免汗颜，也不胜感慨系之。

第四十九章　烧书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向英、美不宣而战，一天后就进入租界。日本当时声称，这次是向英美作战，对中国人是优待的，就是抗日分子也予以“宽容”。母亲的大多数朋友的看法是，日本人对鲁迅先生很尊重，你向来没做什么事，绝不会对你怎么样的。谁知未过一星期，即同月１５日的清晨，母亲就被日本宪兵抓去，关了整整７６天，受尽种种毒刑和凌辱。后来母亲据此写了《遭难前后》这本书，读者想已看过。我这里再补充些有关情况。

虽然朋友们说了宽慰的话，但母亲还是觉得不能不防。因此，当日本人进了租界之后，霞飞坊我们家里仍很紧张。母亲寻找书籍、杂志、信件等等文字材料，以父亲去世的１９３６年划

线，分别归类。母亲对我说：１９３６年以前的，都可以往你爸爸身上推，我们是保存遗物，留作纪念，孩子长大了要看的。用这样的理由搪塞，大概没有事的，定不了什么“罪”。

因此，凡是父亲去世后的一切“危险”品，母亲都拿到厨房，由我负责烧毁。厨房间有一只盘香管炉灶，炉膛里盘旋几圈水管，连接左侧一只储水罐。这炉灶每户都有，谁家也不用，因它耗电太大，但用来焚烧期刊书籍，却颇感好使。只是，在这熊熊炉火里，一册册书扔下去，感觉烧的是一份份心血和情谊，因为我那年已经１２岁，开始懂事了，知道许多书是作者、朋友亲自送来的，每本都有亲笔签名。我那时内心总想：现在看不懂，以后长大了看。况且其中有那么几本，我已略略翻过，半懂不懂地还很感兴趣。所以，烧书像是在烧自己的肉体神经那样痛楚。正在伤感时隔壁邻居来反映了，说是屋顶烟囱向四周飘洒出片片纸灰。母亲抬头一望，弄堂上空像飞翔着无数黑色小蝴蝶，缓缓降落又随着气流再度旋升。吃惊之余，赶紧灭火停烧。幸亏霞飞坊

没有日本侨民居住，要是有人去通风报信就麻烦了。但地上还堆着这么多书，该怎么消灭？若是撕碎冲掉，马桶岂不会被堵塞？末了还是烧。少量慢喂，勤出灰，随时用水冲进地沟。这“工程”也有我的小朋友来援手，好在大家对东洋鬼子都恨得牙痒痒的，谁都愿意帮忙。这样，烧了整整两天。

此外，母亲还做了别的预防工作，把亲友通讯本保存在邻居家里，把抽屉里我的气喘药物集中在一起，装在小匣中，衣服用品也交待一番。最要紧的是告诉我，万一她被捕，让我到“王家姆妈”家里去，绝不能待在家里。她是王任叔的妻子，带着孩子就住在附近。王任叔已避到外面安全的地方去了。除了请王家姆妈照顾我，母亲还交待，一旦自己有事，该通知哪些朋友。母亲想到的和能够做的就只有这些。至于当时地下党有过什么考虑和安排，我至今不知道，也未有蛛丝马迹可寻，因此难以推测。或许当时地下党组织认为我母亲会平安无事也未可知。

等到风声越来越紧，眼看着日寇即将入侵租界，母亲就拿了些随身细软，带我到距霞飞坊不远似乎在永嘉路一带的许寿裳先生家去暂避，以观时局发展。许先生是母亲在“北女师”读书时的校长，又是父亲同乡，可以说是至交。许先生当时不在家，夫人陶百川接待了我们。她显得有些老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母亲让我称呼她许师母。

第五十章　母亲被捕

许家当时住在我国摄影界元老郎静山的房子里，他们似乎有着远亲关系。此时，郎静山与家眷已远去内地，房屋空着，正好供我们母子栖息。于是我在这些空屋里到处游荡。当我进到二楼中的一间，只见整个房间的墙壁都被刷成深黑色，墙脚下还堆放着许多大幅照片，想是丢弃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它们的画面都挺美。我现在懊悔当时为何不拣几张，这可是珍贵的艺术品啊。巧得很，有一年我与老伴去台北探亲，某日傍晚路过一家饭店，适遇郎大师在那里过９０大寿，他正站在门口送客，我真想趋前问候，又觉素昧平生，不敢贸然过去。后来获悉他骑鹤仙去，使我不胜惆怅惋惜之至。

我们在许师母家住了几天，觉得日本鬼子进租界后市面还算平静，便放心返回自己的家。不料灾难立即降临到我们头上。

日寇来搜捕是在凌晨，我正睡得很熟，待梦乡醒来，已经满屋子人。带领上楼的法国巡捕似乎完成了使命，站在房门口，没有插手，汉奸也没有翻寻物品。只有日本宪兵在翻箱倒柜地搜查，但他们的目标似乎只是文字材料，也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故意乱砸乱扔，而是从柜子和抽屉里集中他们所需要的，用我家的布包裹而去。搜查进程中，日本宪兵看到我的一本定位式集邮册，按国别排列着外国邮票，空白框位里插着邮票照片，以便按图索引地搜集填补。大概由于它的说明文字都是英文，以为是什么重要材料竟也席卷去。他们把母亲抓走，同时带走两包东西，那时天色已将黎明，母亲的回忆录里讲到的收音机，是日本宪兵走了之后，汉奸又返回来拿去的。这是一架刚刚买了两三个月的五灯国产收音机。弄堂里似乎没有安插盯梢的，因之有邻居来探望我并无阻碍。等到天亮后，按母亲的嘱咐，

女佣双喜就送我到王家姆妈家里去了。

王家姆妈一听到母亲被捕，立刻打电话通知各界朋友。她家是三房客。二房东在楼梯旁装有壁挂电话，王家姆妈连续打了好多个，中午、下午都有通话，内容都是让朋友们隐蔽。不多久，常姨和母亲别的友人来探望我。常姨又一次告诉我，他们全家要返回营口去了。常姨待人亲切和蔼，从不高声发脾气训人，对我更爱护备至，视同亲生骨肉。我当时年纪虽小，感情却十分敏锐，父亲的去世，心灵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如今母亲又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地震，感到这世界一片荒凉，举目无亲，惟一可以依赖的就只有常姨了，而她竟也要离我而去，我为此极其伤感。因此当她的孩子建议让我同去东北，还要将皮衣让给我穿，陪我滑冰……我听了内心极感温暖，因此当常姨问我愿不愿意同去时，我一口答应。但是王师母听了大吃一惊。她想不到我会自愿送入虎口深处去。看来她以为这事太严重了，便立即去告诉了建人叔叔。过了两天，当我正在简单打点行装准备出发时，

王师母陪着三妈建人叔叔妻子王蕴如来了，很严肃地叫我住到她家里去。在旁的王师母接着说，她也即将回乡下去了，我必须在沪等候母亲出狱。还说了些别的警告的话。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随三妈住到四明村去。

第五十一章　住在叔叔家

在叔叔家住了两三天，常姨又来探望我，告诉我王家姆妈已经回乡下去了。后来听说是房东希望王家姆妈退租的，但是前几年看到一篇文章，是“立信会计学校”创办人家属写的，意思是王家的离开并非由于他们的催促。

王家姆妈已去世多年，这事自然无从查考。但是我想在那险恶的年代，遇上这样的事，谁都在担风险，谁都要为自己一家子人着想，因此一切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王家姆妈我至今仍怀念她，感激她当年收留我这“危险”的种子。

建人叔叔的家住在福熙路（今延安西路）四明村３８号３楼，连带一间三楼亭子间。亭子间住着他的三个女儿，我被安排在叔叔婶婶睡的三楼，靠西墙一个单人床。房间中央是吃饭的八仙

桌，孩子们放学回家，就在这桌上做作业。屋北是双人床，四周有支架，挂上布幔帐。房间外面左手角落是简易的卫生间，有浴缸，但不常用。由于水压低三楼经常没有水，因此凡是白天用水、拖地板，都得从一楼拎上来。

四明村的楼梯很陡，听着婶婶提着铅桶一步步沉重的踏步声，每天要上下几十次，真是辛苦。叔叔家曾有个佣工阿三，现在由于经济拮据转到房东家干去了。

房东姓金，是婶婶绍兴老家的远亲，做茶叶生意的。１９４８年春，母亲和我与叔叔全家第一次回乡，便住在他家里。母亲有过一篇文章《第一次到了鲁迅先生的故乡》记叙此事。

我那时还在读五年级。因幼年哮喘和伤寒症耽误了升级。住在叔叔的家里，便就近转入二位姐姐读书的学校，校名光夏小学，它是光夏中学的属小，有关这段学习生活，我将在下文专门谈到，在此不多说了。不过有一事可在这里一提，那就是在这样的时局里，我的身份具有一定的不安全性，叔叔为此沉思了一阵，决定为我重新起

个名字。他说两个姐姐和妹妹都是用单名：晔、瑾、蕖，你就用陶渊明的渊字，就叫周渊吧。那时，叔叔作为家长用的也是假名，叫“周松涛”，并刻了图章，用在家长联络本上。

周渊这个名字我一直用了８年，直到全国解放，我才得以恢复父亲替我取的名字：海婴。为了永远纪念父亲，这名字我将终生使用。虽然他说过：这是孩子的名字，长大可以换。

第五十二章　艰难生活

我在三叔家住，虽然只多添一双筷子，却使他们并不宽裕的生活愈加艰难。每餐要填饱６个人的肚子，其中４个还是正在发育的少年，从９岁至１６岁，个个肚子都像无底洞。为此叔叔婶婶真是煞费苦心。主食是配给粮、杂合面，每月不足充饥，一般老百姓都靠买黑市大米过日子。

那时弄堂里常有些身上穿着臃肿棉衣的小贩出没，他们棉衣的夹层里就藏着粮食。待双方讲妥价钱，他悄悄走进你的厨房，脱下衣服倒出粮食。这些米贩都是偷过封锁线过来的，随时都有被日寇刺刀挑死的危险，他们是在做着刀刃上讨生活的买卖。因此买黑市米要比市价贵很多倍。但每户人家又不得不买。实在过不下去的，只有离开城市回乡这一条路。因此我们日常有咸菜泡

饭吃已属美味佳肴了。

绍兴人本来勤俭，一般不起油锅，大锅里放个竹蒸架，小菜都是这样隔水蒸熟，然后面上浇几滴麻油，取点“香头”。婶婶制作绍兴霉豆很有经验，她把豆子蒸熟后，晾在竹扁上任其霉变，三五天后豆面上出现一层白乎乎的绒毛，待绒毛稍落，豆身湿润润地，便可入甏，这时再放入生姜末、花椒，还有等量的白豆腐干小粒，最后冲入晾冷的淡盐水，盖严密封。不几日便可食用。吃的时候，浇上麻油，最好是小磨的，其香扑鼻。这种霉豆，基本每餐必备，因为菜量不足，只能以此送饭。宁波人叫做“压饭榔头”。这便是当时艰难生活的写照。

建人叔叔每天从商务印书馆下班回家，总是天色早已黑了。有时兴致高了，从架上取下五加皮酒，倾注一小盅，慢慢啜饮。下酒菜是不计较的，酒也仅以一杯为度。偶然有些日子，带回一小包五香花生米，倒在桌上，我们几个孩子围上去也吃上几颗。这时，叔叔会讲些趣闻或最近时局。两位姐姐后来很早参加革命，我想必与这样

的家庭教育和气氛有关。

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叔叔讲到过一个土药方剂。他说凡是年代久远的古坟，在下葬时脚后必有一盏油灯，若干年后，如遇迁葬、修坟，打开坑穴时如果灯油未干，刮下这厚厚的油脂，便是灵丹妙药。那些长久不愈的“老烂脚”，取这油脂搽上，会有特效。这种油叫“阴油”。我不知道这“阴”字是否准确。以今日想来埋入深坑内的油脂，也许有某种细菌在繁殖，久远年代后，生成某种抗生素也说不定。

我在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叔叔家虽然自己生活拮据，对我却格外关爱。有时我放学回家，婶婶问我肚子饿不饿？我不愿说假话，这时婶婶便摸出一碗馄饨钱，让我向弄堂的馄饨担买一碗吃。这种特殊的享受，两个姐姐是轮不到的。

第五十三章　母亲被释放回家

自从母亲被宪兵队抓去，建人叔叔就想方设法去打听消息，不几天就打听出一些情况来。内山完造虽见不到面，但是传话过来，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出来，是真是假分不清，但愿尽快成为事实。全国人民对日寇的愤恨都埋在心里，对于我来说，这仇恨更深、更重。

生活一步步紧缩，老百姓连吃大米也“犯法”了。粮店有时候只有卖“六谷粉”苞米粉，还限量每人 1 公斤。为此我和姐姐承担了买粮的任务。我们清早就去粮店排队，店门尚未开，买粮的人已挤得人山人海。我在二楼金家排的队的前后档里占一个位置。买粮的时候，每人的手指要在紫色染料里沾一下，以防多次排队。但有的人又是想出窍门，用油脂预先涂在手上，这样沾上的颜

色就便于洗掉，也就可以再次去排队。能买到六谷粉是十分幸运的，可省掉不少买黑市粮的钱。但是这种“平价”粉，不仅有沙，还夹杂霉变呈绿色的绒絮无法剔出。南方人又不会做窝窝头，只能烧糊糊吃，大家称之为“六谷糊”。

　　母亲在宪兵队的情况虽然若明若暗，未知加的是什么罪，不过所幸没有听到亲近的朋友被捕，那些知根知底的也是已避到可靠的地方或干脆回到乡下去了。过了约有一个月，内山完造托人通知，天气冷了，宪兵队允许送毯子去。我们家里都用的棉被，哪买得起毯子。正在犯难发愁，内山又传话说毯子由他解决。但是不多日，宪兵队又通知取回毯子。叔叔不便出面，只得仍托内山派人去取。拿回家，以为当中必定夹着母亲的什么字条之类的讯息，但翻来覆去搜寻，什么纸片布角都没有。待母亲出狱后问她，才知这条毯子又厚又宽，牢卒以为她多盖了一床，硬要退回，还挨了狠狠一顿打。内山先生的好心，反让母亲多吃一次苦头，这是他所料不及的吧。

常姨一家真的要回东北了。她带来二位哥哥告别。使我再度伤感，她留下１００元钱让我买点喜欢的东西。四明村旁有个亚美公司门市部，那是苏氏兄弟开的。我有了自己支配的零花钱，便在那里买些制作矿石收音机的小零件和一副耳机。我的５０多年“业余无线电”生涯，便是从这时而启蒙，直到老年仍然玩心不减。

母亲被关了７６天牢狱，受尽拷问、鞭打、凌辱、电刑各类审讯酷刑，释放时两腿痛楚不能行走。我见她两腿膝盖在月亮板下面凹陷的位置都有个６厘米圆的乌青块。以我现在的知识判断，日寇对母亲施的电刑，电压、电流相当强烈。若施刑时仅仅电压高、电流小，行刑时的震撼虽大，对肉体的伤害还不会太明显；如电流大电压低，关节位置也不至于烧成乌青瘀血。当时的电刑一般都使用老式电话的手摇电机，那种设备是不足以把两膝烧焦的，而母亲受的伤害如此之重，可见日寇残忍之甚。

还有一点可补充的，在母亲释放发还的零碎物品里，竟有几个汽车发动机电器零件，还有一

块无线电发讯机的波长曲线图，可供短波发报机按指定波段调整用。为什么将这些东西“发还”给母亲，我至今还深感纳闷。这些汽车零件当时我卖给店铺，还挺值钱呢。

第五十四章　我家的房客

《鲁迅全集》出版后，我家很快便住进了房客。

首先住进一楼客堂的，是广东籍日本归侨郑老伯一家。母亲让我称呼老伯夫妇阿公阿婆。在我眼里，两老总有六七十岁了，他们有９个女儿，九小姐只比我大二三岁，阿婆的实际年龄估计才５０上下。他们的生活起居、日常言谈，完全是广东式的。而我一向生活在绍兴气氛中，因此对看到和听到的都很新奇。尤其是广东话，它对我非常陌生。因为母亲虽是广东人，却从来未听见她讲过广东话。父亲在世时，也不记得有母亲的家乡亲戚来走动。但我对广东话感到新奇，大概是有着血统关系吧，心理上却并不排斥。听了不久，就渐渐懂得他们在说些什么了，好比现

在电脑的存储，到了一定时候，便开始“输出”。因此后来我也能讲些广东话了。阿公阿婆家还有令我感兴趣的，是用一只葫芦形的金属圆柱治病。打开这金属圆柱顶端盖子，便见一层密集的针，细如毫发。当有压力揿按时，绒针缩入端内，似乎它们每根都会独立行走。哪里疼痛不适，就在上边轻轻按动，用这绒针刺激皮肤表层，一提一放，“嗒嗒”有声。见我好奇，拉我尝试，在我的手臂上揿按，只觉轻微麻痒，颇为舒服。他们还有一只日本式胖肚炭盆，到了冬天可以取暖，还能烧冲茶的开水，和内山书店里的那只相仿。没想到正是这只日本炭盆在日本宪兵搜捕母亲时，无意中为保护父亲遗物、书籍起了作用。

原来那天半夜日本宪兵冲进６４号，先进的是一楼郑家，开头气势汹汹，待见到这只炭盆，日本宪兵说了一句“稀巴奇”，阿婆机智地用日语应道：“这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下鬼子的凶相稍敛了。接着，阿公阿婆又用日语与他们聊在日本横滨的生活，这就给了日本宪兵一个麻痹，让

他们产生６４号不止一家住户的印象。因此，当我家女佣双喜说三楼住了别家，他们竟然信了没去搜查。若非如此，上海鲁迅纪念馆里收藏的文物，恐怕要大大地打折扣了。写到这里，我不禁要向郑家阿公阿婆在天之灵致以深深的谢忱！同时我也要为我家佣工双喜记上一笔。除了郑家阿婆，是她的一句话，才保全了父亲的一部分遗物。她是广东人，由母亲一位嫂嫂带来上海，作为麻利能干的女佣介绍到我家帮工。可叹的是她身世很苦，先嫁给上海大场地区一位农民，丈夫不幸病故。直到抗战胜利后，她才与霞飞坊一位姓周的里弄保安结为夫妇。多年过去再无什么联络。

对于郑家二老，我当时并不知道，原来他们是叔叔搬走后，经母亲和冯雪峰商量，认为请他们进住既放心又可以有个照应。他们的女儿都是好样的：二女郑玉颜是刘长胜的妻子，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四女郑育之的丈夫是左联成员周文，父亲称赞他是“最优秀的左联作家之一”，常和胡风、周扬一起参加左联常委会议。七女、八

女也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员。

母亲出狱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得将住房一步步向上收缩，利用楼梯旁的边沿堆放书箱，上楼需要侧身才能通过，幸而霞飞坊建筑坚固，书箱堆着顶着天花板，地板都下陷了，却没有出险。

第五十五章　报人李先生

二楼亭子间租给姓吴的兄妹。吴先生会拉小提琴，由于寻不到稳定工作，心境不佳，因此凡是听不到琴声，便是他们饿肚皮的日子。自然，那也是付不出房租的时候。这倒还是可以理解。令人烦恼的是吴先生在生活小节方面也比较粗糙，水龙头常常不关，流水潺潺，母亲听到，总是唤我去拧紧。最讨厌而又腻心的是，他常常解小手而不掀起马桶盖，弄得四周都是尿液，我每日仅大解一次，大不了擦一回，女士就免不了啧有烦言。提请母亲出面去交涉，又往往得不到通达情理的回应，因而这种小事总是悬而不能解决，让人心烦，却又无可奈何。

为了多腾出房间出租，除了尽量压缩存放书籍的空间，母亲后来还将大陆新村搬来的大床借

给邵铭之先生，后来又借给过许寿裳的夫人。此床后来归还，为父亲睡过的原物，现陈列于上海鲁迅纪念馆。母亲和我则缩身到三楼书箱缝隙里去居住，以书箱为卧床。这样二楼也腾出来了，租给一位姓李的报馆编辑。

李先生是山东人，姓名似乎是李秋生，是笔名还是化名不知道。他有个女儿叫李丽，一口京片子，说明是从北京迁居来的。李妻却是山东口音。不久又从山东老家把寄养的儿子接来。他比李丽姊姊约大二岁，体形干瘦而面黑，但在我们弄堂小朋友中间，颇受崇敬。因他会上树掏鸟，身手敏捷，尤其会用小石子当投弹，本领高超，命中率很高。聊起乡下的趣事，每每令我们又羡慕又钦佩。

最近，偶然从上海出版的《世纪》杂志中看到，抗战期间的《文汇报》编辑部同人中也有个李秋生，似乎就是我家二楼的这位房客。我于是托朋友向文汇报老人打听，得知这位李先生当时在《文汇报》编副刊，后来去了《中央日报》，随后又自己办《正言报》。大约解放前后去香

港，继续以办报为业，思想倾向颇好，没有发表过对大陆不利的文章。晚年定居美国，于９０多岁亡故。李先生还曾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出席过党的“四大”。看来我们党也一直牵记着他，有一回文汇报老人严宝礼、徐铸成两位去香港，周恩来总理还特地请他们代为致意，并邀请他回大陆来。

我也由此提起他的女儿李丽和“黑皮”儿子——我们一起玩的小朋友，不知姐弟俩现在哪里，一切可好，我十分怀念他们李家还有一个亲戚，也是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名叫马骥。他对话剧和电影很热衷，也喜欢结交演员，后来自己进了演艺界。１９９７年春季，台北的报纸刊出同名同姓的老艺人去世。我未及打探便返回大陆。我想就是这位马骥的可能性很大。

李先生本人喜欢帮助孩子们集邮。爱好者之间互通有无，这种邮品交换的方式，原是一种高层次的业余爱好。令我感到不快的是李先生以“中间人”的姿态，调整相互交换的“等价”，往往把我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俄国、德国、日本的珍稀

邮票，替自己儿子交换走了。由于他年长一辈，我又年幼，只好“忍让”。但我心痛不已。

第五十六章　一次火警

李先生住了约有两年，说是“形势紧张”，全家搬走不知去向，但有一件事尚可一谈。１９７６年，我因公带队到西德考察立体声录音技术，全团１０个人在一家中式小餐馆吃午饭。没想到巧遇他儿子也在另一桌用饭，他们是３个人。相距３０年的岁月，他竟能一眼把我认准，喊出姓名。他告诉我在代表台湾的某石油系统工作，混得不错，并告诉我他住的旅馆。回旅馆之后，左思右想非常纳闷。世界未免太小了，巧遇到同时、同地、同国、同餐厅、同午餐，５个“同”。上世纪７０年代，国民党正下力气搞“策反”，他们会不会利用幼年朋友，又是同住在霞飞坊６４号的关系，向我（们）有所企图亦未可知。因为我团的考察计划半年多前报到法、德两

国，这情报台湾方面是很容易得到的。１９７６年我国出访欧洲的技术团体又很少，因此我们此行相当引人注目。考虑之后，我向使馆报告了这次巧遇。

当晚，我们换了旅馆，离开原地，就再没有别的动静。不知这是真的巧遇还是另有缘故。霞飞坊６４号还有一家房客，是郑家阿公阿婆搬走后，经邻居６２号吴元良介绍住进来的，姓王。迁入时吴先生说是他的同学，曾学制药专业，就读于北方，现在毕业找到生化制药厂的第一份职业，新结婚没有寻到住房，要借住短期，今后你们自己需要用房随要随迁。这样，这位王先生夫妇便住了进来。不久生了个女儿，很漂亮。他们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母亲收到胡风从抗战后方经过沈钧儒帮助（那时沈是律师）索回的版税，便用这部分款子补偿王先生，供他在亨利路“顶”了二楼的住房。这样，６４号的房客就到此为止。上海解放后，母亲和我已定居北京，这所房子便退租了。

霞飞坊６４号曾发生过一次火警，这事值得一提。那是我已经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门口拥了不少邻居，抬头向三楼阳台望去，只见左侧靠６３号的小窗有烟雾泄出，阳台里有邻居在接水，用脸盆泼着。母亲在紧张地奔忙。不久有消防队员赶来，身手敏捷地冲进三楼抢出箱子。几分钟后，队长招呼队员收队。实际上，明火早已熄了，余烬的残烟在消防队员到来之前也已经被邻居泼灭。内行人讲，幸亏那个小房间不通风，火势起不来，也幸亏母亲燃着的是裹包衣箱的麻袋套，更幸而当时母亲没有远离房门。

火势熄灭之前，救火车并没有进弄堂，只停在茂名路上待命。队长问了起火原因，母亲是“火头”，要带到队里问话、处理。他们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救火车出动，必须用水龙头喷浇一通；若不喷浇，就要付“黄鱼”（金条）两根，不然“不好交待”。可是，家中那么多书籍哪经得起喷浇啊，父亲一辈子收集的各种版本图书岂不将全部成废纸？母亲无可奈何，只能从这两种命运

里选择后者。正在母亲为从哪里筹集这两根“黄鱼”犯愁时，队长在室内到处巡视，看到父亲那张葬礼时悬挂在棺木上的遗照，他突然讲：“哦！这是周先生，交关有名，交关有名，啊，没事，没事！好口罗，收队、收队。”不待母亲致谢，径直下楼离去。一场不大不小的破财灾祸，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母亲整理被烧的箱笼，发现损失并不大，火焰仅在外壳肆虐，还没有穿透进去。

第五十七章　杨霁云先生

父亲去世后，各方朋友都来慰问和关怀，给予我们母子许多帮助。对于我来说，最值得怀念的是杨霁云先生。

杨先生是父亲的朋友之一，曾经搜集出版父亲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过去他常来大陆新村，后来我们搬到法租界霞飞坊，他仍经常从徐家汇住处搭乘有轨电车，专程来探望我们。使我最高兴的是杨先生——这是我幼年时开始的称呼，还承揽了带我看电影的“任务”。因为那时无论在经济上和精力上，母亲都没有这方面的余裕。

有一次杨先生带我去看电影，问我有没有尝过一种叫做“白雪公主”的雪糕？我回答说没有，杨先生便掏钱买了一根给我吃。我问他为何自己

不吃？他说前几天刚吃过现在我才理解，他这是为了省钱。这雪糕我想念已久，曾听小朋友议论过，说普通的棒冰太硬，“白雪公主”软中兼硬，有弹性，而且是巧克力滋味，听了真令人神往，用“梦寐以求”来形容毫不为过。他让我看的电影以卡通为主，如《木偶奇遇记》、《唐老鸭》、《米老鼠》、《大力水手》和滑稽片《劳莱与哈台》，还有卓别林的黑白故事片。杨先生还带我去过“回力球场”，这是一种双人壁上对打球赛，属于赌博性质。还去“逸园”看过跑狗赛，也是一种赌博，赌注颇大，赌法有单赢、双赢、连赢等等。

杨霁云先生的夫人也是常州人。她很会做菜，有一味香糟肉十分拿手。在我１０岁光景，杨先生股票上赚了一点，要请母亲去吃“年夜饭”。为此预先向我打听：“你妈妈喜欢吃什么？”以为童言真实无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妈妈喜欢吃肥肉。”不料闹出大笑话。到了吃年夜饭那天，杨师母尽向母亲碗里夹大块大块的糟肥肉，吃了又夹，并说这是你家海婴讲的“妈妈

喜欢吃肥肉”。母亲这才恍然大悟，解释说：其实自己也是不大爱吃肥肉的，只因平日家里买的肉总是肥瘦相间，孩子发育期间，以吃瘦肉为佳，所以给他吃的都是瘦肉，海婴半懂不懂，定要平均分食，我只好对他说“妈妈喜欢吃肥肉”。而我竟信以为真，才错递了“情报”。大家听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杨先生还好意要帮妈妈做股票，以缓解我们生活的拮据。他解释说，经过反复钻研，从报上的升降曲线，结合时局动荡以判断“买进”还是“卖出”，试过几次，胜算概率颇大，因此建议母亲与他合在一起做，他会按时送来赢利。母亲实际并没有多少钱，就抽出生活费交给他。前后做了一年，结果输多赚少。后来据说他回乡卖了田产，这亏空才得以弥补。

杨先生得到日寇要侵入租界的讯息，并听说虹口地区已经风声很紧，便建议把父亲的日记抄录下来分藏几处，以保安全。这样，在１９４１年日寇占领租界前，母亲将存放在“麦加利银行”保险库里的鲁迅日记取出，分册抄录，杨先生也

帮着抄，他们的右手中指都抄起硬硬的老茧。

解放后，冯雪峰把杨先生请到北京的鲁迅编辑室工作，后来又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他还是北京鲁迅研究室的顾问。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６日去世。

杨霁云先生还有两个至死都不肯透露的秘密。其一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父亲曾给他写了两幅字。其中一幅披露过，而另一幅却一直不让他人看，哪怕是挚友至亲。他说，拿出来似有抬高自己之嫌。再有一个秘密是父亲生前与他谈过许多看法，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执政后的一些分析估计。这些内容杨先生也一直没肯讲出来。即使我去探望时一再问他，杨先生总是婉言回绝：“以后再说，现在不讲它。”不过我想，这样也好。父亲的一生，给研究者留存点悬念，也是有趣的一件事。

第五十八章　常姨

在讲述母亲被捕这一节里，我曾多次提到常姨。她名叫常瑞麟，是母亲从天津女子师范读书时起相知一辈子的挚友。她俩在生活上一直互相关心照顾。我父亲在１９２９年便有致常瑞麟丈夫谢敦南的信，告知我出生的情况，还多次寄赠过我们的家庭合影。

在母亲被捕前约半年，常瑞麟全家从东北迁沪。他们来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料理她丈夫祖母的丧事，同时也为了操办侄儿婚事。再有个打算，就是要把两个儿子谢绥、谢龙送到上海的学校读书。因为那时占领东北的日寇已在搞“奴化”教育，中文程度很低。她让我母亲教兄弟俩国文课，顺便复习英语。我也趁机当旁听生。由于谢先生家人口多，住房拥挤，两兄弟便从这年的五

六月起，住在了我家。母亲将和我合睡的大床让出，由三个男孩同睡，她自己在旁睡另一张单人床。所以后来日寇来抓母亲的情景，他们兄弟也是亲眼目睹的。我记得日寇和汉奸并没有查问我们三个男孩子是谁。看来他们的任务并未要抓孩子，也没“即兴”多带一名“人犯”去交差的念头。

母亲教他们的课文是《桃花源记》、《陋室铭》和朱自清的《背影》、父亲的《秋夜》。还送给他们儿童读物《小奸细》和《少年英雄》，前者叙述一个贫儿“小瘪三”的生活和抗日人员共同斗争的故事，后者是描写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活动。我想，这两本书对谢氏兄弟后来参加革命不无潜移默化的作用吧。谢龙曾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谢绥已经离休。我们至今一直有来往。

父亲的去世和搬家等一系列大事，使母亲在伤心和辛劳的双重折磨之下，体质每况愈下，反复感冒，久治不愈。她原是生长在南方的，到１８岁才北上求学，因此每到冬天，总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这时候她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流着

清水鼻涕，嗓子也疼痛咳嗽，常常要延续一个多月，服药也不见效。但那时她并不在意，以自己年轻的身体支撑着。而现在，她不能不担心地想到会不会从父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趁身心两亏时发作了呢？

到次年放春假时，来了一位好友，就是蔡咏裳阿姨。她见母亲身心如此虚弱，便劝母亲到杭州一游，借此散散心。母亲同意了。至于我，听得能到杭州去玩，自然心里极为兴奋。殊不知母亲心里竟另有打算。她在一篇《悼念一个朋友》里写道："见到了C（指蔡）女士，真有预先托孤之意。"因为她感到自己身体状况"颇觉严重了，在医生叫我照X光之后，尚未知道是否肺病，像待决的囚徒"，又想到七岁的孩子，"既不强壮，倘使更有那不治之症，如何招呼他长大呢？"——原来母亲是想借此让我和蔡咏裳阿姨有个熟悉的机会，万一自己发生意外，也可以将我"顺利交接"与她。几年以后，在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前夕，母亲曾经打算带我到南洋去，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计划也是蔡咏裳阿姨安排

的。可见她俩情谊之深厚。

第五十九章　蔡咏裳阿姨

蔡咏裳阿姨生于１９０１年，１９２６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香港任职于苏俄远东情报系统的“第三国际东方局”。１９４０年因难产去世。

按常情说，若要“托孤”，当时叔叔婶婶正和我们合住，将我交给他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是周家的血脉嘛。但是母亲选择的前提是我的政治、教育的成长方向；当然也考虑到叔叔自家孩子太多，已经不胜负担，哪能再增加一个我呢日本军队进租界前，母亲交待，如果她遭到日本宪兵逮捕，让我住到王任叔家里去，这也同样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总之，这一切并非出于对建人叔叔和婶婶的不信任。

我们一行在杭州玩了 3 天。在西湖游船上，我们吃到了山核桃、香榧子和一种绿色的菜瓜，那种香脆可口的滋味至今仍不能忘怀。我们还到灵隐、虎跑、六和塔、九溪十八涧、岳坟这些名胜古迹游览。那时游客不多，环境安静，空气清新纯净，民风也朴实，对游人“刨黄瓜儿”（注：刨黄瓜儿：漫天要价、欺诈。）的极少。蔡咏裳阿姨带了只蔡司牌小型相机，不时给我们拍照。我是生平首次按快门，可惜我的手震动不稳，拍的那几张，图像都不清晰。返沪后，她送来一叠照片，至今还留存在我的相册里。可惜的是，所有的照片里，都没有她的形象。我现在想，这或许是蔡咏裳阿姨肩负特殊的工作任务，不能随便留影之故吧。只记得她瘦瘦小小，比母亲个子矮，性格开朗，也用广东话和母亲交谈。没有她的形象留存下来，我至今都觉得深感遗憾。

自杭州愉快地游览休息过后，母亲的咳嗽减轻不少，脸色也没有原先那么苍白了。加之经医生复诊，X 光确定，肺部没有结核性病变，说明仅是劳累过度所致。由此，母亲度过了忧心忡忡

的日子，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关于母亲与蔡女士相识的经过，母亲在上述《悼念一个朋友》的文章里，曾有叙述："所深刻遗留着的最早的一次印象，是在鲁迅先生纪念五十岁诞辰的那一天。在三两个女性之中就有她。……才始知道她是Ｃ女士。"即是说，蔡阿姨与母亲是在偶然的机会中不期而遇的。但到后来，她们竟发展成了莫逆之交："不管我们怎样地潜伏着，每回到上海，她总想尽方法来畅谈一下。而每回的相见，她的经验、常识，以及体魄，都壮大起来了……不是'西关小姐'型了。每次相见，我们都增加了快慰。"

关于蔡阿姨后来去世于难产的详情，母亲曾告诉我一些。蔡阿姨结婚后，想到自己的艰险工作和年龄将不宜于生育孩子，但又想为了丈夫，赶紧留下个孩子，竟不幸由此而亡故。那时她正在香港。

第六十章　袁雪芬与《祥林嫂》

胜利后的某一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年轻女士，身着浅月蓝色旗袍，坐在我家二楼桌前，显得文静而拘谨，脸色稍显苍白。母亲告诉我，她就是越剧界有名的袁雪芬。恰巧我手头的照相机里尚有底片，就为她拍了一帧照片。

袁雪芬此来的目的是为将父亲的小说《祝福》改编成越剧，来征得母亲的同意。父亲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而且一向以演才子佳人为主的越剧能够改而表现现实生活，这本身是一件大好事，母亲当然很愿意予以支持。甚至当袁雪芬提出，为了剧情的需要，改编时要添加一些内容，她也爽快同意了。总之，这次会面，她们谈得挺愉快。

此后，袁雪芬又到我家来过。因我当时不在家，她们谈些什么不得而知，我想不外乎仍是关于改编的事吧。我只晓得，过了才两个多月，这部改名为《祥林嫂》的戏就公演了。

为了扩大这出戏的影响，母亲动员文化界的朋友于伶、田汉、黄佐临、史东山等前去观看，受到他们一致的好评。有少数朋友，如胡风等几位，对戏中增添的“青梅竹马”情节有异议，母亲代为做了解释，得到他们的谅解。对此，袁雪芬一直心怀感激。几十年后，她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还说，“《祥林嫂》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许广平是我的指路人”。（《许广平纪念集》）

也许由于这段历史关系，母亲当时又是全国妇联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５５年，我国政府派越剧赴苏联、民主德国演出，母亲被委任为中国越剧团的团长。这是越剧头一回走出国门。她们巡回演出达两个多月，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应该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因此回国后，越剧团的主要成员包括导演南薇与袁雪芬、傅全香等十多位主要演职人员，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

切接见。读者也许看到过记录这次接见的照片，可是你曾注意过没有，这当中，惟独没有作为团长的母亲。当然，母亲并不计较这个。她依旧精神饱满地干她该干的工作。直到许久之后，才清楚其中的原委。

事情是这样的：剧团在国外两个月，对方主人想得挺周到，他们认为剧团演职人员多是女性，必定需要添置些日常生活的用品，因此按人头发放了少量的零用钱。这钱开头不敢分发，直到临近回国，在一次正副团长的碰头会上，母亲认为团里都是当妈妈的，让她们带些纪念品回去，也可博取家人儿女一笑。为此提议取出部分款项分发给每个人。这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团员们自然都兴高采烈。母亲也为长孙买了几个小玩偶和一些日常备用药品。殊不知回国以后，这件皆大欢喜的事竟被视为“不当”。那么，作为对主要负责人和提议者的警戒，母亲被剥夺受接见的资格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在这里顺记一笔，不为替母亲倾诉委屈，只想说，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的。

第六十一章　母亲娘家的亲戚

母亲娘家的亲戚我后来才知道，母亲的广东娘家原来是个大家庭，叔伯舅姑关系繁多，单是住在上海的就有好几家。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住在虹口大陆新村时期，母亲与她娘家一边的人可以说没有任何往来。此中缘由我一直不曾向母亲深问过，不过以我现在的理解，不外乎这两条吧：一是母亲当年随哥哥离家北上天津求学，是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这在那个年代是礼法所不容的，由此与家庭断了往来。可见母亲思想之进步，性格之刚烈；再一个原因，许是出于对父亲安全的考虑。那时白色恐怖弥漫，国民党反动派视一切进步文化人士如眼中钉，父亲自然受到的威胁更大，因此他的住址对外保密，结交的朋友除非关系特别者，都尽量约在外面或在内山书

店会面。为此之故，母亲自然要避免与自己娘家人往来了。

直到父亲去世，我们迁居霞飞坊，上述的禁忌才一下子解除。且又过了这么多年，随着时世变迁，娘家人的思想也逐渐开通，能够重新接纳“叛逆”的母亲。这样他们就如“雨后春笋”般一下子在我面前冒了出来。我为此感到庆幸，除了建人叔叔一家，自己原来还有许多舅舅、舅妈、表哥、表弟。

记得我们住到霞飞坊这些年里，每逢春节后的初三四，母亲总带着我去许家亲戚拜年。主要去的是西摩路（现陕西北路）。这个地域代号表示是广州的许氏舅家门。

进门见到的长辈，都以某某数字称呼，如“廿九舅父”、“卅一舅妈”等，可见人口之众。这使我像广东话说的，“一头雾水”。而我得面对这众多生人，要行礼如仪，又要尊敬地恭称××舅父、××舅妈，还不能搞错出洋相，弄得我实在头脑涨涨的，直到现在我所能记得的，就只有一位“豆皮卅二舅父”。因为他幼时出过天花，大家

都这样叫他，我才没有忘怀。另一个显明的印象是舅舅们都比较瘦，至少我从未接触过大腹便便的（我之身材瘦高，直到现在还无需节食，体形没有从父而从母，脑子也笨，看来绍兴周家给我的遗传基因不多，倒是广东母亲系统占先吧）。

　　这西摩路的房子，原是母亲堂哥许崇智在上海的公馆，我从未见过他，故也无从知道他是我的第几号舅舅。只晓得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辛亥革命后当过粤军司令，但后来似乎政坛失意，长期居住在香港，以经商为业，闲时打打麻将，再也不过问政治。这里从此就成了另几位舅舅聚居的家。另外我还记得，舅家住在一家叫陶园的著名广东香肠、腊鸭店附近，母亲带我去拜年之后，总是顺路买点腊味回家。

第六十二章　许月平姨妈

由于母亲常带我去舅妈家走动，相互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因此其中有几位住得离我家较近的远房外甥，也不时地到我家来坐坐。在闲谈中，母亲常常有意识地向他们深入浅出地讲些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道理，有时还相互辩论，气氛十分热烈融洽。临走时，还借些进步书籍让他她们带回去阅读。她的外甥女许锦漪，在怀文中学念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并带着弟弟许锡采同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我想这与母亲的影响不无关系。至于母亲的几个嫡亲侄子，那是在我们搬进霞飞坊不久就来走动了。首先来的是许锡玉、许锡申兄弟俩，还过了夜，没有眠床，就在亭子间里打地铺。他们是二哥许崇欢的孩子。锡玉表哥要比我大十岁半。他后来当铁路工程师，１９５７年

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退休于广州。母亲１９６８年3月去世，他赶来吊唁，进屋后哭泣着要下跪行大礼，被我们劝阻。锡申抗战时参军到滇缅公路，多年以来再也没有遇到过。

母亲还有一个侄儿锡琳是三哥许崇怡号叔和，抗战时病逝于重庆的长子，上世纪５０年代分配到北京，在国家某机构工作。有一次出差广州，按规定可以乘坐硬席卧铺，他“自作主张”没有享受卧铺，改乘廉价的硬座，往返差额有几十元，他补充若干，凑起来买了只国产普通手表。这只亮晶晶的手表引起他所在那个小部门的轰动，他便一五一十地向大家传授了这省钱的经验。不久“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单位就凭这件事定他为“老虎”，遭遇可想而知的待遇。他一时想不开“便自绝于人民了”。他的母亲那时刚到北京不久，便遭受到这丧子之痛。锡琳这一“走”，扔下两个正在读书的男孩和一个小女儿，媳妇也正年轻，其悲戚之状可想而知。母亲对此也无可奈何，除了时加慰抚，惟一能做的便是设法安排侄媳到民主促进会去工作，以维持生

计。

母亲在家族里排行第六，常听到亲戚们叫她“六姑姐”。她有两个嫡亲妹妹，一位只小她两岁，叫许东平，我将在另文讲到。另一位许月平姨妈，比母亲小了６岁。母亲离开广东跟随哥哥到天津去读书的时候，她还很幼小。等到１９２７年母亲回广州与父亲会合，那时父亲正在市区开了一家书店，需要人手，母亲就让这位小妹妹前来帮着卖书。

这个书店很小，是为进步文艺青年而开办的，坐落在一条叫芳草街的小胡同里，租金为６０元，二楼，一前一后两间，附带一个小厨房。前房做书店，许月平姨妈住宿在后间。前房三边矗立书架，中央一个长柜，读者只能挤在书架之间站着挑选。这就是开张不满半年的“北新书屋”。母亲虽常去书店，仅是帮忙，实际上这书店是由小妹妹在一手经营着。半年后母亲与父亲赴沪，书店也随之停业。之后母亲似乎与这位姨妈并无多少联系，也许结婚后忙于家务吧。

“四人帮”粉碎不久，月平姨妈来北京，我们才初次见面。她是从香港九龙参加旅游团来北京的。姨妈到北京之后，便在东单附近一个部队开办的半内部招待所那时港澳地区旅客不能任意入宿旅馆住下，我邀请她到家里坐了坐。在那个年代，一位６０多岁的老人敢于只身到一个生疏的刚刚经过“文革”的大陆城市，探望七八年前去世的姐姐后人，真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第六十三章　母亲写给郁达夫的信

日寇侵占租界后的十几天，母亲便被日本宪兵投入狱中，施以酷刑，前面已经叙述过。从狱中出来，母亲面临两个选择：是带着我离开上海到抗战的内地重庆，还是坚守在上海？但当时母亲和我的身体状况都不佳。母亲出狱后身体十分虚弱，两个膝盖被电刑烧成焦黑色的圆块，步履艰难，且又贫血咳嗽，正由杨素兰女医师治疗，我也又到了气喘病发季节，夜不能寐。因此我们两人都不宜长途跋涉。

但母亲最主要的考虑是：霞飞坊里存有这许多父亲的遗物，这是母亲心中的至宝，她如何忍心离开？当然也根本不可能随身带着迁移。因此，虽然她在日本宪兵那里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也明知他们绝不轻易放过自己，会随时随地盯着

你的一举一动，母亲仍决心留下来，坚守父亲的遗物。朋友中间有不放心的，如凌山阿姨多次关切问过母亲，而她的决心始终不曾动摇。

另一方面，困守上海的亲戚朋友也不在少数。首先是几个远房舅舅，他们并没有流露出离开的意思。也有一些朋友由于家里人口多，后方又缺少谋生的关系，只能忍而不动。何况其中还有一些文化人，如叔父周建人和夏尊、柯灵、董秋斯等等，认为在孤岛仍有抗日工作可做，有意识地潜伏下来暗里进行斗争的。这些都使母亲感到自己并不孤独。但是，要在夹缝里生存谈何容易。父亲生前虽为我们母子准备了一笔钱，但是正如前所述，由于丧事和搬家，已几乎告罄。因此在日常生活方面，母亲早在尽量压缩开支，并把所住的一楼、二楼和二层、三层楼的亭子间都租出去。母亲和我已挤进三楼的书籍夹缝里栖身。

我们母子当时的困难，真切地反映在她写给郁达夫先生的信中。这封信写于１９４０年１月３日。同年２月１日，发表于郁先生主编的新加

坡《星期日报·晨星》副刊上，并加上了《孤寡之声》的标题。

这里摘录信的一小部分如下：达夫先生：十二月十日惠示拜悉。目前从适夷先生处交来先生写给他的信，也谈及先生关心我们的生活，闻之衷心感激，几至泣下。窃自鲁迅逝世以来，忽又三年了，这似久又暂的光阴，就这样飞度了过去，承许多关心的老友照顾，留心到我们的生活，是万分感激的。自鲁迅逝世后，我还支持着度日，有时学写些小文，但不能卖钱。上海文人多如此，偶然收到三五元的酬金，真是杯水车薪，毫无补益。《鲁迅全集》虽出了，但头两版因要普及，殉朋友之情，每部（三十册）只收版税一二元……而目前上海生活费较战前贵了两三倍以上；有时是难以预料地不可捉摸……而我经常还有两重负担，北平方面，每月开销，鲁迅死后，我一直担负支持全部到两年之久。实不获已，才去信二先生周作人，请他负担，他并不回信，只由老太太来字说他担任一半，其余一半及意外开销还要我设法，想到她们孤苦，我也只好

硬着头皮设法，如此又度去了一年。但上海近来开销更大了，房租大涨，再加海婴体弱，哮喘时发，不得不多方医治。每月生活费及医药（非常贵）以及营养等费。只他一人有时至百金以上；其余共计每月非二三百元不可。如何能维持得久远呢？

从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母子俩的艰难度日，连远在南洋的郁达夫先生都得悉了，故有邀请我们去南洋的动议；不仅如此，他还在南洋发起募捐，以期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这真令人感动。

第六十四章　一个账本

为了坚守上海，保护好父亲的遗物，母亲开始靠出版父亲的著作以维持生计。

需要指出的，母亲出版这些著作的初衷，原是为了纪念和宣传父亲的作品，为此早在１９３８年就与朋友们一道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编辑场所就设在霞飞坊我们的家里。直到１９４０年，为了生活，才开始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发行父亲的著作。

关于出版社，我至今还保存当年母亲手书的一个账本，那是自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３年６月，总共７个月。为什么后来停止不记了，我尚未想出其中缘故，留待以后再分析吧。

从这２４笔账目的趋势可以看出，想以出版父亲著作来维持生计，也不容易。从１９４３年

的三四月开始，书籍的销售情况越发清淡。光明书店仅要了５０本书，还欠付。兄弟书店也是7天后才付款。单行本仅卖５０本—１２０本，且花了一个半月之久，扣除成本，实际没有赚头，可以说是在吃老本。而整整7个月里，全集仅卖了４部，“三十年集”４４部，单行本１８５０本。

我记得母亲接到书店要书的清单，总是又喜又忧，心里矛盾得很：既有可以借以糊口的收入，又是亏本生意。销出去的书一般总是由我把书送到四马路的书店，店里也常常拿不出现金，只能得到一张远期支票。支票轧入银行的户头里，有时遇到退票，再换一张支票，等于拖延付款。好不容易等到可以支付的日期，书店忽然又来一个电话，说再迤迟几天，母亲也无可奈何。

面对这种困境，母亲只得连客户是谁都不管了。比如中央书店来订购书，母亲想这家是国民党背景的店，卖还是不卖，虽然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将书发了出去。过后倒也未有什么动静。想必他们也是在商言商，只为利润计，并不考虑

政治吧，这才放了心。

账面上所记卖了 4 部纪念本，这本是母亲不肯轻易出手的，只因手头实在拮据才忍痛割爱的。当时母亲为此常常流露的那种焦虑和无奈，直到今天还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至于此中遇到的种种纠葛和不愉快，直到多年后母亲回忆起来，仍不免感慨系之，心潮难平。

比如著名的生活书店，他们以前出版父亲的著作，却从未认真结算过版税，而负责人章宗麟竟在《上海周报》上著文说，他们印了多少书，付了多少版税给许某人。这使母亲看了不由怒火中烧。须知，对她来说，有没有付过款倒还在其次，却会引起北京方面的误会。如朱安女士，她会认为母亲在向她故意哭穷而克扣她的生活费，如果周作人再乘机插上一杠子，搞点什么名堂，岂不会造成分解不清的纠纷？母亲为此当即写文章予以辩驳，却被主编章宗麟扣下不予发表。因此后来当胡绳先生代表生活书店来商借《鲁迅全集》的纸型，应允每印一套给一元钱，母亲因余

气未消而不予答应，连朋友也得罪了。

第六十五章　痛心之事

最让母亲痛心的是其中竟还有多年的熟朋友，利用她的宽厚和商业上的缺少经验，从中渔利。这位先生已经作古，我本不该指揭故人，但我又不能不尊重历史。当然我也不会忘记这位先生曾经为我父母做过的事。

１９２７年，母亲随父亲来到上海。不久父亲与内山完造先生相识。相互熟悉后，有一回内山先生向父亲讲起，他手下有两个信赖的人，一个是日本店员长谷川，另一个中国店员就是这位先生。说他年轻，日语学得快，人也老实，店里新添人员大多由他介绍来的。店里凡有纠纷或人事问题，都靠他们两人处理。因此内山完造得以抽身于社交活动，结交中国的知名人士。

父亲生前那些年，但凡内山先生有事要与父亲联系，如递送书籍信件之类，或父亲要托书店办什么事，内山先生总是派他过来。可以说他与我家相当熟悉。正因此，当抗战胜利，他告诉母亲，内山先生的财产已被没收，将要遣返日本时，母亲拿出２０元托他转交。。内山回国，书店关了门，他失了业，来寻母亲，请求说：“我现在空闲着，周先生待我不错，我有空多来看望你，四马路的书店我都熟悉，他们要批进书，我顺便来带走，岂不方便。”母亲信任他，便爽快地答应了。在运送书籍过程中，他看到有些畅销书缺售，如《呐喊》、《彷徨》等，回来向母亲反映。但要再版，母亲的手头紧缺，凑不足钱。在此窘境下，他又提议说：内山完造临走给了他十几令白报纸，愿意先拿它垫用印书。母亲想，印出书之后，陆续偿还也可，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母亲见他常要去四马路推销书籍，挺辛苦的，出钱替他买了一辆英国进口自行车。我当时正在读初中，每天却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学，而它原是许寿萱儿子用的，因去英国留学，才借给

了我。因此我对他拥有这样一辆又轻便又美观的车，真是又羡慕又吃醋。

母亲劝导说，他与你不一样，要出去跑生意，很辛苦的。由此可见母亲对他的器重和关心。但是过不多久，却发现他不再骑这辆自行车而包了一辆三轮车来往，派头大了。且衣着鲜亮，俨然以经理自居起来。原来他把自行车给自己儿子玩了。随后又听得他在背后散布自己是在不拿工钿白干活。

当《彷徨》、《呐喊》印制完成，母亲要和他结算纸张的款子，他先提出这批书就算一人一半吧。虽然明知这样给他占了便宜，母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谁知过了几天，他又向母亲提出：鲁迅全集出版社也应当有他一半的份儿。还拿出两份合股合同要她签字。母亲想书分他一半，已经便宜了他，但那是从我分内给他的，自己可以做主。至于出版社这是许多人集合而成，于是回答他，我无权做主分割。他才无言走了。

过了若干时候，他又来对母亲说，他一个人跑书店不方便。现有一个朋友叫邵维昌，为人老

实，会文书会计，让他来帮帮忙吧。母亲又是老实地想，长久让王亲自搬运书籍确也不宜，有邵维昌住在我家，就有了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于是表示接受他的建议要他，由母亲每月付给工资，并管吃管住。

母亲对他的信任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连父亲的手稿自己积蓄的钱，都交付他保管。

第六十六章　轻信

再说邵维昌，自从被荐来之后，那位先生就很少露面了，但母亲对他仍很放心。

邵维昌经常跑书店，大腿有疾病，走路一拐一拐地，很慢。他自己说：“这是‘穿骨流注’勿容易治愈的。”显得挺悲观。母亲介绍他去红十字医院治疗，并送他医药费。邵对此很感激。在业务上，他揽生意多次空手而归。母亲也不计较，照常付给他工资。有时还让我去买原甏（２５公斤）的绍兴酒，供他和许寿萱共饮。

也许母亲那种亲切关怀和信任感动了邵维昌，有一天他终于向母亲坦白说：这位朋友让他住在我们家，原来是派来做“眼线”的，以“监督许先生的鲁迅全集出版社”。因为他自以为霞飞坊６４号里的书有他一半的份儿，提出让邵来掌

握账册资金的进出，也因为这里面有他的“一半资金”。母亲听了，自然大感意外，从此不能不有所警惕。不久她就发现，自从邵维昌来了之后，售书的生意逐渐清淡，再也没有新的客户前来购书，有业务来往的仅是一两家原来极熟的书店，这使母亲从此开始留意起来，后来终于发现这位朋友背后做手脚。

那是某一天，外地一家书店寄来一张订购目录单，受者竟是鲁迅出版社，少了“全集”两个字。母亲立即追究这个社的来历，逼得邵维昌不得不说出：他去他的家，看到他家的前门墙上，悬挂着“鲁迅出版社”的招牌。很显然，这家外地书店是按原址写了，才“错投”到我们家，母亲这才恍然大悟，她被蒙骗了。

原来，这位朋友看到印售鲁迅全集有利可图，就算计着想插手进来，他当面对母亲说得好听：“侬年纪大喽，用勿着介辛苦哉！坐洞（在）屋落（家里）享享福，我到辰光来送版税，侬坐坐吃吃好哉！”母亲想到在他家里寄存着鲁迅的手稿，有这份情谊，才同意让他参与鲁

迅著作的出版业务，让他也得些好处。但她只答应让其印刷《三十年集》。而他竟趁机搞起个冒牌出版社，来与“鲁迅全集出版社”争抢生意了。

邵维昌在他不端、不义行为暴露之后，言语中也露出对他的不满。有一天邵维昌对母亲说：他让他去家里便宴，听说还请了别的客人，不晓得该不该去吃这顿饭，拿不定主意。母亲想趁机去摸摸底，就对邵说，我也想去走一趟呢。于是两人一同到了这位朋友的家，但见排场阔绰，楼上楼下都是书店来的人，还有好几张桌子在打麻将。他突然发现母亲到来，面孔立即变得尴尬难看，又听那批客人连声称呼他“老板”，比经理还高一档，一时变得手足无措。当然，见此场面，母亲心里也就明白了，马上识相地退出了。她从此彻底看透了这位朋友。

随后母亲很快采取措施，会同朋友，向他要回寄存的鲁迅手稿和钱，他见已经隐瞒不住，只得坦白说，“我偷用了你的钱”，答应一定退还母亲应得的一份。待算完账退还了钱，还立了正式的字据。母亲后来告诉我，抗战胜利后能够重修

父亲墓，其中一部分费用就是他退还的钱。但他对交还这笔钱一直心有不甘。１９４６年的冬天，快到春节时候，他突然闯来我家，说没有钱过年了，要拉母亲一同去跳黄浦（江）。意图很明白，他要讨回这笔钱。为此纠缠了一个上午。直到母亲告诉他，钱是从鲁迅著作中得来的，并已用于重修鲁迅墓，他才无奈而去。

第六十七章 聚餐会

大家知道，母亲在学生时代就是个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分子。后来她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社会活动一概不参加，约她写稿统统谢绝，成了地道的家庭主妇，朋友们称羡的“贤内助”。

父亲故去，我们母子俩搬到法租界霞飞坊栖身，经济拮据，幼小的我又三日两头被病魔折磨着，真使她身心都承受着重大的负担。即便如此，她仍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身于当时抗日救亡和社会活动之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只是很抱歉，那时我还年少，又是在疾病与学校之间度过的，因此我的回忆只能是“一鳞半爪”、点点滴滴的了。

上街义卖和参加抗日救亡座谈会记得那是搬到租界不久，母亲听说上海市民在组织慰问队到

敌后慰问抗日战士和新四军，虽然自己经济力量微薄，仍凑钱买了１００支手电筒，（我记得买的是国产“大无畏”牌子），每个电筒配了两节干电池。还买了备用电池和电珠各１００套。母亲又领着我以“节约献金”、“劝募寒衣”的名义上街义卖纪念徽章。我们的捐献和义卖所得，都送到何香凝那里去。

那时何老太太住在法租界离我家不远的一条弄堂里（记不清是否是辣斐坊８号？），她家楼下的客厅，堆积着一个个帆布包，直到房顶。许多阿姨还在忙着往包里装急救用品。我记得那是草绿色袋子，内分几格，分别装进剪刀、镊子、纱布和急救包。袋边还插着几个瓶子，分别装着红药水、酒精和硼酸水。另有几个牛皮纸袋，告诉我这是消炎药粉。别的还有什么就记不得了。客厅另一角落堆满布鞋，都是手工纳的千层底子。还不时有人三三两两送来，增加了鞋“山”的高度。原来这些都是以劝募来的资金买的，连同棉布、棉衣、棉背心，统统集中到何老太太那里，再运送到新四军手里。这当然是沦陷之前的

事。

上海沦为孤岛后，母亲的活动并未停止，她曾带我去参加过两个座谈会，分别称为“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前者范围小人数少，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吴大昆、冯宾符、周建人等。会议常邀请党内人士讲述国内外形势。他们开会时并没有对我说“你到一旁玩去！”我听着虽然似懂非懂，多少也有点开窍。

座谈会为了隐蔽，总是找敌人容易疏忽的公共场所举行，因此那些地方总是相当安静。大家在饭前二小时左右陆续到达。比较经常去的地方是功德林蔬菜馆。有时也去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和一座记不得名称的和尚庙。聚餐费是按名头出份子，但我经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让母亲交两份餐费，席上也不对我有丝毫的年龄歧视，照样在圆桌上占个正位。饭后散去时，为了保证我们母子安全，总是安排我们在中间时段离开。

第六十八章　记忆深处

据褚银先生的文章回忆，另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除严景耀外，有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凭我的记忆每次的人数大致是6至8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比如说，沈体兰、吴耀宗见到少，冯宾符、林汉达经常来。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大概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我便溜到大殿、偏殿东张西看。那里一个香客都没有，亦不见和尚。面对狰狞可怖的金刚，我也不觉得惧怕。看到供桌上有签筒，我也不摇不求，随手抽出一支，上写着

“求签心不诚，罚灯油几斤”，又随手抽出一支，仍是罚灯油。好几支都是如此，我便悄悄地离开了。如果认真起来，赵朴初先生不知如何替我交待呢。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件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参加某个妇女界抗日座谈会，很奇怪一向对我关怀有加的阿姨们突然变得挺冷淡。我当时年少，懵里懵懂也不以为意，仍然随处走动，看到有一张桌子的抽屉旁醒目地放着几张角票，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这样放着，仍旧我玩我的。直到解放后，当时与会的一位阿姨才告诉我，这是她们共同策划的，因为在某次座谈会后，她们发现少了几角钱，便企图以此测验我周海婴是不是小偷。虽然已时隔几十年，我听了仍不寒而栗，深感她们设置这样的“陷阱”是何等不当和危险。须知我当时还是个１０岁左右孩子，头脑里还没有“偷”和“拿”的罪错区别，犹如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个孩子去某家做客，看到好吃的食物，很自然地拿了就吃，而不知什么“规矩”和“礼貌”。要是我当时果真不慎拿了，那不仅是“鲁迅儿子是偷儿”

的铁案成立，甚至有可能连带影响母亲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权利，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不要遇到这种“测验”，也请一切为父母者三思。

遇到生病的日子，母亲就把我留在家里卧床休息，临行前总对我再三嘱咐，要我按时服药。有一次我不慎服下两倍量的药水，以为犯了大错误，心情紧张到简直要昏头转向，心想或许会中毒吧？眼望着挂钟的分针，怎么也不见移动，什么胡思乱想全都冒出来，妈妈迟一刻回家，恐怕只能见到我的尸体了……

母亲曾有一篇文章《扁桃腺》，写有一次我开刀后的诉说：“蒙药真难闻，（用的是可罗仿—乙醚）大约三分钟，心里晓得，口里说不出话来，好似说不出的可怕。他心里想：”见不到妈妈了，妈妈白养他了‘，这孩子就有如此多的想头，听了也叫人难受。他边说边哭了，每逢提到这时的心情，他就泪水汪汪地想哭。像这样善感的孩子，全身麻醉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可见我当时的恋母心理。

好容易盼到母亲回家，全部神经立刻松弛，心跳也平稳下来，喜笑颜开地迎接母亲，似乎是从死亡里逃了回来。今天回想，这种药水其实不过是棕色的甘草止咳合剂，里面加了少量的“可待因”而已，多喝一点，实在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第六十九章　母亲与中华女中

孤岛时期，上海妇女界成立难民救济会，母亲任会长，同时还担任中华女中的校长。她为这个学校聘请了许多有渊博学识和教学经验的老师，学校的教学受到广大学生欢迎。１９３９年大汉奸汪精卫准备在沦陷区粉墨登场，敌伪加紧向教育界下手，上海的形势日渐恶化。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这个抗日救亡思想的培育阵地——中华女中自然也受到威胁。母亲作为校长，收到几封恐吓信，并被便衣特务跟踪盯梢。这样，母亲的行动只能缩减，许多地方避免前往，以防牵连友人。凡遇必要的外出，临行总要对我再三嘱咐，使得幼稚的我也敏感地产生焦躁和不安心情。朋友们担心敌人有加害母亲的迹象，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她尽快撤出学校。这段经历，

曾有文章回忆到。在学校的校务扩大会议上，母亲宣布："学校保不牢，有人要来接管，我也要离开学校了。"蔡夏莹等老师也在会上讲话，情绪激动。移交前，为了避免后患，母亲、蒯斯曛老师与学生曹贞华，一同在宿舍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以免有什么"把柄"遗留下来发生意外。母亲还和学生开了告别会，叮嘱说："要做坚持真理的人，要坚持斗争；最后胜利必属我们，我们后会有期……"师生们相对而泣，挥泪而别。

在母亲留存的资料里，有一份当年中华女子学校解散的"让渡费"账单，从中可以看出母亲支撑这所学校之不易。学校的经济长期处于困境之中，教职员工半年、一年发不出薪俸，甚至连必要的粉刷墙壁的６０元钱，还要靠教员借助。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时期母亲为学校曾向一位"王先生"筹借过两笔款子。我记得母亲带着我去拜访她的情景。寒暄过后，王先生很自豪地带领我们到后院，欣赏她饲养的猛犬。只见院内有将近十个铁栅笼分布四周，笼子上都是手指粗的铁栅。每个笼里养一条、几条不等。

这位“王先生”莫非就是当时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为此我拜访了梅益同志。梅益老已经８０多岁，但他的记忆极佳，不假思索就把我的问题回答了。不错，这“王先生”就是黄定慧女士。他说：在北京能够比较了解黄定慧的，恐怕我是惟一的人了。

梅益老告诉我，黄定慧的丈夫叫陈志皋，他是律师，又是做银行业的。抗日前就经商，一直颇具经济实力。陈志皋还是《译报》董事会的主任，黄定慧任董事长和经理。梅益同志当时具体负责这个刊物，而钱是他们出的。因此他与这对夫妇之间有着工作关系。

还有一个“互济会”，是专门暗中营救被捕革命志士、共产党员的，做了很多工作，可称之为政治性的慈善机构。黄定慧也参与其事。黄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她就担任妇女部长，可见是位很活跃很能干的女将。

那时上海有一批“难民收容所”，其任务是帮助流亡的难民，由赵朴初负责。黄定慧到了上海，也参加这件事，为它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因

为大量难民的进出流动，需要供应伙食、衣物、路费，耗资甚巨。到了１９３８年，黄定慧开办的钱庄因经营发生困难而关闭，生活拮据，便去香港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又帮助潘汉年做地下情报工作。

黄定慧还是一位才女，８０多高龄了还在写自传。近年兴之所至，还经常写写诗词，每有所得总会寄给梅益老看看。听了梅益老的介绍，我不禁对黄定慧先生肃然起敬了。

第七十章　我眼中的关露

由黄定慧，我想起了另一位女士关露。这位解放后长期蒙冤的革命者，当年给我的印象大约在２５岁左右，高个，烫发，相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是个能够单身深入虎穴的人。她常来我家，跟母亲很谈得来。

有一天上午，母亲带我去探望她。路程不远，步行去的。她居住在一幢弄堂房子的三楼，刚上楼梯，她已经迎了下来。身边有一位小姑娘，比我年长两岁光景，十三四岁吧。脚下跟着一只卷毛白色（北京）巴儿狗，调教得颇驯顺。关露住的房间朝阳，铺陈简单，却有一般住宅少见的双人沙发。据母亲讲，这位小姑娘是关露收养的，算是养女。我当时的感觉好像双方的年龄相差太近，似乎不合一般母女年龄的比例。当

然，这仅是我童稚的判断。究竟如何，便不清楚了。这次她和母亲相晤，似有告别的意思，表面欢愉的交谈中含有一丝凄楚的意味，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

这之后，隐隐约约地听到不利于她的言谈，说她投身日寇那边去了。母亲也不再提到她，更没有往来接触了。从此她一直被当作叛徒汉奸看待。直到１９８２年４月才得以平反，承认她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但她的个人生活仍甚为凄凉悲苦，并于同年１２月５日去世，骨灰安葬于八宝山。

为了撰写回忆录，我翻阅旧年相册，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中的人似曾相识。那是一位年轻女士与一个少女相拥而坐，膝上有一只长毛哈巴狗——这不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女作家关露吗？翻过背面，上有“广平先生、梅魂敬赠”字样，落款的日期是“二十八（１９３９）年中秋”。我持此照片去请教梅益老。他看了毫不犹豫地回答：不错，这人正是关露。并说这张照片很珍贵，值得附在我的回忆录里发表。既然这张照片有历史价

值，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将之寄给鲁迅研究兼文史专家丁景唐老人的女公子，关露传记《谍海才女》作者丁言昭，烦她转请关露还健在的胞妹，如今已９０高龄的胡绣枫先生再予辨认。孰料胡先生不认为照片里的人是她的亲姐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只得回头再去找梅益老。而他又一次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并且说出如下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来。

原来关露之打入敌伪机构，是梅益老所亲自派遣的，她的一切活动全由他掌握。抗战胜利后，群情激奋要求清算汉奸罪行，关露自然也成为进步文化界唾弃的人物，地下党为保护关露，仍由梅益老出面，交给交通员２００元路费，专门护送她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后来，又让她转赴大连，在那里隐姓埋名定居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她才移居到北京。因此梅益老斩钉截铁地说："关露的所作所为，包括她在照片背面题的字，都是我所熟悉的，我绝不会认错。"他倒怀疑胡绣枫先生虽为关露胞妹，毕竟９０高龄难免记忆有误，何况还有个特殊情况：关露曾与电

影明星白杨一起做过隆鼻术，她的手术又不甚理想，看起来有些肿胀，以致她妹妹一时认不出来也未可知。

梅益老还说了件有趣的事，她到苏北根据地后，曾托护送她的交通员带回一只藤箧。打开一看，里边仅有几双破丝袜，此外什么也没有。是原本就别无它物，还是藤箧里的东西已被人盗窃了？这事实在蹊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七十一章　董秋斯凌山夫妇

这个时期，母亲还常带我到董秋斯、凌山夫妇家里去玩。董秋斯先生当时已是翻译名家了，但他们夫妻二人住的地方却是白赛仲路上（现复兴西路）一幢 5 层公寓的顶层。这顶层原是给佣人住的，非常狭小，真是名副其实的“斗室”，仅能容纳一桌一床而已。顶层又没有厨房和水盆，用水是从悬挂式抽水马桶的水箱里用细橡胶管引下来的，一切生活用水全靠它。即使这样地蜗居隐蔽，在他们的女儿出生才两三个月之时，突然几个日本宪兵闯入房里搜查，董先生也受到宪兵司令部的审问。

他年轻求学时曾因肺病在北平协和医院切去一叶肺，呼吸能力减弱，面对这种审问，必定很受折磨。幸亏没有搜出片纸只字的把柄，也没有

让他们抓到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才未被投入牢狱。而别的文化界人士，如柯灵、杨霁云两位先生便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饱受日寇刑审之苦，甚至被放出狼狗扑咬，其惨状是可以想见的。

在执笔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母亲何以与董秋斯夫妇关系如此深厚？１９６８年３月，当“鲁迅手稿”事件发生时，母亲急得连夜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次日一早，她要找朋友商量，首先想到的就是董秋斯夫妇，这说明母亲与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只可惜我一直未曾想到过要细问这些。现在我只得去打搅还健在的凌山先生了。老人今年已经８４岁，对往事记忆仍十分清晰。她讲述了我父母跟董先生一家长久而密切的交往，同时也使我搞清了何以母亲会如此信赖蔡咏裳阿姨，当她病体不支时，竟欲将我托付于她。

我们的谈话先从董秋斯先生说起。原来他和蔡咏裳阿姨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１９２６年毕业后，两人就结了婚。随后一道去武汉编刊物，接着又南下广州，在协和神学院教书。就在

那里，董秋斯从公开的出版物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时，年轻的凌山也正就读于广州最大的中学真光中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良好英语的根底奠定了她一生从事译著的基础）。就在这个时期，她与董秋斯夫妇相识了。

可惜，董秋斯虽然长得身材高大魁梧，却不幸于１９２８年得了严重的肺病。先在上海求医，后来又因劳累过度致使大口吐血，病情加重。蔡咏裳阿姨遂于１９３４年把董先生送到北平的协和医院治疗，亏得一位德国名医以手术切掉左肺（去掉了７根肋骨，心脏也向右移位了），病后又转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去疗养。但董秋斯先生并没有让自己闲着，他开始为《战争与和平》这部煌煌巨著和别的外国名著的翻译做准备工作（他的早期译著《士敏土》是３０年代经父亲帮助出版的）。

由于董先生需在西山长期休养，蔡咏裳阿姨无法在旁照顾，便只身南下工作，夫妻由此而分开。到了上世纪４０年代，蔡咏裳阿姨与另一位姓戚的同事又是同志结了婚。这样，凌山阿姨才

与董秋斯先生结为夫妇。

第七十二章　被逼迫而死

我与凌山阿姨的话题又转到当年父亲５０岁的生日庆祝活动上。

这次活动是由史沫特莱等几位朋友所倡议，董秋斯是整个活动的口译者，这段佳话大家已经熟知。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又是什么机缘使史沫特莱选中董秋斯为翻译的呢？原来，当时董秋斯所编党的外围刊物《世界月刊》勇敢地全文刊登了日本法西斯那个鼓吹侵略战争的《田中奏折》，史沫特莱认为董秋斯很有正义感和胆识，设法结识了他，并通过他再认识还住在景云里的父亲。担任口译自然仍是董先生。史氏钦佩父亲，庆祝生日之举便由此而发起。

当时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父亲又是敌人的眼中钉，因此操办这个庆祝活动是要担当很大风险

的。董秋斯和蔡咏裳两位寻到法租界的一家荷兰餐厅，才使许多左翼作家有这一次值得载入史册的聚会。总之，这项活动的一切跑腿打杂，包括安全工作的布置，都是由董秋斯夫妇和一些同志承担的。我父亲与这两位关系之深厚于此可以想见了。只不过后来董先生与蔡咏裳阿姨离异，改与凌山阿姨结为夫妇，但大家的友情依旧。何况母亲起先也是经蔡咏裳阿姨的介绍才认识凌山的。

凌山阿姨生第一个孩子是１９４４年（正值罗马尼亚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所以孩子取名“志凯”）。我母亲细心地向这位初为人母的阿姨传授当妈妈的经验，还亲手缝拼花色布块的“百纳被”和绣了花的小“和尚袍”送给他们（这种拼布叫做“百家衣”，也是生活拮据时代的节俭之道）。为此，凌山至今还深情地忆念着“许大姊如慈母般的帮助”。

董秋斯先生侥幸未被早年的严重肺病夺走生命，到晚年竟遭江青逼迫而死。这就要讲到他与张文秋的关系了。张文秋是毛主席的亲家，她的

女儿刘思齐和邵华分别嫁给毛岸英和毛岸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很少人知道，张文秋的大女儿刘思齐有好几年是由董秋斯夫妇代为抚养的。１９２９年，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是山东省地下省委书记。夫妇俩不幸被军阀韩复榘双双抓获。由于叛徒出卖，刘的身份暴露。而对张文秋又一时抓不到把柄，加上当时她已怀孕在身，经组织营救才得脱离虎口。但刘谦初与２１位革命志士一起被韩复榘杀害了。

张文秋出狱后来到上海，经组织的安排住在刘谦初好友董秋斯家里待产。１９３０年春天，生下的刘思齐寄托在董家，请个女工带着。她自己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张文秋也是在董秋斯的家里认识了史沫特莱，并由史沫特莱将她推荐给共产国际间谍系统的左尔格，成为他情报网里的一员。直到左尔格在日本被捕杀，该情报系统撤回苏联，张文秋才于１９３６年带着女儿思齐去了延安。

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指派专人来找董秋斯，强迫他写证明材料，要他否认刘思齐是刘谦

初烈士的亲生骨肉。江青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妄图陷害张文秋。董秋斯那时已经７０多岁，身体十分衰弱，但他面对这种高压，仍奋起回答："思齐是刘谦初牺牲前交待我照顾的，怎么会不是他的女儿！"江青派来的人一次次逼迫，他一次次强烈抗辩，决不改口。他的心脏经受不了这种无休止的逼迫，心力衰竭反复发作，又因为有"问题"而不让住院治疗，终于在我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１９６９年的除夕夜，在家里因无条件抢救而含冤逝世。可以这样说，董秋斯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张文秋。未悉张文秋本人知也不知？

第七十三章　胜利的欢欣

抗战胜利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是来得既突然又自然。上海虽是“孤岛”，消息却极为灵通。苏联塔斯社的新闻，能悄悄收听到。尤其是“口闻”传递最为神速，不消半天，大街小巷都晓得了。

那时母亲惯例在星期六晚饭后，带着我从霞飞坊步行到福熙路四明村３８号建人叔叔家去，途中顺便买１公斤花生米。大家围坐在八仙桌边谈天，成为我们两家极高的享受。这两个小时里，便是大人们相互交流“小道消息”的机会，然后一起加以判断分析，由此估计不久的将来日本法西斯必定灭亡。我们这些在旁静听的孩子，偶尔提问一句，大人也不申斥，有时还给予解释。

过了不多久，我们真的看到日本鬼子在准备夹起尾巴滚蛋了。距霞飞坊不远有一座高层建

筑，老百姓习惯叫它“十三层楼”，这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北楼。而在当时这幢楼被市民们认为是日寇的第二司令部，是虹口的日军司令部的一部分，情报和文职人员，早就暗中迁到这里。又因此戒备极为森严，整天有日军站岗，四周布着铁丝网、沙袋，街角上还筑有碉堡，绝不容许中国老百姓靠近。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后，这座高层建筑的顶层便开始向外四散飞扬烧过的纸屑，足足烧了好几天。大家分析这是在销毁文件档案，虽然明知是在消灭罪证，但谁都无可奈何。胆大的市民走近岗哨，看到控制圈已经缩小，原来在路上站岗的日本兵已经向里撤退，可以自由通行了。过了几天，重庆的接收大员和美军开进上海，街上的日本店铺纷纷关闭，日本侨民开始返国，到虹口地区去也不再胆战心惊了。

　　一直尽量避免与外界交往的母亲，这时开始公开在家接待客人。先是罗淑章从重庆飞来住在我们家里。她是个忙人，经常外出开会，在我家仅仅落个脚而已。她搬走之后，又有廖梦醒带着１５岁的女儿李湄来住。李湄是廖阿姨和李少石

烈士的女儿，李少石在重庆遭受国民党兵拦路枪杀，她向母亲诉说当时的情景，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桩命案是个“意外事件”。李湄一口四川话，送给我几片橡皮糖，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美国货。我陪她到城隍庙去玩，她似乎对那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兴趣不大。

随后，我家越来越热闹了。除了日常来往的客人，由于地址固定公开，我家又成了往来通讯的联络点。例如廖梦醒和一位穿美军服装的中国人老李晤面，就安排在我们家里。她与孙夫人宋庆龄似乎也有讯息往来。

有一回老朋友来我家开座谈会，会后母亲留大家便饭，他们对母亲的厨艺大加赞赏，其中数李平心、冯宾符两位先生情绪最高。冯先生虽是宁波人，却喜欢母亲创造性发展的广东菜。

母亲烹制的“酿鱼”，是把一条 1 公斤上下的鲜鱼，从背脊两侧片下鱼肉，切断首尾的两端，保留鱼皮的完整。鱼肉去骨切细，另取猪腿肉、香菇、金钩虾米，混合斩碎加淡抽油（白酱油）等调料拌匀，不加味精，然后置于鱼皮里重新包

裹成一条鱼。由于鱼的头尾保留着，烹熟之后辨认不出是经过加工的。母亲用刀切开分给客人，大家同声赞叹形色味俱佳。另外一味罗宋汤，本是每个普通家庭都能烧煮的，但母亲用料精选，在山东人开的店铺买得牛的大腿骨，请店伙计敲开，先煮两小时，待骨髓融入汤汁中，再将骨头去掉，加上牛肉、卷心菜、洋山芋、番茄、胡萝卜、芹菜（取其芳香）等作料，慢火熬成。烧煮这种罗宋汤还有一个关键是要使用一种高立身的锅，炖的时候牛髓油浮在面上，封密了香味的外泄，以保持原汁原味和原香。这个汤自然又得到很高的评价。至于下饭的菜肴，那也是广东绍兴混合，如霉干菜烧肉、霉豆霉千张、咸鱼蒸肉饼、冬瓜盅等，这里从略不细说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胜利了，母亲的心情是多么欢欣！

第七十四章　我家被监视

到了１９４８年秋，形势益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母亲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已保障不了她的安全。我那年已１９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曾经做过空中无线电话的联络，并经考试取得了执照和呼号：“Ｃ１ＣＹＣ”，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即使有这个民间组织的牌子，仍然挡不住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曾经有两次，便衣一敲开门就直冲我家三楼亭子间，来查看我的无线电设备。直至看到墙上贴的电台执照，才嘟囔着离去。地下党的徐迈进同志为此告诉我母亲，要我再也不能玩无线电了，赶紧收摊。我就把无线电接收机和设备转移到一位信基督教的王医生家里，由我的朋友王忠

毅保存。我们住的霞飞坊本是个小贩随意进出叫卖的开放型弄堂，但到了１０月中旬，有“收旧货”的，“贩卖水果”的和“修锁”的铜匠担，不沿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坐在我家后门口“歇息”，甚至此走彼来，前后衔接。从厨房望出去，这批人的打扮分明不像是小贩。这怪现象后来连邻居也察觉到了，顾均正的夫人为此悄悄过来关照我们要多加小心。可是怎么当心也摆脱不了他们的监视。

这时，“民主促进会”的领导马叙伦先生等人已经撤退到达香港。我党在港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同志就与马老计划让母亲和我脱离危险的方案。

离开上海有空、海、陆三条路线，选哪条妥当颇费斟酌。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陆续赴港，国民党方面开始警觉，海、空这两条路线被控制和监视。加之富商和国民党党政人员都走的这两条路，母亲这些年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因此难免会有人认出她。而从陆路走，由于往来人员复杂，其中有很多做小本生意和投机倒把的“黄

牛”，倒便于鱼目混“人”。

　　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由此决定了从铁路和公路走的方案，并挑选了民主促进会的吴企尧同志负责护送我们母子。他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沿途的人际关系也多，外貌神态又像个公馆里的“大管家”，因此他扮作母亲的随从不会有破绽。他还找了同行的伙伴，是一位真正的纺织界商人，与我们可说“五百年前同一家”，也姓周，我们称他周先生。他的大名直到近来才知道叫周景胡。但那时是不便乱打听的，只知道他开纺织厂生产西装毛料。周先生的妻子是吴企尧的亲姐姐吴圣筠，她的年龄和母亲接近，我们就装做一起到南方去做生意。吴企尧还关照母亲，沿途要多谈生意经，比如“买进卖出”美钞银元，还可以谈些烧香拜佛求菩萨显灵保佑大家这一趟发财那类话题。文字书本一概不带，免受注意（临行我忍不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侦探杂志，在长途汽车上翻看，就遭到车上人的侧目注视。可见当时“眼线”到处都有）。

　　我们离沪的日期定在父亲忌日的前一天。按习俗，这一天家里总是要去上坟祭扫，监视方面自然会放松些。

第七十五章　秘密离沪

临行前一天，母亲把家里的事做了安排：委托鲁迅全集出版社账房邵先生和她子侄辈亲戚（比母亲年长）许寿萱，请他们两位照料一切。母亲只对他们讲要“出门去了”，也不说去哪里和何时回来。在这种时势之下，我想大家都是心照不宣而已。

家里所珍藏的父亲书籍、遗物都是抗战前期的，如果国民党来查，估计也找不出“现行罪证”，这倒可以放心；若能不遇到打仗、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全部收藏得以保存下来，这自然是万幸了。但是谁又能料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母子心情虽然复杂而沉重，也只得一切听天由命了。

至于邵先生和许寿萱他们两人的生活和６４号房子的日常开销，母亲让鲁迅全集出版社的收入来维持它。出版社还在营业，多少会有些生意的。

走的那天，吴先生嘱咐母亲要化妆，打扮成一个阔妇人模样。母亲向来不施脂粉，这回嘴上搽了厚厚的红唇膏，还拿着手袋。当日气温并不低，却穿上了薄大衣。我穿上半截西装，手提简单衣物。好在目的地是香港，已属亚热带地区，估计那里的冬天不会很冷。到了下午，一辆出租汽车直接开到前门口（霞飞坊的居民一般都不启用前门，从厨房间的后门出入，就这样，我们悄悄地走了。不想，这一次离别，竟就此告别上海，定居北京，至今已有５０余年了。

我们的出租车直奔火车站。一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法商有轨电车和少量公共汽车在行驶，有没有“尾巴”跟踪极易发觉。因此也不必绕道，一路平安地到了火车站，登上开赴杭州的火车。

到了杭州，有当地佛教界知名的杨欣莲老居士接站，这时大家心头才松了一口气，至少是离

虎狼之口远了一些。杨居士领我们到头发巷里的节义庵住宿。庵内清幽寂静，吸入鼻孔的是一阵阵香烛气息，心里感到仿佛进入了超凡脱俗的境界，惟一遗憾的是电灯光暗淡如烛。

　　第二天早晨再搭火车去南昌。次早到南昌，游览了东湖、滕王阁等名胜。最令人难忘的是到一家普通饭店吃午饭，踏进店堂只觉一切都大，好比进入了大人国。开间陈设宽敞，圆台面大到可坐２０个人，我们６个人坐下显得稀稀拉拉的。吃饭的筷子也几乎长一倍，不然夹不到桌上的菜肴。送上来的菜，盆大量大堆成小山，可见当地民风的淳朴，商家是实实在在做生意。大家放开肚皮吃，桌上的菜还没吃掉一半，尤其那盘雪菜肉丝剩下更多，弃之实在可惜。正在惋惜，跑堂过来献策了，建议把菜留在桌上罩上罩，晚上再来吃。这让人感到又亲切又实惠，而店家又可借此把顾客再留一顿。

第七十六章　抵达香港

从南昌动身，不是直接南下广州，而是绕了一个弯，转道先去长沙。为什么要那样走？我们不明白也没有问。反正这一路住宿坐车，全由吴企尧先生一手操办策划。当时又是秘密行动，类乎“潜逃”，大家一路上都提心吊胆，生怕会突然遭遇什么不测，故想不到那么多。又由于是匆匆路过，对长沙这座城市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能够回忆起来的是车站上卖的土“匣饭”。这其实是一只盛满饭菜的硕大的碗，小贩们捧着吆喝兜售。碗里盛着热腾腾的米饭，足有２５０克，上面盖着蔬菜和五花肉、腊肠、油煎鸡蛋之类，香气四溢，十分吊人胃口。稀奇的是旅客们吃完，就随手一放，任凭附近的孩子们捡拾而去。这景象是现在所看不到的。

从长沙到广州，乘坐的是长途汽车。也许是为了在车顶多载货物行李，这里的汽车车厢造得很低矮，沿途的公路又凹凸不平，以致车身不仅在不断地“筛沙子”，还上下颠簸，乘客是头上吃栗子，屁股打板子。母亲恰遇更年期，月经的流血量很多，到了站头几乎迈不开步。进入广州，在一个嘈杂的小旅店住下。这旅店的客人看来三教九流都有，大白天公然兜揽“姑娘松骨”的色情生意。

母亲本广州生长的，现在重返故地，自然成了大家的导游。她首先带领大家去看她的旧居。为怕被亲戚认出，避免额外的应酬，只在屋外绕了一圈，便匆匆离去。我们还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荔湾、沙面这些地方去游览。

不久，吴企尧先生以重金从黑市买到去九龙的飞机票。飞机原是美国军用运输机，铝质舱里的座椅都已开裂，想是美国的淘汰货吧，而国民党的民航班机还在当做宝贝使用，怪不得经常发生空难。

到达九龙后，我们还转道去澳门参观过一家大赌场，它当时很有名气，楼上楼下场子很大，有各种赌博形式。因为时间尚早，赌博没有开始。赌台上的人看到我们走近摊位，就交待“托儿”佯装下注，桌上立即显着赢得很热烈，但我们没有赌瘾，倒将这一切的“设计”冷眼观察清楚了。若是赌徒恐怕目光只注意牌九、扑克、筹码，认不清他们的设局。事后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一开始就下小注，赌场为了吸引我们，必可赢钱。小赢便走，一顿饭钱大概不成问题。

随后，我们平安抵达香港，这次长途行程，便告结束。但有一事这里必须一提。此次南下，一路上没有让母亲出过什么钱，吴企尧先生事先也没有说要共同负担旅费，因此母亲以为既是地下党通知我们离沪的，这路费必然也是党所提供的。几十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故一直心安理得。但近悉吴先生有一篇回忆文章，讲到此次南下所费一切竟是他姐夫周先生所资助。这样的话，今天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和感谢了。

第七十七章　解放区的“鲁迅版税”

到香港后，等了些日子，我们便乘船北上到了沈阳。我们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

有一回，我跟随大人们出去，进了一家书店。这家店铺面不大，陈列着东北出版的各类新书，其中除了许多种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小说《原动力》、《新儿女英雄传》、《活人塘》，诗歌《马凡陀山歌》，也有少量的香港进步书籍如《虾球传》等。这当中，我看到了父亲的著作，有《呐喊》、《彷徨》、《野草》、《二心集》、《准风月谈》、《两地书》等，也有整套的《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和父亲的翻译作品，可以说品种很多。书的末页标明出版者为“光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印刷地点在大连、哈尔滨和安东。看到父亲的著作，品种又

这么多，我自然无比亲切和高兴。在上海，我们鲁迅全集出版社印的书，千方百计都难以运抵解放区，而今在此大量出版应市，读者可以任意选购，不但价格低廉，还毋需担惊受怕偷偷地买。真是两个不同的天地啊！我回去告诉母亲，她也满心喜悦，让我每种都买一册回来作为版本收藏。待我捧着一大叠书回到宾馆，被交际处的同志看到了，很热情地帮我一道拎进母亲的房间。母亲在表示感谢之后，少不得无话寻话寒暄一番，顺便问问这两个名字生疏的出版社，知道这不是盗版，也不是民间的书社，而是党开设的正规出版社，心里更是高兴。讲过了这些，我们也就置之脑后不放在心上了。

　　不料过了几天，忽然来了几位陌生人探望母亲，自我介绍他们是出版系统的领导，为首的那位叫邵公文同志。他们向母亲非常诚恳地解释并道歉，说东北地区需要供应鲁迅先生的书籍，以满足许多读者的渴望。许大姐远在国统区，我们无法去征求意见，版权的手续也不可能办理，此地等不及只好先开印了。好在许大姐已来到，我

们一定补上应付的版税。母亲很轻松地缓释了他们的歉意，说明我们到了解放区，一切生活都是供给制，已无需用钱，况且是党的出版社印的书，哪能按国统区的方式收取版税呢？母亲诚恳地反复解释了自己的态度。

对方似乎也完全听明白了，坐了一会，起身告辞而去。或许他们以为母亲只不过是表面的客套话，也或许是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总之，过了两天，送来一封信并一张支票。支票的抬头是“鲁迅版税”，收款人是母亲。

母亲和我商议后，很快把支票送到宾馆交际处负责人那里，再一次申明不收版税的理由，请他代转给邵公文同志。并附了一封信。

没想到隔天又将支票送了过来。母亲仍旧坚决地退回去。歇了两天未有动静，我们以为此事已经过去。岂知仍是那位民主促进会的王先生，寻到我们房间里，来与母亲促膝谈心。他耐心地反复劝说，动员她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并说共产党办事向来是按照国际国内惯例做的，也包括出版书籍应当付给作者版税，况且也不是只对你

们，大家都照此办理。他还说，鲁迅先生是世界闻名的作家，你们如果不接受，别人也不敢收取版税，岂不是影响了一大片？况且，你们在国统区不就是依靠出版书籍为生的么！又说，从书籍的定价里，本来已经把稿费计算进去了，你们若不取，老挂在账上，出版社也不好处理……如此等等。听了这番话，母亲便提出一个方案：可否代我们捐掉，比如某个文化部门、艺术学校等等。

　　这时王先生说，马叙伦先生也建议许大姐收下这笔钱。这一来，母亲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母亲作为上海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对马老一向很尊重，既然民进中央的领导也发了话，又关乎多数作家利益这样的大局，不收下看来是不行了。在此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只能先予接受下，以后再做处置。此之前，我们曾经听说此地有一个“鲁迅文艺学院”，很有名气，在国统区都称它是“鲁艺”。于是想到不如将这笔钱捐献给这个学校。

第七十八章　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

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 1 岁的王金陵，是王昆仑的女儿。有关方面介绍说，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些“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

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

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

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１５００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８月２２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

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了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

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见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

第七十九章　到北平

住在宾馆里这许多知名人士，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党中央提出的由李富春同志传达的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的征询意见。平时则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读报，或相互串门聊天，或到文娱室玩扑克。

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一战，又解放了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转到哈尔滨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计划改为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小丰满、哈尔滨这些地方去参观学习。对这次活动，我本来有过一些简单的记录。但“文革”开始后，这些笔记都被我付之一炬。我至今记忆

犹深的是住在哈尔滨马迪尔饭店时，父亲的青年朋友萧军来探望。他带来一沓自己编的《文化报》和合订本给母亲看。就在去年（１９４８年）秋，他为“文化报事件”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他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也被停业交公。这些事，母亲抵达东北时已略有所闻，因当时讲述者回避闪烁，语焉不详，故这事究竟如何，她并不清楚。萧军造访的目的，看得出是要向母亲一吐胸中的块垒，谈谈整个事件的原委。但我们刚到解放区，这事件又实在太复杂，一时半刻难以弄清。再说停办《文化报》是东北局文化方面领导的决定，萧军的党员朋友为此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母亲自然也很难表示什么。也许萧军对她的回应不满意，也就告辞而去。其实母亲在听到这事件之后，也曾百感交集。奈何她爱莫能助，什么事也做不了，况且自身在“版税”问题上又正被误解，各种风言风语如影随形，久久挥之不去，使她百口莫辩，哪里还管得了别人的事？

　　哈尔滨等地的参观学习完毕，转回沈阳的原住地。交际处告诉大家，为了准备到北平，可以

定做简易的木箱，数量多少不论，每人按需提出。我们这一批人除了零用钱买的杂七杂八之外，行李确实增加不少。公家发的有每人订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羊毛毡一条，美国军用睡袋一只。仅仅这些物品就足够塞满一只大木箱。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即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二天，５６位民主人士共同签署的庆祝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发表。２月２５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造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

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是从上海乘船到天津，先在西柏坡的李家庄停留，等待北平解放。还有许多老朋友如柳亚子、马寅初、王任叔、胡愈之、郑振铎、萨空了、沈体兰、张志让、艾寒松、徐迈进等等，也都在北京饭店晤面，开饭时济济一堂，十分热闹。

据统计，从１９４８年８月到第二年的８月，整整一个年头里，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３５０人，其中１１９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筹委会常委，３月２４日代表国统区任正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到９月参加了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１０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此定居北京。我呢，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去，进了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３１班，参加为期３个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八十章　父亲遗物的处置

我们在北京住下后，关于上海霞飞坊６４号住处如何退租，我知之不详，我只晓得已经在政务院任副秘书长的母亲，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匆匆赶到上海处理了两件事。一件是结束鲁迅全集出版社的业务；另一件是把父亲遗物点交给各纪念馆。

母亲把遗物分为三份：上海、北京、绍兴。绍兴老家父亲用过的遗物上海没有。从绍兴带到北平的也极少。那时迁往外地，尤其是携家带口的，往往以带必要的衣着为主。而父亲以书籍为重点，专门请了木匠，按他的设计做出既便于搬运、又便于置放的书箱。这些都在北京的故居展出。至于周作人拿掉过什么，或者当时兄弟间没有界限，“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笔

账算不清。因此，绍兴鲁迅故居纪念馆里，母亲捐献的不多，只好照回忆录和亲友的讲述，去制作复制品，如展出的玩具刀、枪，“老鼠成亲”画片等。另有一册搬家的账本是建人叔叔当时所记，这次按图索物，也讨了些回来。也许曾给点补偿，可能相当微薄，不过以当时的情势，谁都不敢有异言的吧。因此展出的文物，绍兴最“穷”，事实如此，只好遗憾了。但参观的人，都远远超过京沪两地。因为绍兴是鲁迅故乡，有“三味书屋”、“百草园”、“老台门”，又是个人文旅游热点，它得天独厚，远近中外闻名。

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应当说是真正的父亲故居。它是父亲被周作人从八道湾赶出来后，独立购置的。保存的文物，除用具、书籍以外，仅有少量古物、钱币、碑帖等（移居上海后，父亲再未收藏过这方面的古物），它并不完整。因为朱安去世时，曾被周作人的家属拿走过一些，至今仍不知究竟少了哪些，这也是永远“研究”不清的题目。至于上海后１０年与父亲有关的遗物，母亲尽量“点滴不漏”地捐给了鲁迅纪念馆。

不容讳言，有些日用物品在霞飞坊曾经使用过。虽然母亲在思想上要尽力完整无损地保存它们，打算将来办个纪念馆以永久纪念父亲。但眼前的生活现实又往往使她不得不万般无奈地改变初衷。比如有一件厚绒线衫，原是母亲为父亲打算到苏联养病而专门编织的，应当是值得保存的纪念品。但当时我已经开始长高，又无力添置新衣，母亲只得忍痛把它拆了，编织成我身上的冬衣。出于同样的经济原因，有些日常用品比如碗盆锅瓢之类，也不得不使用过。但我深知母亲内心是痛苦的。

又记得我十四五岁时，夏季酷热，我没有薄裤子穿，母亲犹豫了很久，翻出两条“香云纱”材料的中式长裤，带着深沉的怀念，告诉我：“这是你爸爸穿过的。”说到这里，我们母子相对久久默然不语。这两条裤子，在我１９岁离开霞飞坊时还在箱子里，后来有没有丢失，不得而知。还有，父亲离开日本回国时，有一位邻居老武士，曾经赠给他两把匕首。母亲告诉我，这匕首，无漆，本色，由两瓣合成，刀壳以纸带沾糊

糊粘成一体，紧急防身时抽刀即刺，不必抽拔以省分秒时间，刺中对方时，木壳自动分裂脱离，刃口即现。这两把匕首已不知去向。我曾问建人叔叔有没有得到过，他说没有。查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内藏品，也都没有经手。有几位日本朋友承询此物，只能据实奉告了。

—完—